生活 学术 思想

主编 靳大成 吴耀华

直面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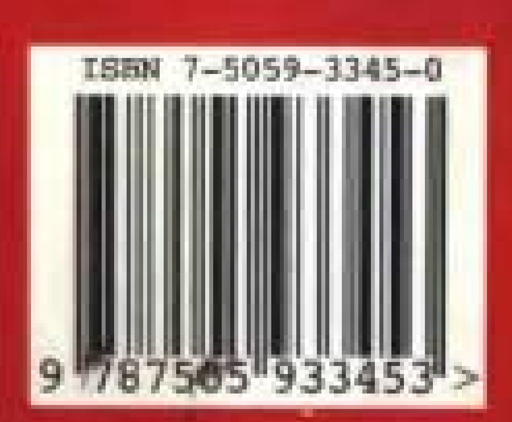
徐友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简介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66年时为成都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经历了文革、下乡，当过工人。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7级学生，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6-1988年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1992-1993年为布里斯托尔大学访问学者。专业为当代西方哲学，现为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不堪回首》等。



ISBN 7-5059-3345-0/I·2545
定价：15.80元

生活 学术 思想

主编 靳大成 [illegible]

直面历史

徐友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面历史/徐友渔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思想者”丛书/靳大成,奚耀华主编)
ISBN 7-5059-3345-0

Ⅰ.直… Ⅱ.徐… Ⅲ.①红卫兵-研究 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研究 Ⅳ.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3410号

书　　名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 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
作　　者	徐友渔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印制	崔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6千字
印　　张	9.87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345-0/I·2545
定　　价	15.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学术·思想·生活丛书——

总　序

这套随笔的编辑，意图在于提供这样一种“历史”，它不是司马迁式的宏伟叙事，上下几千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帝王将相，文化精英，谱系严整；也不像剑桥中国某某史，专家学者，精细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层层迭迭，叙述详尽，分析缜密，论述精到；这套随笔，意在提供一系列完全个人化的档案、行状，顶多相当于所谓稗史，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尚未被编者的知识系统格式化，可以算做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更多地表达作者个人的印象，个体经验的感受，个人主观化的对生活的体察，一句话，是个人经验的片断的集束。

有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宏观论述、历史分析已经不少了，相关的文化理论论争也仍

然历历在目，余音绕耳，但我们更想了解和认识这一代人在跨越了这半个世纪几次历史转折后的内心生活，了解他们在严肃的理论性表达背后的内心冲动和欲望，他们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倾向，他们的趣味、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他们整个学术、思想的潜在的影响。这是真正的初始条件（混沌理论中有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原理），抽象的理论表述已经过多地将这种印记抹去，使我们不了解一个思想产生的条件、来源、过程，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用和我们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去言说。对此，只有让作者自己不受干扰地随心所欲地叙说，将那些冰山下面的东西展示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尼采所说的纪录那些思想实际降临的原始状况，会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多么不同于完整的、格式化了的抽象的理论表达的生活景观。

为此，我们选择作者队伍时，不再按照职业、观点、立场的某种统一的标准，也不理会学院派还是民间派，自由职业者还是高居庙堂的权威，而是像洗牌一样，带有相当的随机性。每一辑的作者队伍的组成都不一样，但选取的角度和视域也有一定的范围。不管作者的社会角色如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讲故事的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只表明了他的生活兴趣之所在，只构成一个小小的片断。当这些片断的集束被我们摆放在一起，并开始

像洗牌一样地随意组合时，我们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此而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经历过的当代生活的认识。

在编辑这些书稿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并不自然而然地“在”那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历史只是从某个跟我有关的时刻才开始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与历史的关系，一定与某个时刻的遭遇有关。我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开始知道我是生活在以“新时期”命名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及其整个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我分明地感觉到了那位古代圣贤在他与弟子的谈话纪录中的声音，竟是如此直接、具体、息息相通。正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对我来说跟以往不一样了。十年前的这个体验，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最初动因。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们实现对话、交流，并且能打开自己的记忆窗口，看到那个就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但你平时却不曾留意并不能时时意识到的不同的生活世界。

靳大成

1999．11．10

前言：鼓起我们的道德勇气

中国人似乎不能善待历史。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历史”是用得最滥的词，它无所不在，事事都能派上用场：师长们以历史的名义，要我们发奋读书，刻苦锻炼身体；报刊、广播、政治权威以历史的名义，要我们搞大批判、大串连、到乡下去吃苦。最后，我们发现，那一段历史是一场噩梦，以历史的名义发号施令，动辄以“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来警告别人的人成了历史的丑角。在此之后，中国人好像患了历史恐惧症，人们淡忘历史，回避历史，因为历史会打乱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使志得意满的心境被令人尬尴的回忆破坏。

不能善待历史的人，也不会被历史善待。

诚然，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演，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些垃圾没有清理打

扫，它们包藏的毒素就有可能再次爆发，酿成瘟疫。在悲剧的年代，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心灵中的阴暗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图根本的救治，而靠缄默来掩盖，那么当道德考验重新降临时，我们会又一次遭遇滑铁卢。

回顾本世纪中华民族遭受的不幸和劫难，很容易发现我们失去了许多：我们失去了清洁的空气和河水，失去了碧蓝的天空和海洋，草原和森林在急剧地缩小，但难于看到的是，这个民族的道德资源也在流失。我们的心态与暴发户相似，我们只对当下和现实感兴趣，过去成了心病，精神文化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们无法，也无权改写历史，但我们可以正视它，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获得智慧。惟一需要做的，是鼓起道德的勇气。失去的，只是惰性和怯懦，得到的，却是整个未来。

目 录

专题研究

参考文本

个人经历

精神档案

个性与遗传

我上初中时父母相继病逝，自少年起独来独往地长大。我知道自己性格很不平和，复杂、矛盾，这部分源自父母的性格基因。

我父亲经历复杂，性情孤傲暴躁。他生于川东一个富农家庭，但求学仍感经济上极为拮据，自幼养成对富人权势的妒恨，这一点导致他走上革命之路。当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时，他曾躬逢其盛，并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师大毕业后，他于1925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西洋史和经济学，1927年由法共中央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接下来就是被捕，亲友营救。抗战时期为国民党部队

工作，曾在各种大学任教。

我意识初启时，父亲在四川大学教俄语，经常看见他捧着大部头外文书大声朗读，还不时听他讲《春秋》、《左传》上的故事，偶尔也听他提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地下活动的惊险情节。那时不知父亲已是脱离革命队伍，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我眼中他有如天神，高远得不可企及。但是，早年的辉煌和眼前的黯淡使他心态极不平衡，他忍受不了失意、被冷落甚至被歧视，我常常成了他的坏心情和坏脾气的牺牲品。我常常无端挨打，奇怪的是，十来岁的小孩，很少感到委屈和求饶，我的感情是憎恨，我的冲动是反抗，我的行动是离家出走。

我还记得自己在凄风苦雨中踯躅于闹市或城郊的心情。电影院的霓虹灯恶意地闪烁，行人来去匆匆，我绝望但不自怜，我脑海里的图景是，面对死去的我，父亲追悔莫及，嚎啕大哭，痛骂自己，这使我产生一丝满足和快意。但悲剧并未发生，家人连同保姆满城搜寻，逮回家后以痛骂和哄抚了事。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几乎再没有遇到过如此令人悲愤之事，但我特别理解弱小者在走投无路时以命相抗、以死相争的举动，特别是在事关荣誉、尊严或信仰的时候。

直至30岁之后，当我回忆童年往事时，对父亲的理解与同情才开始占上风。事实上，凶狠暴烈的他，也常常表现出慈爱的舔犊之情。记得困难年代，他带我去饭馆吃一顿稍微像样的饭，为了占到座位，竟一反平时高傲之态，向人苦苦哀求。在我还未上小学时，他就强迫我学外语、到大河里去学游泳。我想，父亲虽然早逝，但他仍留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不甘平庸，永远要力争上游。对于他在60年代初逝世，我有时竟感到有点庆幸，如果他活着，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他肯定会遭到无法承受的凌辱，而依我在当时“阶级斗争教育”下的觉悟，一定会对他做出伤天害理，一辈子忏悔不完的事。

我母亲的性格与父亲相反，她是个温柔、贤慧，有隐忍精神的人。我目睹她如何孝顺自己的母亲，侍奉兄长，方知家庭中的美德是怎么回事。我小的时候，寒冷的冬夜常常使人难于入眠，母亲让我把冰冷的双脚放在她怀中，脚热了，全身都舒服，就睡得着了。困难年间，她已饿得全身浮肿，但常常把食堂里那份饭食带回来与我和姐姐共享，那往往是一大缸汤面，因为掺杂有野菜或树叶，显得分量很大。父亲刚病故，母亲就检查出患了肝癌。那时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只好是我来照料，我

那时念初中。我常常发现母亲被巨痛折磨得满头大汗，也不呻吟，她是怕我难受。到了晚期，她自知无救，坚持要我去学校，说自己反正不行了，不能耽误我念书。有好几次，清晨一觉醒来，我发现母亲翻滚在地板上，奄奄一息，她说自己但求早死，免得拖累大家。当同大院的私人医生说病人只有一个月好活之后，到第28天，母亲去世了。那天凌晨，发现母亲没有了呼吸，过一会儿，还发现家中的煤炉灭了，钟也停了。那天天气阴沉、迷茫。

有不少朋友说我在英国待过，很有绅士风度，而我却深知自己内心的激烈，对人对己的苛求，对是非对错过分的计较。我曾下功夫修炼自己，想求得性情平和、宽容大度，但我做不到，我想这是父亲的基因使然。幸亏还有母亲的遗传，对善良、同情、怜悯还有一份敏感和珍视，有时也能替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对具有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极为反感。但父亲、母亲的性格基因是很难调合统一的。我性格中最大的毛病是，我对人几乎从不提要求，但内心却有明确的要求，我认为人应当自觉地做本该如此的事，靠暗示或说服得到的东西不是出于本心，是不真实的。但不满和怨恨往往在我心中沉淀积蓄，到爆发时就不可收拾，也令人莫名其妙。

原罪与再生

本应成为革命元勋的人却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成了父亲终生难愈的心病，其结果是，我在家中接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和训诫可能远远超过了真正革命家庭的子女。父亲的思想和做法并不奇怪，就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比俄罗斯人更爱搞大俄罗斯主义，满清人入主中原之后比大多数汉王朝更固执于儒家正统一样。认定了一种价值之后，你越不属于它，就会越要去捍卫它。

另一方面，家庭的知识教养使我从小就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在同伴中获得优越地位。50年代的人是头脑简单的，不但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连许多大人都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诗人，哈马舍尔德是联合国秘书长，里约热内卢是巴西首都，即使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能顺畅地念出这么长的洋名字。我成了小伙伴的知识中心，院子里的孩子王。记得初中一次劳动休息时，只大我们3岁的班主任给大家讲十分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刚读完苏联小说《马戏团的秘密》。她讲完后我有兴致和她聊俄罗斯小说，我谈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她显然有一种大开眼界的震惊。

但上了高中不久，我从精神优越的顶峰跌到了自卑自贱的低谷，这是我自己找来的，虽然说到底还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毛泽东在60年代初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我自囿于象牙之塔中，忘情于欧洲经典文艺作品的活法与现实格格不入。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把人推到“改造自我，做革命青年”的道路上。我开始学马列哲学，而且学得津津有味，这与当时的“学毛主席著作”运动是一致的。但我被告之，只玩虚的还不行。什么是实的?那就是“靠拢组织，争取人团”，这对我很难，在一个知心朋友(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的反复劝导下，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我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进人了一个竞争队伍，它同时也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系统。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突然受到青睐和重用，一些成绩不好的人由沮丧变得自信而且自负，一些成绩甚佳、文娱体育皆优的人一改风风火火的姿态，谦卑地痛骂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作风习惯，向某些人靠拢。位置的变化、关系的调整，其源均出于家庭背景。我加入了“争取进步”的系列，但排在末尾，而且规则因人而异。有一天，一个团干部问我为什么老是不向

她“汇报思想”，这几个字刺激得我彻夜难眠。我怎么在人格上低人一等，一个成绩比我差，各方面都迟钝的人，仅仅因为她父亲是工人，早“解决了组织问题”，就有资格教导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始终没有向她汇报思想，但我接受了这个标准。为了灵魂得救，我愿付任何代价，包括自尊。要虔诚地求得救赎就得承认自己的原罪，它和家庭一样对我是与生俱来。我为什么能自轻自贱，向许多浅薄、功利甚至虚伪的做法妥协？说到底，我相信人家代表了历史潮流，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人很容易被历史命定论征服。另外，长期浸淫于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并不讨厌和惧怕心灵的自审与折磨，似乎从精神鞭挞的痛苦中还能获得某种快感。欧洲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经历了罗曼·罗兰从《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母与子》中描写的那种转变，人道主义者往往做得到为了历史的必然性否定自我，追求光明和再生，用中国的话语说就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是一个可怕的诱惑和陷阱，它要求你首先把自己视为异类，放弃正常人的权利。

“文革”爆发，我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投入运动。我欢呼它，是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将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渴

望它，因为我盼望在革命的烈火中实现凤凰涅槃。在运动中，有人向我讲起种种疑惑，与我们的纯洁信念格格不入的现象，我知道许多人的热情已经消退，信仰已经动摇，但我仍用“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之类的说法来否定我们亲自感觉到的东西，捍卫那抽象、飘渺的东西，坚信眼前的丑恶属于“局部”和“支流”，应当无碍于对全局和主流的肯定。哲学本应破除迷障、启迪智慧，但它往往成为抗拒事实和常理的概念工具。我现在是哲学家，但我从不敢劝人弄哲学，只有极少数人玩得起它，它对许多人很危险，使人脱离常识，钻牛角尖，走火入魔。

我最后还是走了出来，我转变得很慢，但那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变。我的再生是复归于人的自然本性。

匍匐与神游

当我正处在从盲信到理智，从狂热到冷静反思的关节点上，时空场背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老三届这一代人上山下乡了。“文革”初期经历过全国大串连，运动中又到过工厂等单位“闹革命”，自以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在农村安家落户，才

知道在中国广袤贫瘠的土地上生活是怎么回事。

据说，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但这种再教育的效果似乎与设想的初衷相反。被赶下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原有的怀疑和不满原来只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对“文革”的所谓“革命路线”作反省。我们多年所受的正面教育仍然沉淀在血液中，镌刻在大脑皮层，乡下现实生活是消解以前虚幻信念的课堂。

一下乡就对我们搞“忆苦思甜”教育，我们对这套程式相当熟悉：上了年纪的工人、农民痛说苦难家史，讲述过去饥寒交迫的日子，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青少年懂得“旧社会日子比黄连苦，新社会日子比蜜甜”。但开会前只见干部们对即将登场的老农紧张叮咛：“叫你们只忆1949年以前的苦，千万不要忆成1962年的苦！”忠厚颟顸的大爷、婆婆们却无一例外地对60年代初的公共食堂和饥荒做了声泪俱下的控诉，弄得干部们好不尴尬，不过，会后他们说的话和老人们一模一样。吃“忆苦饭”时，我们作好了充分的肃穆和悲苦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场面却是欢快热闹、你抢我夺。青壮年农民一碗接一碗地狼吞虎咽，因为这和平时吃的也差不多，忆苦会提供了白吃一顿的机会！

如果说前不久对于“文革”的路线和“伟大成

果”还未下断然结论的话，现在是一清二楚了。

乡下的生活苦不堪言，摧残性的重体力劳动使人感到度日如年。但现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饥寒与劳累，而是周围人们的堕落，以及一代人的绝望情绪。

环境的骤变使学生们的善恶观念、是非标准与在校时迥然不同，一些曾经有傲慢公子气的干部子弟，一些原本端庄羞涩、洁身自好的女孩子，纷纷向农民“共产”：摘水果、偷蔬菜、赶场时见东西就拿，少给钱或不给钱。职业性的小偷也有好些，一人得手，一伙人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可怜的农民，丢失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意味着全家全年的现金全部丧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这种事，但言谈之中没有人认为这些人可耻，没有人站出来指责。有人自鸣得意地说，农民把知青的出现当成“鬼子进村了”，他们感到兴奋、觉得好玩。我把偷或抢视为土匪行径，但周围没有人觉得干了坏事。深究起来看，学生们实质上是没有把农民当成人，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讲起偷鸡摸狗的事就乐不可支，他们可能不觉得农民会痛苦，也可能觉得反正自己遭受了痛苦，就可以不顾农民的痛苦。

继初到的新鲜、骚动之后，接下来的是难熬的

艰辛，日子单调而无望。大家蓦然发现，自己宝贵的青春正毫无意义地耗蚀，学习、事业，甚至婚姻家庭、工作都毫无希望，知青相聚，谈得最多的是战争，大家不约而同地盼望战争爆发，没有人提及现代战争的可怕，知青们盼望的实际上是变动，反正自己在地狱的十八层，哪怕一场动乱使自己变到十七层，也是好事。

我在精神上离群索居，尽管明显感觉到昔日战友的敌意。我用阅读来抗拒粗陋的生活与不知不觉的堕落，我在一片精神乐园中得到了宁静的欢乐。

早在运动中期，我就有机会阅读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片断，但那时自己煞有介事，颇有点“戎马倥偬”的意味，仅仅限于浏览。在乡下，我重新倾听亚里士多德冷静的讲述，揣摸笛卡尔层层深入的沉思，对柏克关于崇高与美的精思巧辩发出会心一笑，为潘恩的激奋雄辩拍手叫好。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是柏拉图，他使你沉重的肉身轻灵，他为你装上思想的双翅，让你翱翔在一个纯洁、透明、一尘不染的理念世界。我把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安东尼的《沉思录》当家书和日记来读，感到神清气爽、心心相印。我把他当兄长，写下一些回应的话，抒发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使我的心灵恬静而澄彻。

时至今日，我仍与哲学为伍，我想从中得到的，不是名声，依然是智慧和宁静。

现代与传统

研究西方哲学使我从1986年到1988年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两年。任何一个到过牛津的人，都感叹这里是最适宜读书和思考的地方，不论是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还是举世闻名的波德林图书馆的穹形圆顶屋，都散发着精神文化韵味。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的精深思想使得“牛津学派”在本世纪的哲学史上成为精彩的一章，而艾耶尔、达梅特的独创性见解使牛津以分析哲学的重镇闻名。我就是冲着达梅特来牛津的，这两年我在他的指导下辛勤工作，并有幸在斯特劳森退休前听完了他最后一次上“哲学导论：分析和形而上学”。

在学术上大开眼界和获得丰收，这在我的预料之中，而出乎意料的是，牛津生活使我有一种新的文化体悟：我对“传统”和“现代”产生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切身感受。

在牛津，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传统的重视，为历史而骄傲。在这座容纳了三十来个学院的小镇上漫步，不时会有一块镶嵌在旧墙上的石碑

映入眼帘，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女王陛下××××年×月×日为××学院奠基"。当我在不同的学院凝视着那方形的、棱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如茵如画，整洁如地毯般的草地时，深知校史的英国友人会自豪地告诉我，这块草地有两百年、三百年或五百年的来历。我曾在享有盛名的国王学院拜会一位著名哲学家并共进晚餐。参观校园时他向我指点，哪个地方是本科生的停车场，哪个地方是研究生、哪个地方是教师的停车场。就餐时，他递给我一套黑袍，长条形大餐桌旁，每个教师都身着黑袍，正襟危坐，桌上和墙上的蜡烛肃穆地燃着。餐厅另一端，是供学生用餐的低桌(low table)，我遥望着一个坐在那里的熟人，他是牛津中国学生会主席。我因为是被教师邀请而在高桌(high table)就坐，牛津的传统，即身份观念，把我们隔开了，我们俩人只好相视苦笑。

一次去最有贵族气派的基督堂学院拜会友人，受到老年门卫的询问和指引，此公表情之谦恭、语音之纯正，周到的举止中涵含的大家风度，几乎令人手足无措。在学院的大厅，朋友指着十几幅油画中的一幅说："那是约翰·洛克，他在本学院任职前后三十多年。"啊，这位大哲学家，近代思想的奠基人，就是在这里思考和写作的！他还告诉我，

艾耶尔毕业于该学院，他因学术上贡献巨大，被女王授予爵位。获此殊荣的牛津哲学家还有斯特劳森，朋友告诉我在称呼上的规矩："当面说话时，别叫艾耶尔教授，叫弗里德里克爵士，别叫斯特劳森教授，叫彼得爵士。"

确实，牛津有无数的繁文缛节，不论是欣赏，还是厌烦，你都得遵守。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当你适应了这样一种生活形式，"从心所欲不逾矩"时，你就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了。传统离不开形式，无形式的传统只是一种文化抽象。

牛津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的现代性决不表现于人们穿金戴银，小汽车的拥挤和大哥大的普及，它首先体现在牛津的学术理念和习惯，学术水准和成就中。牛津的导师制原先让我和中国的私塾相联系，严格的教育使人猜想上课的场景一定是滔滔不绝和洗耳恭听，一定是死记硬背和做不完的作业。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研究生上课时讨论的活跃和热烈使人叹为观止，不止一个导师对我说，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我跟从达梅特教授作研究时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两年中他从未对我做过"传授知识"的工作，他总是把最新课题摊出来，要求我和他一道思考和解决。

牛津大学的42个科系中，有32个被评为世界一流水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据说有二三十人，其中生物化学系就有3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最高奖为菲尔兹奖，牛津数学系获奖者有3人。我周围的中国学生提起自己的导师，不是某学科的开创者，就是某个领域的世界权威。在这里，站在学术前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近代以来的中文词汇中，“现代”和“先进”同义，在牛津，这不是梦，不是理想境界，而是身边的日常现实。

在中国，“现代”还是可望而未能即的目标，也许，惟一令我们自慰的是传统。我最要好的英国朋友G博士最以英国的历史和传统自豪，他嘲笑美国人的口音、美国人的电影，甚至美国的航空母舰，但他从不在我面前狂，因为中国的历史比英国更悠久。我心中既窃喜又悲哀的是，G博士并不知道，传统在中国基本上荡然无存。不错，它存在于典籍中，但有多少人读典籍、懂典籍?确实，人们要游泰山，在曲阜搞祭孔典仪，但这些不过是旅游的一景而已。传统既不应是木乃伊，也不应是化装舞会的面具，它应该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之中。牛津的生活使我再不敢轻言传统，当然也不敢妄谈现代。

文化与中国

从静谧、古色古香的牛津返回北京，我发现短短两年，中国的精神文化氛围发生了使人一时无法适应的巨变。生活好像是一锅沸水，人似乎置身于旋涡的中心，各种事件和景观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信息和机会从四面八方袭来，使人无法思索，只能选择。每天都感到热气扑面，精神总是处在亢奋状态。生活方式也面目全非，两年前大家和穷学生无甚区别，相聚时煮碗面条，有啤酒已属奢侈，现在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所在的编委会，名气大了，排场也出来了。吃饭是为了议事，有那么多的出版者、合作伙伴要求洽谈，有那么多的计划和方案需要商讨，有那么多的文稿必须分配给合适的编委去处理……

在 1985 年，以我的朋友和同事 G 为首，成立了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会，它被海内外视为在 80 年代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之一。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编委会的活动已经有声有色，其成果已蔚为大观。前者的宗旨是复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后者追求以现代科学成就为基础建构新的历史

观和世界观，因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学术思想空间供我们的编委会活动和发挥作用。我们的宗旨是引介当代西方最新人文思潮，为下一步的思想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以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青年学者为核心，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我始终认为，这个后起的，拙于活动与组织的编委会能迅速崛起，应归因于它平实而深刻的认识与追求：在大规模的复兴和建设之前，应有吸收、借鉴、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发轫于严复、梁启超诸前贤，中断几十年后，当开放的时代来临之际获得重新启动的机会。

公平地说，“文化热中的三大学术山头”之说是太简单了。至少，以“新启蒙”为旗帜，以民主和人道主义为追求目标的一批学术界人士，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作出的贡献，到了90年代也愈益明显。以外，还有“猫头鹰文库”、“当代大学书林”、“国际文化思潮”、“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等丛书的推出，都是不可忽略的。

客观地说，我所在的编委会虽然名声远播，但在80年代的思想运动中，却建树甚微。这首先是因为，它活动的时间太短，就那么三年左右，来不及做太多的事；其次是因为，正如编委会的名称所

寓意的，我们是放眼世界，然后回观中国，不是一上手就炮制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案，也是因为这原因，大家对于当时提出的种种学说，都颇不以为然。大家都是毕业不久的硕士研究生，思想、学术上稚嫩的印痕尚未消退，只是凭一股锐气摇旗呐喊，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是有的，标示时代前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实在是拿不出来。

我们在引介尼采、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萨特等大家的思想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此外值得一提的学术探索大致有两点，虽然当时来不及将它们成形，但在90年代的学术思想发展中，它们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了。

因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专业方向都是研究西方当代哲学，所以我们对于本世纪哲学思想发生的所谓"语言的转向"，都有一种敏感和较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学术文库"系列中推出了《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并审定完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译稿，至于花费不少心血筹划的对于英美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梳理，则延至90年代中期才完成了一部分。这种重视和理解，现在已渗透于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主要话语之中。

同样也是因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熟悉，我们对自由民主理念中的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的差异有较

早的认识，最初的启发来自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于卢梭和拜伦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剖析，在80年代几乎来不及展开的思想，在90年代成了思想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80年代末，“文化热”骤然中止，苦心经营似乎毁于一旦，朋友们星散四海。但目光远大，意志弘毅者并不灰心丧气。巨变并未使人颓废，反而促人反省。在80和90年代之交我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在浪潮退后，我们可曾在沙滩上拾到闪光的贝壳?如果所获无几，那么我们应该为21世纪的到来做些什么?思想上经历一段蛰居期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思考变成言说，我认为，诗化哲学不行，终极关怀不够，后现代不可取，80年代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不该倒，启蒙和理性精神不会亡，但这些导向应深化和具体，落实为宪政构架的思想与学理的支撑。

原载《花城》1999年第1期

一群思想者的风貌和踪迹

我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文革”前把“毛选”学得烂熟，还看了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文革”中就有了用武之地。我一参加群众组织就在油印小报上大声疾呼：革命小将不光要革别人的命，还要革自己的命。那时的学生很纯，信我这一套，拥戴我当头头。1967年5月之后把所谓“保守派”打了下去，“造反派”内战爆发，我根据列宁关于“左派幼稚病”的论述，攻击对立一大派的山头主义和风头主义，一下子成了一派的理论骨干。1967年夏季时大规模武斗爆发，由拳头、石块升级到棍棒、长矛，再发展到枪炮。许多人十分困惑，感到不应该只是狂热投入“文革”，还要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总部几个工作人员，主要是机关报的编辑，自觉地看书(主要是马列理论，兼及历史、政治)，收集全国运动

情况，定期交换看法。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形成了一套颇为系统的观点，不同意总部头头热衷于打派仗。当总部核心组开决策会议时，我们破门而入，陈述自己的意见。头头们看不起我们(全是中学生)，但又辩不过我们，然而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直至1968年春本派被中央定为“逆流”，头头被抓之前，第一把手才当众承认压制我们正确主张的错误。

我们这个自发的“文革研究小组”后来散了。其中的H是个沉静好思的人，他在大联合之后被本校对立派从庆祝市革委成立大会上抓走，装在麻袋里，在学校操场上被打死。我和我们小组的人去向他告别时，看见遗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他从不参加武斗，招恨的原因是，他本为对立派的头头，后来反复思索，觉得还是这一派正确，就主动改变了观点和组织，被视为叛徒，可以说，他是因为坚持信念而死的。另一个小E血气方刚，性格冲动，下乡后研究中国农村发展方向，曾写信问陈永贵大寨道路到底是否行得通，此事受到追查，被定为思想反动，差点入狱。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因为此问题不能上大学。他本是成都最好的中学的好学生，因为自己的执著、天真而遗憾终身。前几年在京相见，他精神颓唐，虽然由于自己能干，工

作和地位都不差。还有一位C女士，现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以前红卫兵的造反劲荡然无存，但关心国事，吃苦耐劳仍如前，因此很快就有了名气。

我后来觉得本派的理论家水平都不高，遂开始与对立派——四川大学的智囊人物对话，这些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的高材生确实气概不凡，见解独到，这些人往往也是体育尖子。和他们探讨争辩，真有一股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我还结识了一位中学教师，他在对立派中地位很高，但人热情、认真。有一天夜晚他到我所在的学校来交流思想，正高谈阔论时，突然有人报告说对立派包围了我校。我们不惧怕战斗，但他在这里却令人尴尬。他轻松地微笑安慰我们：“没关系，今晚就是你们的人了，要打一起打，要冲一起冲！”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为自己不同凡响的气概而自视甚高。这位教师属于文学气质，他的探索热情不能持久，后来大概成了一个优秀老师。而我当年川大的思想对手中，有一位至今是我的好友，他现在大学教数学，乐于向学生传播新思想。他使我们的阅读视野从马列经典扩大到自然科学，当我们下乡，他到煤矿后，我们还一起读牛顿、达尔文的著作，我到北京读研究生前，自学数理逻辑，常与他讨论。我们认为，只知“诗书礼乐”的中

国式文人要当思想家,是先天不足的。

成都九中的群众组织是惟一超越于两大派斗争,致力于大联合的,其头头好学深思,有独立见解。我们自然要去联络和交流。开始和我们打交道的是X,他披一件长军大衣,目光炯炯有神,手势有力而夸张,很有领袖风度。原来他父亲是省话剧团导演,他很小就登台表演,“文革”中见人就端出《列宁在十月》中的姿态。这人恢复高考后在北京念导演系,拍了一些很不成功的电影。另一个头头Z不喜多言,但据说他们组织的文章都是他执笔的,他外语极好,看经典著作看原文,我们后来和他打交道较多。1977年时,他以汽车修理工的身份轻而易举考上北大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除了被导师杨周翰器重外,还深得朱光潜和钱钟书喜爱。我1987年圣诞节在美国哈佛大学见过他几面,他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但同时也替系里指导研究生。他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批驳那些想把“后现代”引入中国的人。我认为,他学识渊博还在其次,关键是懂西学而有分辨能力,这显然与他在“文革”中学会洞察时事有关。

1968年夏天,我们结识了一批所谓“老知青”中的理论家和思想者,他们大大地打开了我们的理论眼界。我们一直囿于研究“两个司令部”、“两条路

线”的斗争，从上层政治和群众派性入手理解“文革”，他们的着眼点是经济和社会。我们看的书是《国家与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们读的是《资本论》。他们原是各中学的学习尖子，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考不上大学，怀着满腔热情上山下乡。他们的丰富阅历和实际生活能力使人佩服，但与他们相处，总让人感到一种对生活悲观甚至绝望的心理，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或多或少具有“天之骄子”的气概，总认为自己还能对社会有所作为，而他们呢？不论说起来是多么上天入地、出神入化，实际上心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凉情绪。可能正是缺少一种锐气和冲劲，他们虽然在1977年参加了高考，不少人上了大学，但后来都很实际。其中最聪明和有才气的一位，以极高的分数考入大学，弄了一阵相对论，想用另一种数学方法推导出与爱因斯坦相同的结论，现在却在翻译关于打桥牌的书籍，拼命挣稿费，想当初，我们以《父与子》、《罗亭》等书为中心讨论“多余的人”这个话题，以托尔斯泰的《克莱采·朔拿大》为引子探讨性爱，那充满空灵幽远之感的黄昏漫步，那唇枪舌战、神采飞扬的通宵达旦的“思想会餐”，现在已可忆而不可追了。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红色年代的疯狂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演变成“武化大革命”和“全面内战”，我和同学们天天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对“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语词用心体会、反复玩味。以为文化一革命，中国和世界就会大变样，以为首先解决自己思想和灵魂的问题，然后重新安排山河与社会就不成问题。当时并不明白，在高叫“彻底决裂”的革命年代，这些全是中国传统中“内圣外王”、“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旧套路，人们更不会明白，最初的“破旧立新”的喧嚣，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既然要搞文化革命，就要“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即相应的新思想等等。大约从1966年6月起，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在停课闹革命。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上街去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散革命传单，内容多半是歌颂领袖(称之为红太阳、舵手、救命恩人等等)和向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与事物开战，并决心埋葬“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每次都错过了晚饭时间才返校，大家身体疲倦、嗓音沙哑，但精神却极为亢奋，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五四”运动的传人。

一次宣传活动结束时，一个高中三年级同学不知是因为真心诚意，还是想出风头，一本正经地提出：“我们老是说要破旧立新，为什么不对自己的名字革命呢?你看，×富贵、×洪顺，这不是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吗?”他的高见得到一片喝彩，大家立即赶回学校，几分钟之后广播里就响起了更名倡议。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徐锋，表示向雷锋学习之意。但马上有人提醒说，邻班一个女同学叫徐枫，招呼时如何区别?一个男同学叫王宗光，为避免“光宗耀祖”之嫌，更名为王革命，但立即被指责为“忘革命”。班上年

龄最大的一个同学可能是惟一不喜欢为了显示革命而改名的人，他居然巧妙地化解了难题。他名为×宝来，大家都起哄说，“宝来”意味着想发财。但他灵机一动给出了新解。当时《毛主席语录》叫做“红宝书”，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叫“传经送宝”，他说自己的名字意指迎接毛主席著作，于是大家无话可说。

一场“革命化”的活动结果成了哑剧，大家嘻嘻哈哈，互相攻击打趣。革命的名字谁也记不住，叫不起来。但一些趣事倒令人难忘，比如我最要好的朋友叫闵仕，这个名字被释义为“关起门读书，为了当官”，当然有浓重的封建味，于是他改称闵为民。更名之风几十个小时之内就从学校刮向社会，大街小巷一天之内全部换了新名称，成都市的中心盐市口改为英雄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改为反帝路，医院名称多半叫“白求恩医院”，商店许多都叫“向阳食品店”，等等。

“破四旧”的典型是抄家，凡家庭政治背景有这样那样“问题”者，红卫兵都会打上门来，由于居所附近红卫兵各自为战，有时一个家会被抄多达五六次。我最初觉察到这件事，是发现运动前一些所谓“红人”，即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平时意气风发，惯于发号施令者，一下子灰头土脸，身子像矮了半

截。当时革命气氛下，似乎有一项不成文规定：凡家被抄者都得在会议上向大家交待、检讨，谈父亲或母亲的“罪恶”，表示要划清界线、靠拢革命。从坦白交待者的声调和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经历了多重痛苦：被抄家即意味着家庭属于“反动”之列，前途令人绝望；到学校作交待显然是家丑外扬，自己的面子扫地已尽；在革命运动中同学们为了表明立场，群起而攻之，落井下石者亦大有人在，面临此境，犹如大棒击脑，懵然失措，或如利刃剜心，内心滴血。

我家大院内许多家被抄，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每次回家临近时，远远看见有一群人围聚在那里，心中就一阵发紧。犹豫再三，还得硬着头皮往家中走。许多人事后都讲过自己这样的体验；如果走近一看，被抄的不是自己家而是邻居，心中油然涌起一阵见不得人的轻松感，但“是祸躲不过”，那致命的、令人心悸腿软的一击总会落下来。这时，又有一种阴暗心理时隐时现：如果遭殃的人家多一些，日子反而会好过一点。最令我心惊肉跳的是对门一家被抄，事主为女性，身份是店员工人。她前夫为国民党军人，溃撤台湾时，他留了下来，想看看形势，心想若新政权不错，也可在之下效力。他被逮捕，从服刑之日起夫妻就离了婚，但这

位妇女仍被当成“反革命家属”而被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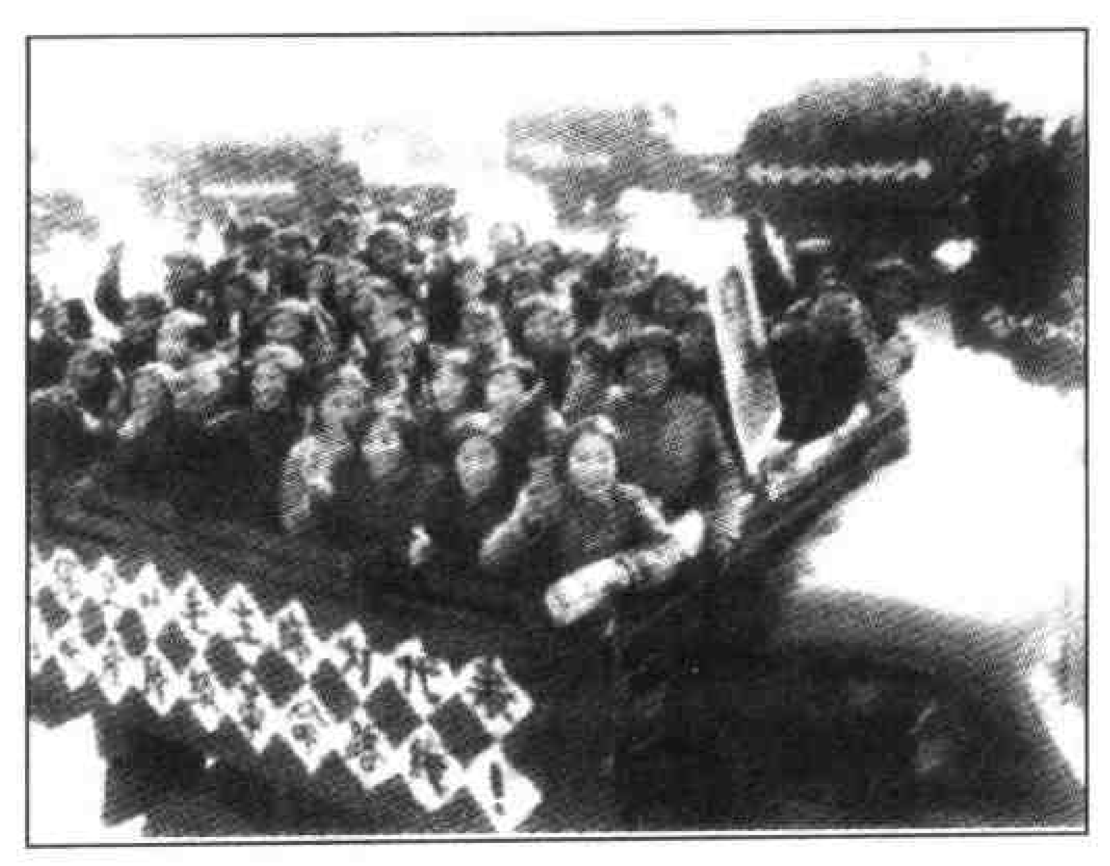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中，“破四旧”，即抄家打人之风发源于北京，它如野火一般在全国燎原，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报道，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最高领袖的肯定和鼓动。有人至今仍在问：为什么年轻人一夜之间变得如强盗和野兽一般，他们怎么不去想想那全国统一的教唆和号令？

大串连和受检阅

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是神奇，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变成真实。在“文革”前，许多中学生的最大野心，最高理想也就是能去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照一张像。可能很少有人奢望能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文革”一爆发，全国数千万学生可以免费去全国任何地方串连，从 8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26 日，有一千多万人分 8 次在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1966 年 11 月 3 日，在天安门广场，我在 200 万人的行进浪潮中，在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受到毛的检阅，但我实在说不上来，我是亲眼见到了毛泽东，还是没有？

我最初知道串连是在 6 月底，那时革命传单满



天安门广场上迎接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

天飞，有一份西安交通大学革命造反学生的紧急呼吁传到成都，说当地党委对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请求全国的革命战友支援。我们在的成都一中去了一些学生，这只能算是民间性的自发行动。官方组织的大串连始于8月之后，按中央文件规定，中学生可以推举总人数十分之一作为代表去北京。被推派的人当然是家庭出身最好的学生，出身不好的同学被贬称为“黑五类”(即父母为下列五种人之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连拥有《毛主席语录》和佩戴

毛像章的权利都没有，遑论去北京觐见。

到了10月中旬，学生们不再按比例和家庭出身，纷纷外出。当然还得到学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之类的地方开介绍信。与我同行去北京的伙伴介绍信上专门注明他家庭出身为国民党官僚，这使他惴惴不安，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由我去做。但到了北京，每个串连者都被称为“红卫兵小将”，接待站的北京市干部操着悦耳动听的普通话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受宠若惊，犹如置身于仙境。

所谓串联，就是学习革命经验。我们每天跑北大、清华、市委等单位，虔诚地抄写一份又一份大字报。记得其中有谈贺龙要发动兵变的揭发，使人极为震惊；还有北大的学生写出洋洋万言，从黑格尔、列宁引证到毛泽东，证明存在一个辩证转化过程，因此聂元梓从革命派变成了保皇派。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令人眼花缭乱，我由衷地感到，在北京，真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而革命发源地的政治思想水平之高，也令人咋舌。

当接待站的负责人宣布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时，我惊讶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好一阵，才感到幸福的暖流穿过全身。

但检阅的过程实际上是乱糟糟的，没有我预期

的那种神圣庄严气氛和精神上的升华。我们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被叫醒，到东单附近集中。每人要认准队伍中自己前后左右的人，说是为了防止坏人混入，还要相互搜身，严禁带刀子、照相机等等。虽然发了一份相当丰富的干粮，但大家很快就吃光了，到了清晨又冷又饿，只好以原地起跳和跺脚来暖和身体。当检阅终于开始时，每个人身体和精神已是疲惫不堪。

我们等啊等，天安门城楼始终可望而不可即。队伍偶尔向前蠕动一点点，大部分时间是停滞不前。显然，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人，都不愿意向前走，要让那日思夜想的幸福时刻，凝滞在自己这里。在难耐的等待中，广播喇叭中传来陶铸(当时排名第4，仅次于毛、林、周)的声音："同学们，今天的检阅，也是对大家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请大家向前走……"

我在关键时刻铸成"终生遗憾"，这是因为好心的解放军带队引起的。出发前他告诉我们两点诀窍，第一，鞋子要另外用绳捆在脚上，不然，到广场上拥挤时，鞋子多半会被踩掉，弯腰拾鞋，可能被拥倒而被踩伤，甚至踩死；第二，许多人在天安门前一拥而过，还没有辨认出远处城楼上哪一位是主席，就过去了，只落得终生遗憾，因此，接近检阅台

时，就得用眼睛搜索，全神贯注盯住那最高大魁梧的一位，以便走近时多看一会儿。我照他说的如法炮制，眼光始终瞄准一位身高出众的目标。但临近时却见这人在快速地前后移动。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他老人家决不会如此不庄重！我突然醒悟过来，他是记者！那毛主席在哪里呢？等我再想努力，好好看上他一眼时，已被人流的波涛和旋涡卷走了。

我带着失望和痛悔的心情拼命挣扎，回头张望。只见广场上乱成一团，可能有成千上万双鞋被踩掉，人们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拾起鞋并不穿上，而是使劲扔向天空。我的视野中，天上终是一片鞋雨，又像上百只乌鸦在扑棱扑棱地飞动。我心中油然生出一阵气愤，在这举世瞩目的庄重时刻，这也太煞风景了。我甚至疑问，以前看过的纪录片，那明亮、欢快、热烈的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一天的检阅，有200万人，但据说一半的人是无功而返，他们将继续留在北京，等待下次。

被毛亲自检阅过的人，心理上有一种巨变，犹如被总司令亲自接见过的士兵，激动、自豪之后，真能做到头可断、血可流，为首领冲锋陷阵。返回驻地的当晚，就挨个发火车票，要大家"杀回家乡干革命"。干什么革命？打倒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就从言词和笔墨的"口诛笔伐"发展为拳脚相加，棍棒与钢钎相向，甚至正规枪炮的交火。群众组织一旦分为对立的派别，就会视自己为革命派，对方为反革命，必须搞垮、摧毁而后快，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任何一点小磨擦和冲突都有可能酿成大武斗，因为一个地区同一派的"革命战友"之间是相互支援的。四川的武斗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大致分两个阶段，开始是所谓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干，保守派失败之后，造反派中两派发生更激烈的交火。我曾目睹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武斗，成都大规模的武斗始于1967年5月，两场大武斗下来，造反派彻底打败了保守派。两次大规模武斗都发生在国营大厂，因为大厂是正规产业工人集中之地，工人思想更为正统，更支持基层党组织，组织纪律性强，"保守"势力顽固，不易被造反势力搞垮。他们的组织名称叫"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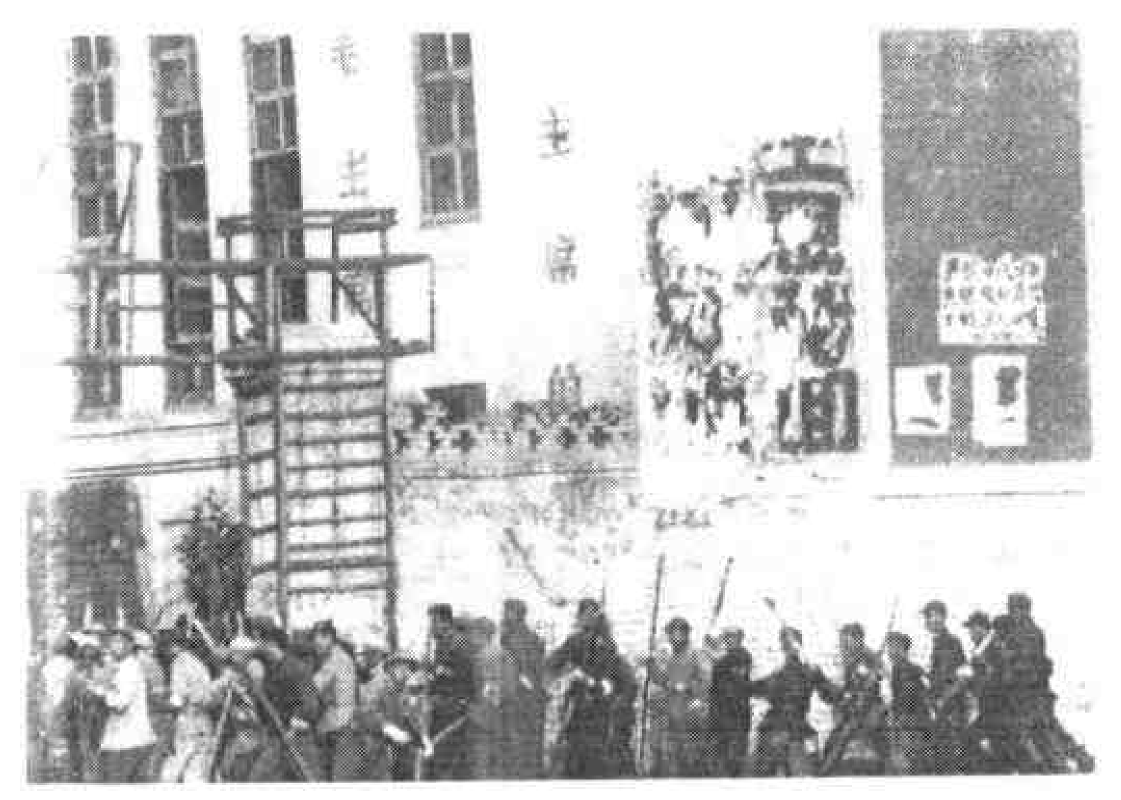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川棉一厂，据说起因是厂内两派起冲突，造反派寡不敌众，向外求援，于是形

成全市造反派攻打该厂的局面。到5月4日，战斗达到高潮，当我上午赶去观看时，“产业军”已被围困在厂区的--栋大楼里，但困兽犹斗，对大楼的冲击一波接一波，但久久不能攻克。

武斗场面和我想象中古代攻城的方式一模一样。攻方冒着如雨的矢石，把云梯推到楼下，搭在楼墙上，然后是戴藤盔、执木盾的敢死队员顺梯爬上，企图跃上楼顶平台，或攻入顶层房内。守楼的人则拼死抵抗，他们集中攻击梯上的突击队员，用砖块砸，甚至用水泥预制板砸，或者用木棒、铁棍顶云梯，使其翻倒。梯上的攻击者不断从半空中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攻方指挥这时就命令下面的人以暴风雨般的石块加强攻击，以作掩护，把伤员抢救回来。我身临这战区内，把这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只看见梯子--架架被掀翻或砸断，遍体鳞伤的人不断被抬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去，但敌方城池依然在屹立。面对这惊心动魄的血肉搏杀，喇叭声、吼叫声、门窗破碎声、汽车鸣叫声似乎都难于引人注意，我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久攻不下，伤员猛增，迫使攻方改变进攻策略。他们放弃从外面的强攻，转而从最底层顺着楼道向上艰苦奋进。楼道口显然被堵得死死的，而且每层都有重兵防守，这种进攻不用说每前进·步都

必须付出惨重代价，我虽然看不见里面攻防的实况，但可以想象其激烈的程度，而且可以从各层的动静看出攻方正艰苦缓慢地节节推进。终于，顶层一个房间的窗口伸出一根竹竿，上面绑了一块白布，它懒洋洋地在空中晃动。“胜利啦！”突然间欢呼声雷动，经久不息地响遍整个厂区。过了一阵，从大楼里鱼贯而出的是一列战俘，他们的双手举得高高的，投降姿态做得并不正规。迎接他们的是咒骂和唾沫，第一次投入战斗的“革命群众”似乎没有继承正规军“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突



手持长矛、棍棒的武斗人员

然，我瞥见了同校的一个女生，她又高又瘦，双手也举得高高的。不知为什么，我产生了窘困的心理，我似乎怕她看见我，也更像是怕她知道我看见了她，我莫名其妙地离开了现场。

第一次大武斗余波未平，紧接着在5月6日，就爆发了所谓“132厂血案”，它震动全国，一时引得援电飞驰，并导致中央立即发出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10项决定，当时以“红十条”著称。

132厂在成都远郊，是一个大型的战斗机制造厂。据说，武斗起因于占压倒优势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冲突，于是引起全市造反派的支援和围攻。

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是“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大本营，5月6日那一天，全市各处都有公共汽车和其他汽车开往132厂，载着一车又一车的人去攻打“产业军的顽固据点”，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搭车去那里，我随着众人跳上一辆车，赶到战场。

这次武斗规模比川棉厂那次更大，从外面赶到厂区的人不下数万。看来两派也是逐车间、逐楼房地争夺，我到达不久，就看到进攻的造反派逐渐把护厂的保守派压缩至主楼周围。正当人群将大楼团团围住，准备发起总攻时，突然听到一声清脆震耳的枪声，当即有人倒地。这大概是成都地区长期绵延不绝的武斗的第一枪，人们惊呆了。进攻一下子

停顿下来。

但“革命群众”确实勇于实践“抛头颅洒热血”的誓言，未过几分钟，攻势又起。护厂者大部已撤入楼内，只有不多一些人在楼旁巡行，眼看进攻者逼近了快要入楼，他们就放上一枪，到后来枪声越来越频繁。开始时每一声枪响还能暂时阻滞一下进攻，到后来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进攻的一方很快就占领了这座大楼，楼顶平台上，有人挥舞造反派的红旗，颇有点像电影《攻克柏林》的景象。与电影镜头更为相像的是，从邻近一栋楼传来了枪声，舞旗者应声倒下，但马上又有人把旗帜高举狂舞，枪声再起。如是情况重复了大约四五次，人们的心像吊到了嗓子眼，下面仰望高楼的千万人既愤恨，又惊惧，悬着的一颗心也满怀希望。终于，有一杆红旗持续挥舞下去，接着，许多面旗帜在顶层平台上飘扬。

护厂者以枪手在前后左右作护卫，一边鸣枪，一边冲出重围，杀出厂区。据说，他们要到附近郊县，与人多势众的保守派“秋收起义战斗军”会合，搞“以农村包围城市”。

事后知情，护厂队称他们开枪是有理由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当这种重点国防工厂遭受冲击时，可以开枪。但“文革”中造反派掌权，开枪者

后来被当作刑事犯判罪入狱。当形势逆转后，他们被无罪释放，听说又当成了护厂英雄。我不知这种罪犯和英雄的角色转换,反复了多少次。

在132厂武斗中，中弹死亡者有五十多人，我校初三一个女同学贺莉被打死，子弹斜穿入胸。当我们准备为她举行隆重追悼会时，她的遗体被运到她所属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战团”，作更为隆重的追悼会之用。她的母亲作为“英雄母亲”受到无数赞扬和慰问，而父亲则始终未露面，因为政治面貌或历史有问题，不便在革命的场合以正面形象出现。

中央文件“红十条”称132厂“五·六事件”中开枪的人为“枪杀群众的凶手”。我猜想，当“文革”被否定后，这个定性也会改变，受处罚者的冤案也会平反，但两派中无辜死去的那么多人会得到一个什么说法呢?

原载《华夏》1998年第2期

求学新历程

涂 晓采写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人们把“文革”前的中学生称为“老三届”，把“文革”后头几批进大学的学生称为“新三届”，你是“老三届”，也是“新三届”，对吗?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是不是使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某些特征?

你说对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是七七届大学生，即“四人帮”垮台，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我们这代人的特殊经历、心路历程、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我最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那属于理性的分析和反思。我猜想，你感兴趣的可能还是

感性描述。

□对，我想了解的不是一般的“我们”，而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我”，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过程。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还有我的妻子，始终认为，在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文革”之后我们还有幸进了大学之门，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重要的事件。说得再干脆一点就是，在各种世俗的东西中，金钱、地位、名声等等都可以不要，但大学非进不可。不进大学会使我们终身遗憾。我至今还把圆了大学之梦，归功于邓小平。虽然说到底，受教育的权利是我们自己的。

□这话怎讲？

记得在1973年春，传来了国家又要“开科举考”的消息，我和我妻子——那时还没有结婚——很是兴奋了一阵，下班后拼命看书。我们的业余生活从来都是看书，只不过那时改成了复习课本。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把我们的梦想打得粉碎，她抱住我痛哭了一场。“四人帮”垮台后，我们“贼心不死，蠢蠢欲动”，但很久都没有动静。我们有个亲戚，是大学系主任，他断定我们不可能再上大学，因为年龄太大了。你看，连同情我们的长辈，又是教育界内行，都认为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能设想，在中

国，还有谁在制定政策时能想到我们。

□你认为“老三届”学生能上大学，和邓小平有直接关系吗？

是的。邓小平复出后，紧接着就是“科学的春天”，当听说有可能恢复高考时，我们一夜未睡，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长信，寄给著名物理学家杨澄中，请他转交。当然，十之八九邓小平并没有读到这封信，但最后终于给了“老三届”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作出这个决策还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当时已经30岁了，许多人都有了小孩。

□你“文革”前受了完整的教育，又一直未丢书本，进大学应该很容易吧？

并非如此，成绩是一回事，但招生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政审标准。记得当时政策上也没有说每个“老三届”学生都能考，只有其中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我以为这话很当真，背了一大包书去厂人事科，要他们考我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和生物化学等等，人家笑了一阵就给登记了。我把自己弄得这么居高不下，结果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我知道，不论是别人认为我成绩不好，还是我自己明白的政审不过关，都是使我极度蒙羞的。

□那你怎么还是七七届大学生呢？

据说邓小平了解这次招生情况，叫各学校挖掘

潜力，再招一批走读生。我是在大学已经开学几周之后，在1978年春入校的。学校、专业都和自己的志愿无关。进校后我了解到，我的同班同学高考分数一般都相当高，我们进不了重点院校，只能到师范学院，主要原因是年龄大，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们所在的大龄班，有人数学比专业老师水平高，有的人英语比外语系老师还好。进校后第二年，七七届学生有好几个人考上了研究生，大学老师条件比我们好，报考研究生的人比我们多，但比不过我们。

□你以走读生身份入校，是不是曾经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心理不平衡？

有一点，但不强烈。我表弟受我影响很大，“文革”后期在我指导下自学，他考上四川大学生化系，我也是第一志愿报这个系，他的女朋友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他们准备高考时我对他们帮助很大，但我的结果最差。不过，我好歹也算入了大学，大家心情终于轻松了。我知道，“文革”的流毒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能恢复高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能给“老三届”一次机会更是难能可贵，而不少人落第之后，居然通过走读终于圆了大学梦，这确实有点近乎于奇迹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很有远见的，是不

是?

当然是这样。“文革”后头两次高考，从老三届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人才，现在这部分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我现在还想强调很少有人谈到的另外一个方面：“老三届”一代人中普遍认为，因为“文革”，自己的青春、前途给毁掉了，从道义上说，他们有权利要求一定的赔偿，虽然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恢复高考时放“老三届”一马，也算是一种道义上的补救措施吧！不然，把社会上最有抱负和活力的一批人拒斥在体制之外，无助于化解，只会加剧社会内部的张力。

抗拒愚昧

□ “老三届”中的大学生，许多人知识积累、生活阅历要丰富些，与他们经历了“文革”有很大关系，你是不是这样看?

当然如此。我们进校后按年龄分大班、小班，小班的同学对一些年长同学十分钦佩，其实，回想“文革”前，我们很蠢，很可笑，我是指没有头脑，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我“文革”前完全把班主任、团支书，甚至入团介绍人的话当成圣旨，其实那时很多做法是很荒谬、可恶的。比如，我有个初中同学读完

《红楼梦》，请我帮他还书，我在课桌里放了几天，团支部派人偷偷去翻，背后议论我思想不对头。有一次写作文，我引证了《静静的顿河》、《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被语文老师批得一塌糊涂，当反面文章在全班传阅。所以，当1966年6月北京女一中、四中学生要求废除升学制度，中央决定为了搞“文革”而推迟高考时，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由衷地高兴。我们那时正在分文理科，准备分科复习，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扔下书本，去写大字报，那时叫做“拿起笔，作刀枪”。

□但我有点弄不明白，依你前面说的，你好像是个一心想读大学，搞研究，做学问的人。

我的性格和家庭教养是这样，但人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要追求人生的意义，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更有意思，那叫灵魂得救。而在当时，全部意义都归结到“革命”二字上。我们当时因为自己没有能够赶上“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等等而觉得很可能要抱憾终身了。我高中毕业时就向班主任提出过，准备放弃高考机会，上山下乡干革命。所以“文革”一爆发，大喜过望，以为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于是以十倍的激情、百倍的疯狂去冲锋陷阵，去打倒和捍卫……

□看来，对“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教育，还需要分析和清理。

对。理想好像天然和崇高的东西相联系，但“文革”前浓烈的理想主义氛围中，分明有愚昧和虚伪的东西。当时对我们说，“农村是最需要革命青年，最需要知识文化的地方”，“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我打算放弃高考和下乡，就是以革命为出发点和公理，以上述口号为公式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但事实是，那些被物色成接班人的人，并没有打算到农村这个最艰苦、最光荣、最革命的岗位上去，他们上大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在1968年底、1969年初下乡之后也是这样，那些家庭革命成色最重的人，很快就通过参军、内招脱离苦海了。

□那种“革命第一，理想至上”的精神，经历“文革”之后，你是强化了，还是抛弃了？

根本的东西没有抛弃，但表现形态完全变了，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爱知识、爱文化的本色，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变成“革文化的命”十分反感，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当时想的，首先要把自己救出来，不能盲目地给别人当政治棋盘上的卒子。“文革”后期我经历了好多事，终生难忘，给你随便讲几件。

1968年我从重庆探望我哥哥回家，在火车上看《二刻拍案惊奇》和《警世通言》，列车员来回看了几次，报告了执勤军人，他们来没收我的书，我和他们辩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继承”，但执勤军人说，他们有明确命令，除了毛选和《红楼梦》，其它任何书都在禁止之列。

下乡前，我们一批人打算系统学习马列原著，但书店里只有“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根本买不到马克思的原著。听说抄家、抄图书馆后有些书送到了废品站。我们理直气壮地去买马克思原著，说要有市革委文教组证明。我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去市革委，军管会一位军官出来接待，他一听说是想买马克思原著，就皱眉头教训说：“林副主席教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那时很善辩，说为了更快地攀顶峰，还是打好基础，从山脚下走起吧！后来越辩越激烈，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打电话给学校调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样子还打算扣人。我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跑掉了。我终于还是搞到了一些书，记得刚下乡，我主动要求去踩水车，在水车上看完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你们这一代红卫兵，退下政治舞台后，还在

继续考虑中国的问题！

这是读书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内容，看马列原著，看各种内部读物，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等等。我后来读到过你的回忆，还和各地的同代人作过交谈，我发现当时我们这些人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模式惊人地一致。列出书单来，大部分是重合的，什么“黄皮书”、“灰皮书”。《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俄罗斯古典名著，等等，考虑的问题也惊人地相似，从“文革”思考到中国革命的历程，到十月革命，还到法国大革命。我和周围的人有些不同，我古典文学名著读得很少，因为中学时期，把能找到的读得差不多了。另外，我比较系统地学了自然科学，主要学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用的全是大学正规教材，主要是想在农村搞科研，也搞起来了，改变了农村面貌。另外从哲学角度上看，不满足于对人作冥思苦想，感到现代生物化学有可能从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对人的本性研究取得突破。直到 1971 年有次回城，看到《人民日报》上基辛格访华的消息，还有一幅周总理和他以迎客松为背景的照片，我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感悟：学外语。这一点很难，我一直学俄语，周围同学绝大多数也学俄语，找不到书，连发音都不会，只好每次赶集时走 30 里路找一个学英语的同学教。不过，我

自学总讲正规，英语书一般人就知道许国璋编的一至四册，我还学了俞大絪编的五至六册，徐燕谋编的七至八册，以及配套的《英语精读课本》，学到后来力不从心了，作业是翻译《镜花缘》和《红楼梦》，太难了！这种自学很悲壮，也很畸形，我会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但一句也听不懂，一名也不会说。

□这么发奋地学，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

二者兼而有之。我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也从马克思的话中得到鼓舞：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我知道，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靠知识。我坚信知识总会有用，其实，即使没有 1977 年的高考，我也自信不会前途无望。不过在当时知识一分钱也不值。我 1972 年回城进厂，不久厂里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磨床使用不好，需要翻译说明书，设备科的人请一位学过日语的技术员翻，他们居然不知道说明书是英文！我利用工余时间花一个礼拜就把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翻好了，交给那个只会日语的技术员，没有一个人来谢一声，更不用说考虑发挥我的一技之长。

但更深层的动力是精神上的，我当时认识很明

确：搞“文革”的那帮人想把所有的人都弄成愚昧无知，成为机械服从的工具，他们才好统治，我必须自救。我曾和一些朋友激烈地争论，我批评他们不看书，不学知识，我话说得很过分，我说，喜儿被黄世仁凌辱了还要反抗，要报复呢，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求知的天生权利，难道就任意给搞成白痴，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其实，他们也有所追求，他们认为，“文革”把人弄得残忍、互相仇视，他们追求善与美，没事就聚在一起听音乐、看风景，说窗外河边的树丛像苏里柯夫笔下俄罗斯的白桦林等等。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不错，但那总带有“享受”的味道，我觉得求真更难，要与自己的惰性过不去。后来恢复高考，他们中有人惊呼我有先见之明。我的追求被这么实用性地理解与表扬，真使我哭笑不得。

学无止境

□对许多“新三届”学生来说，1978年开始的大学生活是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新起点，是一个大熔炉，许多人在这里锻炼成材。我采访过许多人，他们回忆起当年岁月就激情满怀、感慨万千，你的感觉如何？

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当然，那时的政治生活是很令人兴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批改革的思想先锋在大声疾呼，首批出国考察的人带回关于南斯拉夫和东欧改革的信息，关于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还有卢新华的《伤痕》引起的轰动，等等。也有很多琐屑的事情，比如新学生进校后瞧不起原先的工农兵大学生，双方不断摩擦，冲突，还有就是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地位大变，想抛弃在农村或原单位的配偶，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看过一篇小说，好像叫《杜鹃啼归》，就是写这类事情，很真实感人。我那段时间，只觉得累，疲倦得要命。进校前小孩刚出生，马上大病一场，我日夜守候，进校后整日精神恍惚，上课只想瞌睡。二是功课重，国家急需教师，学校决定把大班变成快班，3 年学完 4 年课程，用最难的教本，派最好的教师，很多人跟不上，他们上学前在本单位都是骨干，感觉良好惯了，一下子变得悲观苦闷。当然，我对大学本科期间感受不深，主要是我只读了一年就报考研究生，第 3 学期既要跟上功课，又要准备新的考试，小孩又住院动手术，只觉得累得天昏地暗，心力交瘁。

□你的专业是数学，怎么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

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大学报的是生物化学，差点落榜，弄了个走读。但我本来就极喜欢数学，所以接受既成事实一点不痛苦。我自学数理逻辑，第一年研究生这个项目较多，第二年基本上没有，我于是改选相关学科。你知道，我后来的专业是研究罗素的哲学，没有数学基础是不行的。

考研究生时，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把握不限于一两个科目，对于一直苦心准备的人来说，社会条件稍一松动，机遇就有的是。我考研时的选择，以及进去后具体专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觉得，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可以做的事很多，我认为改变思维习惯很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文学艺术、人生体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的、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我后来在一部专著中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精确地表述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论述习惯。基于这种考虑，我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目的是想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科学理性的不足。

□你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还是十分高兴吧？

心情很复杂。这个结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因为我从1966年起周围的人都不学习时从未中断过学习，但又像在意料之外——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好消息往往是假的，而坏消息却是真的。有亲友祝贺我时不无遗憾的说，你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社会”两个字就太好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积几十年之经验，搞社会科学危险。当然，我更明白，不少人对社会科学是否真是科学，深表怀疑。尤其是哲学，在不少人心目中，不过是耍嘴皮子，为任何一种政策作论证。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同一些人，证明大寨道路惟一正确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也可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搞哲学，往往强调自己大学念数学。如果有人挖苦说，哲学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我只好谦卑地声明，我力争当一个例外。当然，我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自卑情结。中国人很封闭，他们不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哲学是一大套学问，受人尊敬，并不是宣传。

□你念研究生时情况怎么样？

简单一句话：乏善可陈。3年研究生期间，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哲学系80个学生，租了通县一个大车店两层住在那里。惟一正规上过的课，是每周逻辑专业的同学上两次数理逻辑课，我也去参加，上了一年。当然，说到底哲学不是靠别人传授

知识学得来的，虽然没有课程拘束，我可是抓得相当紧。当然，我很不情愿始终是“自学成材”，很想上课。研究生院总部设在北师大内，借了别人一间房。那里开的外语课极好，我去上过两次，但每次单程要花近3个小时，我只好恨恨地作罢。我恐怕是命中注定什么都得靠自学，而且学一点东西要花极大的代价。我毕业拿到学位后，觉得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不到外国去看看怎么行，于是搞英语听力和口语。别人都送到外院去培训了，偏偏我去不成。于是，买个黑白小电视，每天听 Follow Me。学到 1985 年，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在所里主事，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搞出国名额公开，凭考试竞争，我通过了本所竞争和教育部统考，去了英国牛津大学。

□你似乎很乐意在书海里泡，在知识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可能是性格，也可能是对运气不好的过分反应。我看到许多人靠灵感写作，靠自学艰苦卓绝地思索，但不是才气早夭就是走到旁门左道，终究不成正果。我在牛津待了两年，后来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待一年，我深感花大力气打基础开始耗费太多时间，拿出成果很晚，但最后会感到受益无穷。我可能是在 45 岁之后才不追求像学生那样学习。我认

为,灵感和勤奋,缺一不可。

为人与为学

□你觉得自己十分勤奋吗?

一直不,直到 1985 年秋天被派到河南去支教,社科院各所的人住在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同样是科研人员的人,竟把许多时间用在聊天,买菜做饭,打牌和跳舞上面。直到有人说,和我在一起很感不好意思,我才意识到自己比有些人勤奋。讲师团工作结束时开总结会,大家关系不错,意见提得很坦率。我记住了别人对我的批评:工作那么认真居然不是党员,而且不写申请!我也坦率地对别人提了一种希望:既然进了社科院,就相当于运动员给选拔进国家队,恐怕大运动量锻炼是免不了的,在国际学术竞技场上,就靠我们去进球了,过小日子的习惯怕是不行的!客观地说,我很想勤奋也勤奋不起来,生活条件太受限制。每天上午拎着菜篮子上街,洗菜切菜做饭,每天千篇一律,只好安慰自己:权当是调节脑子吧!

□你是不是觉得生活条件太差?

当然差,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心甘情愿。我 1982 年毕业,睡办公室,住鸡毛小店,后来一家人

住仓库改装的平房，每天都痛感为留在北京工作付代价：住房问题十年之后才基本解决。但相比而言，北京的科研条件、文化气氛是全国最好的。我1985年当正研究员，工资说出来别人都不信，说我骗人。但我想，自己下乡时，当锻工时发过愿，万一有一天能天天看自己想看的书，只要有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满足了。实际上，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比当时设想的好，而学习和研究条件大大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只不过一般人得到之后又要要求更高，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个人可以抱“君子固穷”的态度，但从政策角度，并不赞成把搞基础研究的人弄得如此穷酸。我1994年底到海南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单位经费花光不能报销旅费，我自己掏钱坐火车、汽车，单程就要费4天，而那些当工作人员的小姑娘都是飞来飞去的。1995年去西安开会，又说报销不了旅费，我急了，我说，说实话这点钱我出得起，但堂堂社科院是不是太没脸面了？后来好不容易弄了个特批。就个人而言，我很欣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这些处世格言，去争什么东西，很累，而且显得自己在计较什么。如果能够双手一挥，痛快地说一声：“我什么也不要，由它去吧！”那是很解恨的。但中国几十年总是斯文扫地，有时因为政治，有时因为经济。你不从每件小

事上去认真计较，只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那就只能听任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

□你是不是有“学术至上”的倾向？

学术与其他东西相比，例如政治的冲击，金钱的诱惑等等，我承认有学术至上的倾向。许多年来，我们似乎可以捍卫各种各样的尊严，但很少提到捍卫学术的尊严。学术尊严很难做到，学人的尊严也很难做到。记得我刚到北京时，曾有过短暂的精神危机。我以前多多少少把社科院想成雅典的学园，里面的人虽然不会各个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总应该有点仙风道骨吧，谁知到这里一看，简直不是这么回事，而且往往截然相反！当然，我现在不便细说，而且不一定是社科院的人的过错。我第一次出差，去开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个女同事和她丈夫闹离婚，从办公室追到车站，大打出手，火车为此晚点十多分钟，乘客们议论说：“还是社科院的呢！”我羞愧极了。你现在到我们院里去看看，墙壁上全是卖粉丝、海米的广告，或“款式新颖、厂家直销、欲购者到×所×楼×号房间”。我不信不搞开发就做不了学问。

□你是如何看待学者使命的？

表面上我做得还可以，专心致志，专业和兴趣从未变过，但内心一直有些矛盾。这是“独创”和

"教化"的矛盾。一方面，研究工作的本质应该是新颖性和独创性，你应该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把属于自己的那点独特的东西端出来，留给后人。另一方面，有时我想，即便是学术，个人那点东西又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很低下，如果整个学术界水平都不高，你一花独放又有多大意义呢？特别是看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东西满天飞，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师在那里误人子弟，你会觉得普及是当务之急，提高是下一步，应该让人先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知识。这时你会有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心态，把开启民智，介绍新知放在第一位。当然，有时会产生委屈了自己智慧的感觉。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新三届"这段经历的？

像许多人一样，那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绝望和期待混杂的状态，为今后能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找到了一个起点。当然，对我来说，它并不意味着展现了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新天地，但对于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它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入口。我理解，对许多人而言，那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但我不赞成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荣辱得失作为判断历史的标准。中国要臻于理想境界，还需要

不止一次的更深刻的变化，那一段拨乱反正时期，说到底也就是结束荒唐岁月，较为恢复了常态和理性。我担心，这一次变革的受惠者许多已经功成名就，满足于现状，他们开始现身说法，用赞歌和自誉代替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我想，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成就能不能在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还得看。

原载徐晓主编：《洗礼岁月》，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老三届”反思

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有人说，我们青春无悔；有人说，我们劫后辉煌；有人说，我们是苦难与风流的一代。我要问，这一代人敢不敢正视自己的经历与良心？

30年前，近千万学生青年自称为(或被封为)红卫兵革命闯将，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烟，把锦绣山河搅得天翻地覆。在他们当仁不让地准备分享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时，最高领袖发话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灰头土脸地退下政治舞台，从此去品尝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他们的声音，这声音现在强到任何人都不能装作听而不闻。这一次不是以前那种冲锋陷阵的呐喊，而是对昔日辉煌一往情深的追忆，也夹杂着命运多舛的哀怨，以及对下辈今不如昔表现的啧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这千万人中的

一员，我有这一代人的自豪，这一代人的悔恨，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禀性，这一代人仍想握住历史的野心，但我想强调，我更愿作这代人作得远远不够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对于战败国的反省，我们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我们的情感爱憎分明。德国总理勃兰特以无罪之躯，慨然下跪于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此举赢得我们由衷的赞佩。而东邻某些人的抵赖、强辩、推诿，令人鄙恶交加、义愤填膺。今年的“二战”纪念时时使我产生联想，当年以大字报的揭发批判伤害过教师、校长心灵，以拳打脚踢虐待过“牛鬼蛇神”，唾骂过“黑五类”同学，批判过“走资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过悔恨及歉意？1966年夏季，中国各大城市被“红色恐怖”的风暴卷袭，不少人被“打死活该”，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城，当年干这些事的人，有多少后来关心过这些人的下落，去寻访屈死者的遗嘱，力所能及地作点减轻罪愆之事？

我曾把红卫兵运动比作青年纳粹运动，这引起了愤慨和抗议，我现在并不想把当年犯了过失的红卫兵和战争罪犯相提并论。但是，既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又不会被索赔巨款，仅仅为了减轻一点内

疚，仅仅为了使当年蒙冤受屈的人到头来感到世间毕竟还有正义良知，当年作过恶或犯有过失的人作点表示有什么不可以？

也许有人说，真正该负责任的人并没有得到惩处，凭什么追究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如果历史公正，终将会将元凶大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我说的不是历史或法律责任，而是每个人的道义感。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各个一肚子苦水。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话语如此有选择性，这种选择的隐扬匿显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岂不太奇怪了？再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

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现在是社会栋梁，乃至精神导师，当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亮相于电视节目中，接受荣誉称号和颁奖时，他们是否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无知和过失呢？

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把每个人都说成有这样那样的污点，我相信，许多人确实清白，也有许多人没有资格作恶。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是那些在

社会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责任如实地反映那个时代，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浩劫之后如何辉煌、自己既苦难又风流的故事时，也应顾及千百万被贻误终生的同龄人的情绪，也要计算一下整个民族付出的代价，尽管那场灾难在客观上既磨炼了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红卫兵，我想与同龄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们的回忆和反省，拼构复原那一段历史，这是改变了千百万人命运的历史，是改变了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历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寻采访，曾受到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听到不少闻所未闻的故事，结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忧虑的是，我感到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去，有的是全面遗忘，有的是有选择地遗忘。我也仔细聆听社会上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哗声，但我听到的多半是虚饰浮夸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为然和不耐烦是合理的。我深知许多人的愤懑，时代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东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们，而且挖苦嘲讽我们。问题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时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讲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该受误解，被可怜么？

有人保持沉默，既是无奈，也是高傲的沉默。

他们曾经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与毛泽东握过手，或与周恩来合过影，与军区司令员谋划于密室，部长和省委书记对他们点头哈腰。自己当年的喽罗现在当了总经理，当年以瞻仰自己风采为荣的“红小兵”现在当了博士出了国，他们内心很不平衡，表现出来却是鄙夷不屑。他们一举手一抬脚都要呼风唤雨，一开口就要惊世骇俗。他们绝口不谈过去，等待着有一天一鸣惊人，或者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后世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说法。这些人决非庸碌之辈，我永远不敢小看他们，但公正的历史就是重现当年的光彩么?他们倒没有丧失记忆，记忆是他们生活和心理的支撑，但这种记忆是一种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随时代变迁和反思而改变，它拒绝参与公共话语。我敢断定，私人记忆，不论多么顽强也不会变成历史，就如当年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集体的意识及无意识才是运动的潜流一样。我不相信，正确的历史只能等待某些风云人物有朝一日给我们端出来，我认为，它有待我们——不只是这一代人——共同发掘、交流与探讨。

有人说，这一代人的遭遇和历史，要50年之后才说得清楚。这话有一半是对的，没有时间距离就谈不上历史，看看现在大多数当事人还没有跳出个人地位和派别偏见的回忆和评论，就知道现在拿

出来的东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议论和片面狭促的印象。但是，没有半生不熟的东西，成熟的东西从何而来？如果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我们期望下一代怎么学历史？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能把责任给下一代吗？

我曾陪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父亲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有才气的诗人，他们同属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主人家中的气氛纯洁和凄凉得令人心碎，他们大半生被摧残，许多家庭破裂了，子女们疯的疯，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对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极其伤心地告诉我，经常有年轻人听说他们曾是“胡风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说：“啊，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当初的定性，80年代初给他们平反的通知，并非人人知晓。社会上的种种传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满意，就是给人伤害。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如实写出这段历史？”他吃了一惊，似乎从未想过可以这么干。他非常痛切地反复表示，希望我们了解真相、理解他们。我当时真想对他大吼：“你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怎么理解？你们逃避责任，对我们不了解你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望着善良软弱的、似乎已近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没有作声。我的那位朋友很爱他的父亲，他是“胡风后代”中仅有（或少有）的

社会科学研究者。我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辈的遭遇和不幸。他说，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达。我不认为他的遭遇可以和“胡风集团”相比，但我想他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太丰富了，因此我们对历史熟视无睹、没有感情。我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什么是历史？无情无私的记忆，加上敢于拷问灵魂的反省。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5年第4期

博物馆与真实记忆

人有一种奇怪的天性：对自己的记忆有极强的选择性，记住愉快的时光、光荣的业绩，淡忘不愉快和令人难堪的过去。如果有一段岁月不那么光明，那么人们往往抗拒记忆，拒绝一切引起记忆的提示，或者在不得不面对过去时挑选那些令自己心安理得的东西。博物馆对人的这种心理出了一道难题。

前不久一位朋友告诉我，“文革”博物馆将在上海动土兴建。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因为自从巴金老人提出建“文革”博物馆倡议之后，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响应者甚众，且其言其情至为哀切，但看不出有实现这个倡议的可能。我翻了一些报纸，托上海的朋友打听，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朋友又告诉我，他是从电台听一则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区建设规

划的报导中知道此事的，我想，这不会是小道消息了。

“文革”博物馆终于要建了，终于!我们会不会高兴得太早呢?取消一项尚无蓝图的计划，不是很容易么?即令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将它改作它用，不也是很容易么?我担忧的不是这些，我的忧虑可能是人们不太容易想到的：我们会有一座什么样的“文革”博物馆，它将告诉人们，告诉我们的后代什么事?

我的同胞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巴金修建“文革”博物馆的倡议遭到冷遇和抑制时，海外一些“文革”的专门研究者也不赞成现在就建博物馆。他们和“文革”毫无干系，他们对“文革”极端否定。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当人们并未完全走出“文革”话语时，这样的博物馆不能让后人正确地了解和认识“文革”，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说这种见解过于挑剔与偏执，连“四人帮”都抓了，对“文革”的否定不算不彻底了吧，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又讲了很久么?

我仍然主张尽快建“文革”博物馆，要彻底摆脱“文革”话语，一时半载根本做不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杜撰“文革”的神话，时过境迁，人们得到的“文革”历史可能不是越来越真实，而是越发

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人大多不愿直面人间悲剧，对于那一场浩劫的种种描述：批斗会、牛棚、抄家、武斗，已经有人表示不耐烦，当成絮叨和老生常谈。中国人有太多的英雄崇拜和浪漫情怀，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似乎不如“文革”时那种独树一帜、力挽狂澜、高瞻远瞩、势如破竹、天下大乱、“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气磅礴激动人心。中国人永远想化腐朽为神奇，现在搞经济建设、科技兴国，似乎正是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有人开始焦急，如此这般下去，中国何时能出人头地?遥想“文革”，我们敢于反世界进步常规的潮流，虽是孤家寡人，但有一腔“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豪气，他们认为，“文革”不过是在方法上不对，而精神却十分可贵。

我希望，我们的“文革”博物馆能大致反映“文革”的本来面目，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打碎某些当事人加给它的光环，防止后来者对它的理想化和神化。

其实，在我看来，“文革”博物馆能建也罢，不能建也罢，并不是那么重要，建与不建，都各有利弊，关键是它应该不仅建于计划中的上海浦东开发区，而且建在中国每个“文革”亲历者、建在中国世世代代人的心上。认真说来，博物馆的作用相

当有限，而且常常给人以误导。著名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最近专为中国读者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她说，博物馆往往是建造者旨趣的公园，不论摆设多少实物，以求再现历史，也无法表达受难者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个人记忆、私人体验，本来就不可能在公共话语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虽说博物馆的功能有限，但一旦要建，人们还是有理由对它提出一些基本要求。作为一名“文革”的研究者，我对拟建中的博物馆有以下期望。

第一，它要全面描述事实真相。

经常从书上读到，在英美法庭上宣誓作证时说的话是：“我将说真话，而且说出一切真话。”实践前半句不难，而兑现后半句则不易。歪曲历史最聪明的办法并不是公然扯谎，因为那很容易被揭穿，弄巧成拙，而是说部分真话，让人以为那就是全部历史。可以设想，如果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的一位阵亡军官确实作战英勇，舍己救人，我们能满意关于他的真实故事么?舒衡哲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博物馆喜欢描述“令人安慰的真相”，这对中国人尤其如此。这些令人安慰的真相不论积砌多少，都拼构不成真实的历史。

第二，它要触及人的灵魂，激发人们在道德上

的思考和反省，而不要把任何过失都归结为认识的错误或局限性。

“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受蒙蔽无罪”，“文革”后最普遍的态度之一是，认识错误是不受谴责的。很令人奇怪的是，发生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几乎没有人提出道德过失的问题。把校长、老师、同学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难道只是一种认识错误？就算误把他们当成了“走资派”、“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也得不出结论说，暴行是正常的。动手打人，难道果真没有一点私心，比如图报复，或者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本文被采访者反思得很诚恳：明明知道受自己尊崇的老师不是坏人，但施暴时不敢挺身而出，因为怕别人怀疑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怯懦，这就是自私，敢这么给自己下结论的人有多少？与自己共事几十年，政治审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突然间人家成了叛徒、特务、国民党，自己安之若素地相信，难道只是被“防修反修”的理论迷住了心窍，难道除了这点小小的认识错误，心灵如水晶般纯洁、透明，没有一星半点野心、权力欲、落井下石的晦暗心理？道德反省并非万能，但逃避道德责任，把灵魂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除了自欺和欺人，还能是什么呢？

第三，它应避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即时时、处处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截然对立的观点来描述和解释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

从法律上说，可以挑出和审判“文革”的一小撮罪犯，但就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纯粹的施虐者，纯粹的罪人和无辜者。当然，这是在一种很根本和间接的意义上说的。比如，那么多学生打老师，难道与“文革”前老师们讲述的阶级斗争神话，培育的那种“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无关？“文革”中不少文化名人含冤惨死，其情之哀，其状之惨，难于描述，但翻翻历史，在打击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在“反右”斗争中，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物不是也对同样无辜、同样有名望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无情揭露、大肆批判吗?所谓蒙冤受屈，说白了就是受到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对待，但人们是否可以反躬自问，自己在蒙难之前难道不是这么对待过别人，并以自己的行为营造了一种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的气氛?

不论怎么说，如果“文革”博物馆能建立，它应该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只能反映我们这代人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的反思，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会夸大某些并不重要的东西，藏匿某些有意义的事情。但

"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毕竟是一个象征，说明这个民族有勇气面对自己历史上的惨痛和耻辱的一页，说明它愿以一种物化的记忆，警醒自己，警醒世界各国人民，告诉人们，当一个民族丧失理智，与人类文明的通途正道背道而驰时，会发生多么荒唐、多么可怕的事。

但愿"文革"博物馆不要成为上海滩上的一景，但愿商品潮和世俗文化的气息不会侵扰这个庄严肃穆的地方，但愿人们不要在赴酒宴和唱卡拉 OK 的间隙拨冗到此匆匆一游，但愿参观者能在这里上人生一课，更深入地思考历史、未来、人类、良知。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 年第 1 期

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

1982年8月一个夜晚，盛夏的酷暑中偶尔透来一阵凉风，我在宿舍的阳台上和汪教授聊天。汪教授精通英语，40年代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革”中坐牢10年。我们的谈话很认真，是一场正经的两代人的对话。在对世风日下，尤其是年轻人身上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荡然无存表示感慨、忧虑之后，我突然问了一句：“汪教授，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你是宁愿年轻人像当年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贴你的大字报，搞你的喷气式，直到把你投入监狱才满足呢，还是宁愿年轻人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不去关心国家大事，不去斗争所谓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呢？”汪教授语塞，这问题好像使他尴尬，使他痛苦。按照前面的思路，他应该说宁愿年轻人觉悟高高的，闯劲足足的，但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曾是青年一代理想主

义和英雄主义的牺牲品。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理想似乎是与生俱来，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作为肉体的人是如此地粗鄙、贪婪，只有超乎其上的精神境界才使人异于一般动物；作为个体的生命是如此地短促，只有超越有限的自我，人生才能与意义相融，与永恒相接。

中国古代有“以理杀人”一说，在“文革”中，我耳闻目睹了不少“以理想杀人”或“以理想害己”的事，到了8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一词既不受到赞扬，也不受到诅咒，而是受到嘲弄和鄙弃。淡忘或拒斥，这比否定还可怕，因为不论同意还是反对，前提总是承认有一个对象存在。理想的敌人不是对它的攻击，而是虚无。我从此绝口不提理想，而将它珍藏于内心。我仍然鄙视和唾弃无理想之徒，将其视为行尸走肉。我不流露我的不屑，亦不暴露我的挚爱，但我固守着它。

资本主义社会真能腐蚀革命斗志。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目睹了另一种生活，使我重新思考我的信念。我去英国最著名的风景区——孕育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的Lake District,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帐篷，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支架在小汽车上的游艇，那么方便、精美的随车携带的活动房屋和厨房设备，

那么多憨厚的笑脸和不带深刻思考的神情，我突然想到，物质生活为什么该遭非议，世俗享受有什么不正当呢?那些对东方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毫不知情，说不出保守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一门心思踢足球和弹吉他的少男少女们，不是挺可爱的吗?难道我有权利因为他们不是思想家、斗士、殉道者而谴责他们，怜悯他们?

看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没有使我惶惑，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本真，鲜花排列在赤裸的身体上，人的肉体是那么美!我曾欣赏过中国古代圣贤“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诲，这时感到它是多么可恶和可恨!

我无意把以前的我说成是圣徒，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饮食男女，但我现在从理性上肯定常人的生活和追求，确实是跨出了艰难的一步。我并非突然沦落于红尘，我是认识到平常人的生活是正常的，其中有决然不能忽视和抹杀的美。我终于能够肯定(经历了多么艰苦的思想跋涉!)，如果我的生活不是目标如一、艰苦卓绝，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认为它是空虚的、令人遗憾的。

人性真是复杂和奇妙，当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文革”的惨痛教训而对理想、乌托邦之类的东西作批判反思时，西方却有不少人由于理想的失落

而空虚和痛苦。1988年我离开牛津时，G博士邀我到他家参加一个聚会，在一般性应酬和一阵海阔天空之后，G博士和一位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研究人员与我躲到一边交谈，他们俩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羡慕我，正因为中国的状况很不尽人意，我可以作很多事，为自己的人民、为社会。深入交谈下去，我发觉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深刻的厌倦，这不是因为受到社会的歧视对待；不是未遂功成名就的心愿，而是感到处于西方社会，他们的正义冲动，崇高感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充分的满足。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是平庸、碌碌无为，而不是压抑、禁锢以及需要忍耐的贫穷，需要抗争的不公。

G博士开车送我去希斯罗机场，话题继续。他说，他宁愿和我交换位置，不在牛津大学当哲学家，而在中国当一个社会改革者。说到此处，我发觉他竟然热泪盈眶了。我相信他说话的真诚，他去过我一家人居住的破平房，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几乎照不进阳光，他和夫人的光临曾使我和妻子羞愧万分。

回国后不久，认识了一位台湾来的女孩，她出身中产阶级，台大毕业后留校教书，正在等着提副教授时来到北京，在北大学历史，研究中国的现代

化。问她为何有如此不寻常的举动，她说中国历史吸引了她，“五四”运动的波澜壮阔使她梦绕魂牵，心早就飞到了北京。她一边做博士论文，一边与国际基金会联系，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暑假时，她去过陕西、贵州等穷乡僻壤。她已经和一个大陆小伙子结婚，丈夫绝对无意赴台生活，她显然也不是把北京之行当成镀金，待以后回去当身价暴涨的“中共问题专家”。她也有许多生活上、学习上的烦恼，但济贫工作使她感到充实。问起她毕业后的打算，她说想把目前的工作扩大，继续搞下去。

我感到自己眼前有一幅意味深长的双向流动图：大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地移居海外，去丰裕的物质生活中分一杯羹，同时有少数的理想主义者，离弃风平浪静的生活，把理想寄托于投入中国的变革和开发。

我想，我已能较少偏颇地看待和评判不同的生活态度和追求。颇有起伏的生活经历，对不同文化和发展水平中人们生活的观察，加上理性思维的习惯，使我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共和国的第三代”或“红卫兵这一代”)的理想的复杂性，“文革”中红卫兵的迷狂、野蛮与多年的“革命理想教育”的关系。我现在并不能信心十足地作出解

答，但我不会对一代人的理想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红卫兵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老三届"，失去得太多，许多人失去了青春、爱情、健康、知识以及其他生活中应有的东西。有一样东西是已经失落而他们不愿承认并紧紧抓住不放的，这就是他们年轻时曾经拥有的理想。这理想使他们对往昔的伙伴反目成仇，对"牛鬼蛇神"口诛笔伐，对"阶级敌人"拳打脚踢，这理想使他们在"全面内战"中冲锋陷阵，义无反顾地走向草原、丛林、边疆。他们的心情是喜憎参半、恨爱相加，因为这理想使他们吃尽苦头，但又几乎是他们惟一的自豪和安慰。运动中的受害者在鞭挞这种理想，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和代言人以与当年同样悲壮激烈的情怀和笔触辩解和捍卫自己的理想。

有人认为，理想天然合理，天然高尚，因为它使人超越现实利益和个体生命的局限，使生命闪光。固然，斯巴达克、托马斯·莫尔、谭嗣同等人的英勇献身使人肃然起敬，但欧洲中世纪十字军的东征，二战中日本"神风号"飞机的自杀性攻击，中东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以及最近对拉宾的暗杀，难道不使人厌恶、遭人谴责？对理想的评价不能只看人的主观动机和精神状态，还要看它的导向和后果。"文革"

中那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摧毁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理想，不是始终散发出血腥味吗？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要彻底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要本就是人本身。就此而言，人，不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最高准则应该是尊重他人的意志和选择，而“文革”中的理想是无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人类真正的理想往往经历世代而不衰，比如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而“文革”中的理想仅过十多年就灰飞烟灭，令弟妹一辈匪夷所思，这不应提醒我们反思它的内在价值么？

一种理想要以其固有的价值感染人，必须与人类文明、世界公认的价值准则一致，不然的话，就成了和日本、德国法西斯的“大和魂”、“日尔曼精神”一样的东西。请读读“文革”时在红卫兵中流传甚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片断，看看当时红卫兵反理性的义和团心态：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诗的高潮是攻打白宫，结局是环球赤遍。我不知道，此诗的作者现在是为自己的豪情骄傲，还是因为替世界上的仇华分子提供了一个黄祸论的证据而羞愧。

理想应该是现实的对应物，应该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有现实中的贫困，人们才向往衣食不愁的天堂，有现实中的不公正，人类才构想出种种乌托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从柏拉图哲学开始就流传至今的理想，对人类是有永恒魅力的，因为它基于人类真实的苦难和历史。“文革”的政治理想呢，它多半建筑在虚构的政治神话上面：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营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红色江山即将变色，革命政权危在旦夕，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卫兵们对这种危言耸听的蛊惑信以为真，以为社稷的安危全系于自己一身，于是准备去赴汤蹈火，想象和欣赏那最为悲壮的情景。有这种浪漫情

怀的人，对于“本世纪末翻两番”、“小康生活”颇不以为然，觉得那太现实、太小气。殊不知他们那种“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理想才是脱离现实根基，背离人民愿望的。

“文革”的理想具有明显的强制特征。本来，人类价值的最高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时却变成了“己所欲，强施于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改造人性、塑造新人（塑造？人是泥土，可以造成砖瓦？谁是设计师，塑造者？）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尤其是对欧美具有浪漫气质的左翼知识分子。六七十年代，西方思想大师阿尔都塞之流对中国的“文革”心驰神往，他的理论传给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而为个别80年代留洋的中国青年承袭。这些人在国外转了一圈，才发现真经原来是自己老爷子的，于是拼命在国内放言反现代化，反市场经济，说什么否定“文革”是正统老调，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过是探索新路，其志可嘉。呜呼，“文革”的理想在发源地被粉碎，却在他乡遇故人？

说实话，我现在恐怕还是理想主义者，我认为人还是要有理想才好，但我决不要求别人有与我一样的理想。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3期

告别悲剧

我们度过的青春岁月是一种辉煌，还是一场悲剧。我认为是悲剧，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理想追求是悲剧，我们这代人没有逃脱历史。

悲剧包含多种意义，它可以指英雄伟业，毁于偶然失误(轻信小人谗言，中美人计等等)，也可以指一世英名，晚节不保，诸如此类。“文革”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场悲剧，是在最确切的涵义上，即从经典的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说的。就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而言，他发动“文革”有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动因，是出自他漫无止境地发扬“反潮流”精神。在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总是与命运、与某种必然性抗争，他在斗争中愈是誓不回头，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失败就愈加惨重。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发动了“文

革”，而“文革”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一方面决不允许别人否定“文革”，一方面在万众欢呼和颂扬声中清醒地预感到了“文革”的失败。在1976年多灾多难、风雨飘摇的日子，毛泽东对自己作了一个盖棺定论式的总评。他说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第一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第二件事，却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其实，早在1966年夏天，毛泽东刚刚点燃了“文革”之火，就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对未来前景表示了极其悲观的情绪。他不但估计“打倒右派”远非易事，而且还预言将有“右派政变”，他坦率地承认“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文革”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如果我们撇开“文革”中权力争夺、人事沉浮、荣辱得失等因素不谈，我们可以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更清楚，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文革”是一场反现代化运动。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开篇就指出，有两份文献是理解“文革”的钥匙，一是上面所引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代表了他关于“破”的意见，另一份是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文革”中被称颂为“光辉的五七指示”，表明了

他"立"的方向。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消除了社会劳动分工，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比如，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即每人集工、农、军事、政治、文化于一身，同时要批判资产阶级。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发表了"毛主席重要指示"，他把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买米、买煤、买油、买菜要给钱等等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称中国是跟旧社会差不多的资产阶级国家。

学过社会发展简史的人，甚至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才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身，事事不求人。毛泽东不忘批判的"资本主义"，其实正是与自然经济、小农社会相对立的现代化倾向。当他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时，

他所忧虑、谴责的，正是摈弃了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领导人。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四化强国，誓将建成”。而只有在粉碎了“四人帮”，正式结束“文革”并彻底批判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后，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不懈追求的国富民强之梦，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才有可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告别“文革”之时，也正是她义无反顾地踏上现代化征途之日。

毛泽东的“五七”理想并非没有魅力，它曾吸引无数有理想、有热血的年轻人去“斗私批修”，去冲锋陷阵。分工，意味着远离个人全面发展，意味着异化，即人与自己的本质离异；分工，意味着个人技能的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为贫富差异打开了大门。但是，尽管没有分工、没有贫富差别、没有任何不平等的社会是人类数千年就憧憬的大同理想，但它毕竟还只是理想的。它特别为中国人所向往，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倾向尤为严重。实践证明，一味追求这种理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文革”中大批特批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反现代化倾向的强烈表现。毛泽东的后期思想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正表现于他以极强的意志和极大的魄力，力图闯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已经走过或正在走着的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违背现代化的道路。当初的意图，是要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弊端，是要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把这种乌托邦方案付诸实现，得到的却是经济上的绝对贫穷，以及政治上意想不到的不平等，“文革”以天安门事件而在道义上宣告彻底破产，就是有力的证明。

自西方列强仗恃其坚船利炮打破中国的大门以来，一代代志士仁人不断地寻找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人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宝贵的时机。“文革”这场浩劫，把中国推到国破家亡的边缘，终于使人彻底醒悟，上下一心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如果说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之后还应有所得的话，那么最大的教益和收获亦莫过于此了。

在“文革”发动30年、结束20年的今天，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回顾我们近20年走过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瞻望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使我想到要真正与“文革”告别实非易事的，是三个多月前在北京饭店与一位日本教授的谈话。这位教授是汉学家，专长是研究中国的“文革”，时隔近30年，他对中国的“文革”仍赞不绝口，他现在在日本发表的学术文章，也是属于歌颂“文革”的。我与他自然话不投机，我要他举出一件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文革”值得拥护。他谈起了遇罗克，谈到他的文章“出身论”的深刻和文采，这我自然同意。他说，如果没有“文革”，能涌现出遇罗克这种智勇双全、名垂青史的思想家吗?我愕然。我然后问他，是否知道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等人，宣布“出身论”是反动文章，正是“文革”中的当权者，以“反革命罪”杀害了遇罗克?他开始支吾和辩解，我穷追不舍地问，如果暴君和法西斯在血腥屠杀中制造了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也算他们的功劳?我说完没多久就起身告辞，我知道很难说服他。中国发生“文革”时他在日本也搞造反，闹红卫兵，他把国际上谴责“文革”的一派称为资产阶级学者。

这之后，我到几个大城市进行新的一轮采访，所听所闻使我产生很多感慨。

每到一处，人们最关注的话题都是反腐败。有人认为，当前反腐败不利，是因为官官相护，惟一

的解决办法，是像“文革”中那样搞群众运动。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人怀念那“无法无天”的日子。记得在“文革”中，几乎任何一个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标准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证据呢?揭发材料往往是任意的、含混的，从不允许当事人作出申辩。有一个前红卫兵说得好：“如果我们可以不负责任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走资派’，并据以定罪，那么我们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或‘反动学生’，不是也活该么?”确实，“文革”的教训之一是，对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行为的揭露和打击，最妥当的办法是依靠法制，而不是大搞群众运动，不然，就会出现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些嫉恶如仇、操之过急并迷信群众运动的人应当想一想，谁能保证只允许你对别人搞群众运动，而别人不对你搞群众运动呢?

当然，从另一方面而说，如果我们的法纪形同虚设，如果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加诚实劳动，而是靠权钱交易，如果老百姓投诉无门，那么他们怀念“文革”也就不是太奇怪了。要彻底告别“文革”，不但要使人与无法无天、群众运动的念头一刀两断，还要让人相信通过法纪铲除腐败是可行的，在现存体制之内追求平等

或公平是有指望的。

我还由此想到另一种现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海内外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上，在北京一些学术沙龙中，有些人在鼓吹所谓“制度创新”，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如果只能步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后尘，是没有出息、没有想像力的。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丰富，理当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新路，于是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被否定的东西中其实有创新因素，认为“文革”不仅提供了教训，而且提供了经验和启示，还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文革”是毁灭文化，是革文化的命，而是在文化、思想、艺术诸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他们不讳言“文革”的反现代化倾向，但坚称那不是以前现代准则反对现代，而是突破现代性和超越现代性，是后现代。他们把“文革”看成是中华民族超越现代文明的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努力。对以上诸种高论，人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有人想套用“文革”中一句十分流行的话作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我想，这么做肯定不解决问题。那些放言高论的人持以为据的，不是“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现实，而是他们的理念、蓝图，在很大程度上，那确实是有诗意和迷人的。如果要让这些人告别“文革”，应该让他

们知道事实，知道历史。就此而言，我们不仅只应提倡向前看，可能也该适当朝后看。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4期

“我们”是谁?

不论自称“老三届”,还是红卫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学生,许多人在抚今追昔的话语中不假思索地以“我们”为主语。这个“我们”使具有类似年龄和经历的人加强了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强烈地排斥其他年龄段和不同经历的人。这个“我们”是谁?“我们”真的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不幸与痛苦,相同的体验与思想吗?这个问题使人困惑,因为不论回答是或否,都有强有力的证据。

下面这件事是在采访前红卫兵时刚听来的,某个大城市中某校同班两个同学之间发生的事,使他们今生今世都不能成为“我们”。

1966年8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盛行一时,一位原团支部书记一转眼功夫就成了“狗崽子”。某天,她和几名同类被“红五类”

同窗罚站,检讨批判自己。可能是因为紧张,在喝令之下动作迟钝,她,一个瘦弱女子,被一个一米八几的红卫兵飞起一脚,踢倒在地。二十多年过后,当这个前红卫兵经历了参军、复员、提干,在某机关宣传科心满意足地工作时,一张寄给他的明信片在同事中周游了一圈后到达他手中,上面写着:"你现在一切顺畅,与我下乡吃苦比起来,经历辉煌,但你还记得那个在1966年8月×日被你狠狠一脚踢倒在地的女子吗?"他被同事议论,在本单位干不下去,忍痛调离,内心带着二十多年之后被报复的伤痛。他感到委屈:"她说她才十六七岁就遭到终生难忘的打击,难道我那时不也是十六七岁,难道我是三十岁的成人?难道我不是被蒙蔽被利用?我找谁抱怨诉苦去?"

我在另一个大城市采访过一位医务工作者,她"文革"时念高中,一直是学习尖子,上进心极强,事事争第一。因为父亲是资方代理人,怎么努力也不能入团,1964年因贯彻"阶级路线",被莫名其妙地免去班长职位。当我照惯例问她一连串关于"我们"一代人的问题(如大批判、批斗会、串连)时,她一个劲摇头。她没有参与过这些事,她不属于"我们"。以她的上进心之强,追求的力量之大,她干什么去了呢?她真正认为自己的家庭给自己打上了剥削阶级

烙印，她要用最脏、最苦的劳动赎清父辈遗留的孽债。每天天未亮，她就去清洁管理所，和工人一道掏粪，干完活之后，脱下又脏又臭的工作服，到学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去听"红五类"的申斥，反省和检讨自己，被喝令"滚出教室去"。

她在学校是异类，但在掏粪队，她回到了"我们"之中，朴素的工人给了她安慰和温暖。

就像上两例所表明的"我们"是极其可疑和误导人的概念，当社会上出现一种主流话语，不假思索地以"我们"的名义讲述一代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苦难、理想、追求时，一定要注意，可能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不以为然，可能有另外一个或几个版本的关于"我们一代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一代人或是其中的某些人精心编造的神话。确实，人们以个体方式存在着，人们有不同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有不同的经历、感受、前途，但他们往往在心理上认同一个"我们"。他们不习惯用"我"这个词，他们爱用复数，不会用单数。他们只有在确信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分子时才感到安全、可靠，他们生怕脱离集体。一位年轻的作者写道："对于我们'红卫兵'一词包含的是什么呢？是队列，是人潮，是连绵不尽的臂挽，是比星空更密集的脚印，是万头攒动，是庞大浑沌滞重汹涌滚烫发

亮，像岩浆像泥石流一样的一团。一句话，红卫兵是一百万，两百万，是八百万，一千万。真是难以置信。”只有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才会认为这一代人有意躲在复数的幕障之后以逃避个人道义责任。他们本来就是要被制成无以计数的不带个性特征，没有尺寸差异的砖块，以建构一座辉煌的大厦。失去个性，思想情感模式单一，这也许是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恰恰是这种不幸使他们难于认识到自己的悲剧。

无个性和思想单一来自简单纯正的教育和严格的思想灌输。从这一代人任何一个的口中，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共和国的第三代》等书的完整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学生从同样的课本，同样的广播、报告，同样的电影、戏剧、歌曲、故事中，得到了关于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简单粗糙、扭曲了的描述。最使人惊异的是，当这一代人中少数勇敢者反叛现代迷信时，他们所阅读的书籍，所思考的问题，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竟也惊人地相似。没有办法，现实就是那么严酷，知识的来源就是那么有限和单一。问一问这代人中勇于思考者，哪一个没有经历过读“灰皮书”、“黄皮书”的阶段？

思维模式的一致反映在表达模式的一致上，“文

革"语言仍在这一代人中流行，其特殊魅力压倒了其单调、生硬及火药味。一谈往事，就是"峥嵘岁月"；急着办一件事，自然要"只争朝夕"；表达褒贬之意，现成就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有位朋友，身为总经理，同时在一所名牌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让我修改他的一份诉状，上面竟有多处"是可忍，孰不可忍"、"拭目以待"等语句。我告诉他，这不是法律用语，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文革"过来人。他最后还是将我划掉的语句恢复了，他说，"文革"过来人，又怎么样？中苏论战中，"九评"的铿锵有力之语，现在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我的采访对象中，不少人还能动情地背诵其中的精彩段落。此时，用同一种语气来形容，真是：当年五洲风雷，尚在耳畔回响，红卫兵革命激情，仍在胸中激荡。

这代人曾以"经风雨，见世面"作为自己砥磨革命意志的口号，历史也确实以民族的灾难，千百万人的不幸命运为代价使其中的有识有志者饱经风雨，大见世面。他们为人的楷模仍然是鲁迅，很少有人欣赏林语堂、徐志摩的情趣。他们研究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啃汤因比、托夫勒的著作，头脑里固执的问题仍是30年前的那一个："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吃过苦，现在仍能吃苦，他们深知这是自己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瞧不起没有吃过苦的人，不愿意浪

费这笔财富而没有收获。我曾观察过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遇到吃饭问题时的不同反应。老一代人（包括当过右派的人)若没有贤内助或保姆在旁,会手足无措,狼狈不堪;年轻的下一代尽管收入甚微,仍会潇洒地邀人上麦当劳或快餐馆;而我的同龄朋友多半会袖子一卷自己下,当丰盛的菜肴……上桌时,他们会得意地告诉你:这是在兵团或插队时练出来的。当这样的人有机会去洋插队时,他们发现,来自台湾、香港的同龄人与自己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尽管大家肤色发色相同,操同一种语言。他们打量着自己的海外同胞,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杰克·伦敦置身于上流社会时的感觉:他们纯洁、高贵,但没有活力(clean,noble,but not alive)。而他们的富有活力,会使对方认为是没有教养,且深怀韬略,令人生畏。

李泽厚说过,对于中国思想界的突破性成就,他寄希望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沙叶新则预言,旷世奇才、大奸大恶都会出自这一代。他们也许对这代人的潜力和素质估计过高,但在最近的将来,能拿出点货色的可能还是他们。

最后,听一听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我们"一代人的精神状况的描述。辛格(M·Singer)在"知青和中国的"文革"中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

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石文安(A.F.Thurston)则在《中国“文革”的牺牲品：暗伤》中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应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我希望，当这一代的代言人以“我们”的名义发言时，他们会知道这个“我们”的含义和分量，他们会自觉地抗拒上述种种失落，证明可诅咒的“文革”还不能把一代人全部牺牲。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5年第5～6期

人性兽性之谜

我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人们看过《白毛女》之后听到的告诫和总结。"文革"之后，一些劫后余生、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等说出了类似的话："'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是谁由人变成了兽？无庸置疑地，首先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成员及其党徒、打手，但无庸讳言，许多人也指当年的红卫兵。

当年的天之骄子，天兵天将几乎无一人不叫屈：我们只是犯了错误，我们的动机是革命的，只不过受了蒙蔽！比如有人说："红卫兵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上写下了不光彩却又无法抹杀的一笔，当然，若从这批年轻人的主观动机中深入探索，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纯真可爱的一面。"还有人说："红卫兵运动中也

还是有是非之分。比如,红卫兵其实抄出了一些'变天账',一些枪枝弹药和国民党的委任状等。"①

"变天账"云云,显然是无稽之谈,一种行为是否符合人性,当然不能以行为者的动机解释,而只能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让我们看看《红卫这一代》中记录的若干事实:

> 我校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14岁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工作组撤后,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在乒乓球台子上架上一张桌子,桌子上又铺了一层煤碴,然后让这位书记跪在煤渣上……后来,这位书记被人一脚踹下桌子,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加上煤渣的作用,顿时血肉模糊……
>
> 有些残忍的事实,今天说起来还令人发指。我曾亲眼见到,我校的两个学生,一个出身地主,一个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的儿子,在1966年夏季受到了红卫兵的特殊关照。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某教室传来的打人声,有时其哀叫已让人难以相信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他们被关押在楼道中一间倒垃圾的小屋里,为了让他们在静卧时也不忘反思罪行,牢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地上被定期泼上厚厚

的一层水，这两个同学只好趴在水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一位暴行的目击者在叙述时说:“这些野蛮行为的确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想也不敢想的，这些却成为了现实。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现象本身，而在



红卫兵在散发传单。

于一些红卫兵把这作为一种恣意取乐的方式，加以欣赏，甚至有人专门研究可以打伤内脏而不伤及皮肉的打人方法。”

上述行为如果还不能归人兽性范畴，而要被说成是人性的表露，那么“残忍”、“暴行”之类的词恐怕就没有意义了。当然，我们不是要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但我们应当探讨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巴金等老前辈看来是无力完成这项任务了，他们虽然以一颗善良真挚的心苦苦思索“人性为何变为兽性”，但除了惶惑和感慨，已无力提供有价值的答案。相比之外，经历更为坎坷的诗人邵燕祥目光更为犀利，思考更加扎实。他在一封评论红卫兵的长信中注意到了，“红卫兵一哄而起，人们却很少对他们作哪怕稍稍细致一点的区别和分析”，他说：“红卫兵又是被什么煽起的呢？……他们一直受的是革命教育。他们坚信雷锋的话，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更坚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的，革命要不得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暴烈还算什么革命？而当实施暴力时，比方用皮带扣抽打老师的额头鬓角，由于意识到这是代表革命的阶级施之于反动的阶级的革命行动，赋有天然的正义性，故能不皱眉头不眨眼地干出正常年月正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确实，如果我们想避免简单地以人性善或人性恶来解释世间的悲壮或残忍，如果我们还想公平地对待红卫兵这一代人，包括其中野蛮地伤害过别人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他们在“文革”孕育期受到的畸形教育，从当时弥漫全社会的紧张空气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中去寻找原因，这也是要取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效果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政治压倒了知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红”大大地优于“专”。学校和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革命”。革命当然是好事(虽然现在有那么几个著名的文化人在鼓吹“告别革命”)，但那时“革命”的内涵，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虚构的革命中心不断东移，中国成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因此全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加以包围和颠覆的神话。当一个国家自视为处于革命时期即非常时期时，法律就被废止了秩序就被打碎了，当人们自认为自己在革命时，他们会产生真理在身，有权诛灭异类的心理。

支撑革命理念的，是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那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远离了它的原本内涵，即与生产

资料之间的关系，而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任何人，不论是1957年响应号召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还是跻身革命队伍几十年的老干部，都可能被定为“阶级敌人”。而任何事情在那时一旦纳入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就无理性、政策可言。

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荡然无存，“人性”观念像瘟疫一样遭到诅咒和扑灭，人的尊严被践踏，人世间与生俱来最美好最温暖的东西，如师生之情、同窗之谊、乃至母子之间的亲情，都被“文化革命”的烈火焚毁。有人回忆道，在北京某名校，一位女生以“爱看十八、十九世纪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即外国名著)为罪名遭到批判斗争，她愤而服毒自杀。同班的红卫兵“齐向东战斗小组”称她为“反动学生”，警告医生不得抢救，而医院居然就停止了抢救，将她移入停尸间，她在几天之后死去。就在同一个班上，一个学生亲自带领红卫兵抄自己的家，而且亲自动手，将自己的母亲毒打致死，原因不过是他母亲以前是小业主，他必须表现出与“剥削分子”划清界线。

红卫兵迷信“革命”便迷信暴力，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中虽然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但学生们更为熟悉的是：革命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狂热和盲目的气氛中，暴烈的行动并没有发生在敌对阶级之间，发生的是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师长、同窗和其他人的施暴。

对“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文化方针和政策，以及否定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取向，可以作更全面的剖析、更深入的反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文革”前的教育一无可取之处，对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宣传教育作全盘否定。“文革”的教训提示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享受生命的权利，人追求美好事物的理想，应该受到保护，也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把人性的真善美放到第一位。教育的最基本原则，应该是让人们懂得人之为人的道理，懂得尊重和呵护人性，发展人性的意义。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是工具，比如是革命的工具，斗争的工具，但从根本的意义上人是目的的本身而决非工具。如果一味把人训练成工具，比如就像猎狗那样的追捕猎物的工具，那么人性就可能转变成兽性。

作为投入“文革”的前红卫兵，我主张在分析“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客观环境和形势时，不要因此无视或开脱自己的道义责任。不论我们被多

么厉害地灌输和塑造，许多涉及道德良心的大事还是由我们的“自我”作出决定的。我的研究和大量的调查，以及国内外研究者的调查都表示，决定红卫兵行为的因素，并非只有“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社会上的宣传之类，个人利益显然也是动因之一。在学习雷锋的活动中，有人在日记中写下大量革命词句，记录下自己做的好事，摊在易于让团干部、班主任看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不少人在集体生活中，处心积虑窥伺别人的脏衣服，一发现就抢着洗，力争“好人好事”的事迹，而仔细保护自己的换洗衣物，千方百计不要成为别人“做好事”的对象，这种机心和竞争，又是为什么?这些尚属雕虫小技，那“争当接班人”的动机中，以家庭出身的优势当仁不让地争当团干部、班干部的活动中，难道一点个人野心和权力欲都不存在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许多人自以为经历了30年前的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余下的小打小闹都不在话下。确实，不少人经历了野火般的狂乱和黄河一样的浑浊，心性已经清纯和澄明，在人事和利益的交错中能守住自己的根和本，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定力。“文革”曾经使人在自己的本性方面迷乱，那是一场政治灾难。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另

一种诱惑，这就是经济的侵蚀。恶可能不再借助于棍棒和皮鞭，但会表现为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善与恶的交锋只会改变形式，但决不会消失。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5期

[注解]

① 见《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

塑造善良美好的心灵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野蛮行为和破坏行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干下暴行和蠢行的人，都认为可以在“文革”前的教育中找到原因。因此，检讨这种教育的利弊得失，深刻分析其中失误的缘由，是必要而有益的。当然，这么做决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文革”前的教育，这种教育尽管有种种问题，仍然为今天的四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技术骨干力量。就总结“文革”惨痛教训而言，我们应当认真分析青少年一代为什么在“文革”中心灵表现得那么粗陋，那么扭曲，如果我们不能说这批人生而为恶，那么就必须在他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找原因，尤其要剖析“文革”爆发前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给人们的心灵强加了什么，又夺走了什么。

中国旧《三字经》中说:“子不教,父之过。”可见在封建时代,教育的责任和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而

教育的目的在于维系“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宗法等级制度，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大哲学家洛克、卢梭等人提出过新式教育思想，但他们的理论仍未摆脱贵族主义倾向，他们的主张固然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但因为教育的任务是由家庭教师担任，所以实施他们教育学说的前提条件只有贵族阶级才可能具有。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平民式的教育是相当晚近的事，这种教育因为成本低廉，可以为大多数人所分享。但这种教育因其批量生产的性质，容易为某种势力所控制，使其产品具有整齐划一的特色，而如果受教育者在精神上打下了某种有害的烙印，那么由于整体性的力量，其危害会十分巨大。

因此，在当代，教育的规模和作用越大，我们越是要深究以下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受教育者本身，还是他们身外的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20世纪大思想家罗素的观察和评论。他在《教育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指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目标，一是培养国家驯服的公民，二是陶冶个人性情。罗素主张二者不可偏废，但认为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讲，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后一个方面。他还批评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教育缺乏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尊重，把他们当成陶土

一样的塑形材料，使他们成为日后某一政治派别的工具。他在《怀疑论集》中指出，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是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的公民，以拥护现政权的政策；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校和老师在今天的竞争中，要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而作为父母的只想望孩子光耀门楣。“主要地讲，就是这些动机，决定了所教的科目，提供哪些知识和抑制哪些知识，也决定了期望于学生养成的思想习惯，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来培养心灵和精神的内部生成；事实上，那些受教育最多的人往往在心灵和精神上十分萎缩，缺乏冲动，只有一些机械的才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

没有树立受教育者在教育的目的、过程中的主体性思想，没有设身处地地替受教育者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这恐怕是“文革”前教育中的根本性缺失。这种缺失与对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片面强调结合在一起，使青少年学生在“文革”中表现出一种心灵的残缺和畸形：缺乏童稚、天真、同情心，对流血、伤残乃至死亡麻木不仁，热衷于暴力和攻击。

教育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大

计。但是，国家又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单个分子心智残缺不全，整体的生命力也堪忧虑。教育的对象是人，是活生生的、正在生长发育的人，因此，国家确立的教育目标，一定要顺人情、通人性，不可单方面强调国家的需要。当1957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首次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当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夸耀苏联每年培养的工程师人数多于美国时，美国朝野一片恐慌，他们立刻加大教育力度，企图短期内消除差距，措施之一是大大增加中学教材的难度。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吸收能力。在50年代，美国国务卿，以反共著称的杜勒斯宣称，西方将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后来赫鲁晓夫被认为背叛了斯大林，这两件事使中国的领袖把接班人问题视作当务之急。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从此变成了对杜勒斯、赫鲁晓夫刺激的单一、过度的反应。教育的惟一任务是培养接班人，接班人要善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弄潮，于是，斗争性成了第一位的优秀品质。坚定的斗争性并非一定是坏事，但如果这种刚性品质不以理性、人性为支撑，如果错误路线定错了斗争目标，那么这种品质的危害性是极其惊人的，而“文革”的情况恰恰是这样。

如果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勇于斗争这些品

质毕竟是人类的正面、积极因素，那么，如何防止认识的重大失误，不要把事情做得无所不用其极呢?除了对一些人性的立场和原则坚信不渝(比如，你可能误以为自己的老师有问题，即使如此也不应该毒打和凌辱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批判性思维，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多年来欠缺的，也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未能提供的。

一位中国学者1991年在西方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为《红卫兵通向暴力之路：政治、教育、心理因素分析》，其中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红卫兵所持的非批判性的、绝对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们的破坏行为。这种破坏性的、绝对的思维方式是‘文革’前很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所具特征的结果，这些特征为红卫兵大肆破坏人类尊严和宝贵生活作好了心理准备。”在作者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习惯于简单地把人看成一些类别，有的好，有的坏，一些人优于另一些人。“显然，红卫兵并不把那些遭到攻击的人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类，这些人是革命的‘对象’……在对这些人做出残忍的事情时，红卫兵认为自己是在主持正义，是在为伟大的人权，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作者提倡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是批判性的，她将其称为“民主思维”，其内核是“不急于判断的

或健全的怀疑主义”，也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结论那么肯定、那么自信，在怀疑别人有错或有罪时，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弄错了，不要马上得出别人是坏人的结论，从而正义在手仇恨满胸，理所当然地打击异类。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特征是既自信又不自信。所谓自信，就是把判断事物的权力和责任留给自己，而不是交给他人，不论是权威、领袖还是导师。“文革”中红卫兵表面上豪气冲天，其实是最不自信的，他们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和经验来判断，而是盲信领袖、报纸、广播、书本。人应该自信，坚信判断事物的权力在自己手中，与这种自信密切相关联的是一种不自信：进行认识，作出判断的是有缺陷的人，而不是上帝，因此结论总是留有余地的，判断时是有责任心而不是盲目的、草率的。我们应该对判断的权力属于自己充满自信，而对结论不那么独断自信。不幸的是，“文革”中多数青年学生的态度刚好与此相反。

“文革”前的教育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现实。“文革”中发生了无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显然和这种教育，以及这种教育养成的思维习惯有关。学生们从小就被教育得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形势，不是从现实中得出结论，而是根据某些解释来判断现

实，当现实与实际矛盾时，宁愿保留理论而舍弃事实。比如，有文章回忆说，小学生下乡劳动看见农村不像电影上演的那么美好，他们坚持认为电影里的农村才是真正的农村。又如，"文革"中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遍地、供应短缺，但相当多的红卫兵依然相信"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当然，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从主观上就想公然撒谎。扭曲和无视现实是通过一个哲学命题进行的，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主张，只有依靠一种正确的观点才能把握现实的本质，这本质高于直接观察到的现象，甚至与现象相反。由于普通群众认识范围有限，而且把判断的权力拱手让给某些英明而有洞察力的人，当他们亲眼见到种种弊端时，他们一般是经由两条途径来否定自己的直接经验：第一，认为"问题是局部的，我无法看到全局，而从全局上说形势大好。"第二是说，"我的立场、感情、方法可能不对，我看到的是支流而非主流，是表面现象而非本质"。当然，我现在并不是要抹杀现象和本质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但不论关系有多复杂，经验事实终归是基础，不能被"辩证"掉，即被吞没、被否定。得自生活的亲身经验永远是错误路线和政策的解毒剂。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传统中包含了

丰富的、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中国第一大教育家孔子就把教育的根本任务当成使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教育应当使人善良，使人生美好、充实。在现代，教育包括政治和谋生技能，但它不应该造就简单的政治工具和挣钱机器，它应能使人在回首往事时充满柔情和自尊，而不因伤人和自伤而懊悔。

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

——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

30年前，随着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城乡数百万中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这是一群身份极为特殊的农民，他们像斩断了须根的幼苗被移植到荒漠之地。他们除了干农民活，吃农民口粮，还头顶“知识青年”的帽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中最小者只念过六七年的书，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对比现在不少大学生入校时还需家长护送，真不知该佩服那个革命年代把人锤炼得不怕摔打，还是该谴责它以摧残嫩芽娇花为能事。

具有知青经历的人多达1500万以上。对他们而言，这30年过得很快，虽然它是由无数个辛酸和漫长期待的片断构成。当年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能早已飘洋过海，正驾着小车，奔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当年偷鸡摸狗，被农民诅咒的二混

子可能正西装笔挺地洽谈生意，或者道貌岸然地在大学讲坛上诲人不倦。当然，更多的人正在为生计奔波，为温饱奋斗，有的人40刚过就下了岗，有的人在即将到来的下岗潮前忧心忡忡。我不知道，这一千多万人中有多少人会在今年想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年祭"的文章。那些流落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人多半不会，那些留在西双版纳丛林里或塞外草原上的忠魂、冤魂也不会。

历史往往由强者来书写。知青本是弱势社会群体，没有半点话语权力，他们的吃、穿、住、生命安全等基本生存问题，要由一个穷教师告御状来解决。当这个集团分化之后，其中的成功者要把过去的卑微经历说成是今日荣耀的资本，他们因今日尽得风流而缅怀昔日的苦难，他们尽情享受着、炫耀着那劫后的辉煌。

1995年春节期间，他们在首都体育馆组织了一场大型综合晚会，这台晚会节目因电视转播而广为人知，名噪一时。晚会的主题颂词中说："我们曾以历史使命为鞭策，苦其心志；我们曾用豪言壮语为激发，劳其筋骨；我们曾因艰辛劳苦而疲惫，饿其体肤；我们也因悲欢离合而清醒，空乏其身。如今，岁月已经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却留给了我们成熟的智慧。"只有极少数人（包括个别嘉宾主持）对晚会的

主旨表示不满，大多数人是惊喜和感慨。说来可怜，这些从来无缘涉身于社会话语空间的人，一旦听到公共话语提及自己的过去，一旦见到自身的身影掠过历史画面，就喜不自胜，而不去追问自己的形象是否被歪曲。

在那段颂词中，每句话的主语都是“我们”，这个“我们”感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自觉自愿地去吃苦受难。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有没有资格以“我们老三届”自称？

这里，生活中最常见但很少引起人们警觉的现象再次出现了，一种部分人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集体意识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

其实，这一代人对于这种虚构的集体性权威话语应该最有见识。30年前，每当掀起一阵批判浪潮，不论对象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陶铸，不论批判的事情是奖金制、自留地还是普通百姓弄不明白的所谓“路线问题”，全国舆论一律是“咱们工人阶级不答应”、“俺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即使需要对知青“来一个动员”的时候，“文革”当权者也不忘炮制了一种城市居民的声音：“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可能当初谁也没有想过，之后也没有人追问过，这形形色色的“我们”，这随叫随到的“我们”到底

是谁?他们哪来的权力压倒个人、代替个人说话和表态?“我们”难道不是由一个个“我”构成,那些动辄以“我们”的名义发言的人征求了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么?针对那个被虚构的“革命居民”的口号,知青们喊出了“我们也有两只脚,要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我们”倒是实实在在,可以指认核查的,但这个“我们”不具有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它不能出头露面,只能被抹消、被遗忘。

知识青年这一代人始终生活在话语权力不平等的社会,生活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行动自由远未实现的文化氛围中。成功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我经历和自我意识投射放大,编造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类似的神话。不同的时代潮流会涌现出不同的英雄群体,他们吟唱的咏叹调各不相同。他们并没有撒谎,但僭取了“我们”这个名义。让我来剖析一下有关知青的一些流行话语,看看它们是如何地与大多数人的个体经验格格不入,看看现实是如何使神话破灭的。

1968年底之后,随着数百万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知青的话语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被极度地渲染和夸张,但只要正视历史就不难发现,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中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并没有今日被赋予的那种理想主义

色彩，并没有被莫名奇妙添上的光环。它们和“文革”中发生的其他事件一样，是政治上实用需要的产物，是理智丧失、是非颠倒之后产生的畸形怪胎。请看以下事实。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夕，作为“四人帮”基地的上海急需“反潮流”和“新生事物”典型，以捞取政治资本，下到云南傣族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被姚文元等人看中，专组写作班子为他炮制署名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突击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人大常委。

1974年，江青等人为了打倒周恩来，大搞“批林批孔”，针对不少老干部在参军、上大学等方面以权替子女谋私，江青还大力鼓噪批“走后门”。反对父亲替自己走后门的江西知青钟志民被江青看中，以他作为批判老干部“背叛马列”的典型，他的名字传遍中国各地。

1973年至1974年，“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为了替自己树立“反潮流”的典型，将公布家信的知青柴春泽誉为“扎根农村，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公布同龄人给他的私人信件，跳上反“走资派”，打邓小平的战车。

辽宁省另一名知青典型王冬梅事后对自己的悲

剧角色有坦率的反省:"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王冬梅悲剧的实质在其家人的遭遇中表现得极其充分:她的父亲,一位部队干部,不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父母要支持子女扎根",而且表示要志愿转业到他女儿下乡的地方(后举家迁至赤峰),但王冬梅事后披露说,那是因为部队首长为了用典型事例做好干部转业工作而作的安排!她在经历大起大落之后认识到,作为知青她不过是当了政治道具而已。

以上事例还可以不断地举下去,但仅此几例已足以说明,他们根本不是英雄和新人,不过是适应政治形势需要的牺牲品,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和祭品。一切过分珍视自己的知青经历,以至于不惜美化"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必须正视上述事实和无数类似事实。

有人也许会说,被"四人帮"树立和利用的知青典型毕竟是少数,我们并没有因为下乡而飞黄腾达,我们经历了磨炼,在苦难中获得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成功与自己的知青经历有关。正因为下

过乡，当过知青，我们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是直接、天然的，那些从学校到机关、到实验室、到课堂的人根本无法和我们相比；我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吃过大苦、耐过大劳，这使我们获得在进取的道路上百折不弯的毅力和品质。在有些人眼里，苦难不但是一笔财富，简直成了一种资历，这资历虽然还难以和爬雪山、过草地相媲美，但作为一笔炫耀和自夸的本钱，是足够了。

苦难有可能转化为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它能不能成为财富，除了看你能不能战胜苦难，还要看你是否胸有丘壑，对苦难持一份平常心。我怀疑，不少生活、事业上的成功者夸大和卖弄自己经历的苦难，不过是变相地宣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他们拿得出手的是孟子语录，就像1995年初“老三届”晚会颂词中所引用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这段流传百世的座右铭，似乎足以充当一切成功者群体的集体意识的核心话语。但一提起它我就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包括一些题外的话。

以“老三届”“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挂帅”的教育，是没有人能知道孟子的上述教导的。学生们从

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得到古代圣贤关于个人修养的论述。“文革”中打倒刘少奇，《论修养》是一大罪状，这一代人曾是“千百万人齐上阵，口诛笔伐批《修养》”，而孟子语录也成了刘少奇“宣传封建剥削思想、唯心主义”的铁证。但过不了多久，红卫兵小将们又把上述语录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为从“文革”中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他们得知这是毛泽东赠给自己女儿的格言中的头一条。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同样一些话，被打倒的人说就是他反动本性的大暴露，而由伟大领袖讲出来就具有无限深刻的含意？另外，尽管孟子的话被政治家们视为至理名言，用来赠给自己的晚辈以鼓励他们吃苦上进，但他们心中到底有多认真，也是个问题，因为当“天”将大任降于自己的子侄辈时，并没有要他们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真正的苦者，劳者却并无所得。可见，政治性的话语其实是很实用的。

所以要说上面这些话，是因为知青主流话语的炮制者们缺乏自我反思的精神和能力，对许多流行、现成的话语接过来就用，对上山下乡这件事，不去区分什么是真实的动因，什么是权宜之计。

就以导致千万以上中学生背井离乡，奔赴边疆、草原、山区的那个号召来说吧。最高领袖发话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似乎仍在按"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似乎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才把学生弄下乡的。但即是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发觉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在50年代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忽儿是教育的对象，一忽儿是教育的主体，这么重要的事，怎么没有一个定准呢？更使学生们觉得于理不通的是，如果青年学生接受劳动者的再教育真是很有必要，那么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到大工矿企业去接受产业工人的教育才是恰当的，为什么要在农村，由农民来实施再教育呢？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任何明眼人都很容易看出，上山下乡的真实动因决非如主流话语机器所喧嚷的那样，出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宏图，而是基于不能拿上桌面的急功近利的考虑。第一，当初为了动员红卫兵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老干部，不惜把他们捧上了天，毫不吝惜地把"革命先锋""闯将"之类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并严厉告诫工人农民不许干涉、反对他们，要支持和向他们学习，但到了运动后期，如何处置这批任务完成，居功自傲，有组织的学生，却成了令政治家头痛的问题。于是，先是有"小将犯错误"之说，接着把他们从城市的政治活动场所一股脑地扫到农村。金光

灿灿的革命词句，掩盖不了最传统和陈旧的权谋数术。第二，"文革"中学校关门，各种工矿企业正常工作秩序被破坏和打乱，长期得不到恢复，数百万中学生既无升学的希望，又无安排就业的可能，"面向农村"是惟一拿得出的办法，也是在政策失误之后，国家解决人员安排方面燃眉之急的一贯作法。"为接班而锻炼"，"再教育"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招牌。

"文革"后期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被实践证明是于青年学生的成长与生活有害，于国民经济有害的坏事，它应当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被彻底否定，也应当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被严肃认真地反思。这一点，全国上下取得了共识，所以有人用"四个不满意"来概括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但在回顾这段经历、这场运动时，有时似乎颇为志得意满，过去的摔打和今日的业绩好像在交相辉映，下乡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以历史使命为鞭策"的伟大运动!?

现在有兴致、有能力重述知青经历的，多半是成功者。他们的成功是否一定与下乡的经历有关，其实很难说。也许，有些人本会在城里娇生惯养，经过下乡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们变得奋发有为了。

但更有可能的是，本来会有成就的人，下乡也罢，不下乡也罢，都会有成就。不然，古往今来各民族、各国度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又作何解释？我所了解的知青当官最大的，是《劫后辉煌》中一位口述者，当到了某部的司长。但他的父母是老革命、高级干部，他1966年在北航附中念高三时，就被内定不参加高考，保送出国，然后当外交官。如果没有"文革"和下乡，他的仕途会不会更顺畅、更辉煌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从总体上说，一个近十亿人的大国十来年处于内乱之中，上面在斗，下面也在斗，学校停办多年，一代人流离失所，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灾难。在统计的意义上说，这一代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不是平均、等量地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也许有少数人侥幸，在群体不幸的同时个人反而比正常状态下更幸运，但与此同时一定有更多的人遭到了大得多的不幸。少数幸运者在谈论自己下乡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锻炼时，恐怕首先要想到这段经历本质作用是负面的，不然就会使人反感，因为他们忘了少数人风光的背景是千万人的辛酸。其实，这种巨大的反差很难使人笑得起来，得意得起来。

一位国情专家在今年3月底一篇谈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

一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90年代末，其中基本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

其实，下乡知青的不幸还不限于他们在两次下岗潮中首当其冲。当中央政府停止了上山下乡政策，为大多数人打开返城的闸门时，自以为结束了下乡艰辛生活的人马上又面临新的困境。不错，国家开始实施新的政策，社会生活恢复正常，而且更加合理，但历史欠账是无法细算和补偿的。高考恢复了，择优录取是公平合理的，但刚进初中就遇到"停课闹革命"，在泥土中滚了几年的人，面对高考这一天赐良机，只好叫苦不迭。从70年代末起，许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实行考试择优录用，但这次进步的措施对于因"文革"和下乡荒废了学业的返城知青，包括不管真假以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过是一道难过的关卡而已。

这些"小人物"、不幸者的坎坷经历和辛酸史，是很难出现在知青主编的回忆录、采访录中的。幸好，有几个电视节目还给了这类人一些出镜机会，我们由此才了解到还在城市最下层中苦苦挣扎的知青，在黄土高坡或南国边寨已完全同化于农妇的前女学生。不知道这如凤毛麟角的资料，会不会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遭遇免于被遗忘、被湮没？

在知青所写的回忆和反思文章中，过去的一切，方方面面，都被缅怀、回味、咀嚼，不论是受苦还是受惠，所有的人都尽力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令人吃惊的是，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从来没有人论及下乡政策和知青的所作所为，是增进还是侵害了农民的福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少人口口声声说，通过下乡锻炼，他们的立场、感情发生了大变化，他们由此懂得了农民的疾苦。

许多人谈到了他们下乡后不怕苦、不怕累，甩开膀子大干，与农民一道战天斗地，谈到了他们把自己的知识贡献于农村的教育、医疗、科研事业，这些是真的，但另一侧面则几乎无人提及，虽然它同样是有关下乡运动的基本事实。让我们在此略提一二吧。

上山下乡运动毫无疑义地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本来就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供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入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

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下乡时全国政治、经济方针极左，哪里也没有例外，但农民艰难维持生计，也有自己的日常智慧，或者因为天高皇帝远，广袤大地上生活的惰性，使极左政策或大或小地打折扣。但知青的到来，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路线斗争的敏感性，使"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在吃大锅饭的"学大寨"运动中，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强迫粮食、猪肉、鸡蛋交售，打击出售自家产品的运动中，知青往往最坚决、最不留情面。在"清理阶级队伍"，打击各种"阶级敌人"或"坏分子"的斗争中，知青往往是先锋和打手。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内蒙，揭发、批判、斗争所谓"内人党"的运动中，知青往往起了当地牧民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可以对谁都不管不顾，而且有"文革"中学来的残酷斗争经验。

如果有极少数得到天启，自感"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者要主动去吃苦赴难，作为个人的选择，旁人不便非议。但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这么做。青年学生有继续求学的权利，有继续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处于少年发育期的孩子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求得家长照顾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应当被剥夺的，不论是谁，不论以多么崇高的理由，都不能剥夺和侵犯这种权利。纵观历史，以培养某种理想人材为理由，大规模地、体制性地把中学生安排到农村去锻炼的，只有法西斯德国和“文革”中的中国。若干年来，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文章有如汗牛充栋，但很少见到有人从人权、从个体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择业权的角度谈问题。

30年过去了，人类正要跨过世纪之交的门槛，走向一个更新、更广阔的世界。中国早已冲破了现实的樊篱和思想的樊篱，以新的标准和价值来审视过去与现在。知青一辈的人，多数已年过不惑，甚至已达知天命之年，他们的弟妹辈早已长大成人，他们的子女正处于当年自己上山下乡的年龄，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多新的事物纷至沓来，难道我们还不能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维度，难道我们身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脑袋却停留在30年前，感情上还与过去藕断丝连？难道我们只能给弟妹一辈和子女一辈

讲他们一点也不爱听，也说服不了同辈人的故事？难道我们已经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还没有触摸到自己的真实体验和表达自己经验的话语？

原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

专题研究

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

一 前言：本文的主题、范围和研究方法

在外人和后人看来，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以狂热、盲信、反理性和破坏性为特征。为什么在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保守文化传统的国度，千百万正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表现得如此反常和反理性？在30年之后，当这批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时，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何种影响？本文力图根据“文革”爆发前和爆发时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来理解和解释红卫兵一代人行为的原因，同时根据他们在运动中的经历和遭遇描述他们思想发生变化的契因、过程和程度，并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导向，联系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探讨他们精神历程产生的后果。

本文认为，红卫兵的所谓“造反”的举动，是“文革”前的革命教育、阶级斗争教育，“文革”

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在"文革"中总爆发，以及毛泽东运用谋略手段这三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在"文革"前和发动"文革"时对"培养革命接班人"抱有厚望的话，那么运动的结果是适得其反，"文革"使一代人程度不等地，然而是不可逆转地疏离了原先的革命化意识形态。以上观点和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对于红卫兵的认识有相当差距，在大陆，红卫兵这代人中对于"文革"的回忆、反思和研究片面强调自己的"革命理想"这一面，而海外的研究则过分突出社会冲突，造反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因素。而对于这一代人的思想上的转变以及"文革"造成的精神后果，似未见到系统的研究。

一项研究，若能对相关概念加以界定和澄清，将是有好处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到底延续了多少年？按官方的正式说法是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人们习惯于接受这一说法，这从高皋、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名称上就看得出来，而海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文革"只有3年左右，比如朱莉亚·匡(Julia Kwong)的一部著作就名为《中国学校中的"文革"，从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1]，而以研究红卫兵著名的学者陈佩华(Anita Chen)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消除

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把“文革”定义为3年还是10年，表明了一种原则性的区别[2]。本文取“10年‘文革’”之说，仅是为了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而且论述的时间延伸于此10年之前和之后。

“红卫兵”也是一个大可争议的概念。有人将其限定为发起组织红卫兵，持血统论立场的那批人，而将后来卷人运动、持对立观点的人称为“造反派”。本文将所有投人运动的青年学生统称为以极其约略地估计为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3]，事实上，在红卫兵和非红卫兵之间，在运动的投人者和所谓“逍遥派”之间，常常难于划出明确的界限。因此，如果要含混地认为本文论述了所谓“共和国的第三代”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也未尝不可。

至于红卫兵的行为，也是人言人殊的事。在局外人印象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中烧图书、砸招牌、改街名、毁教堂、挖孔坟，以及抄家、斗争“黑帮”、“牛鬼蛇神”。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干的事，对于后起的造反派而言，还有查抄“黑材料”、揪斗“走资派”、围攻军区、真枪实弹地武

斗，等等。有人将这些行为视为胡作非为，将其概括为“打、砸、抢、抄、抓”，而红卫兵自己则认为是“为捍卫毛主席而战”，完全充满正气。种种行为，毋须分类和作进一步描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造反”。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追叙和分析种种造反的事实，而在于分析红卫兵为何造反的原因。显然，不同派别、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思想发展程度的人造反的动机会有所不同，当然，一个人的行为之后会混杂不止一种动因，而由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共属青春时期，造反的原因中也会有相同的因素。

本研究的进行，主要依靠对当年红卫兵的访谈，大量、系统地阅读“文革”期间官方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以及作者本人亲身参加“文革”的经验。有两方面因素对于本项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准确性发生影响，应在此预作说明。

作者“文革”的亲自经历对于研究有相当影响，这种经历可以使作者与采访对象的谈话进行得极为深入，觉察出有意识或无意的误记，在口头和书面的各种矛盾表述中作出正确判断，对于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各类文本作出正确的解读，发现易于为常人忽视的研究线索。另一方面，大量事例说明，前红卫兵对于“文革”的反思，难脱自我中心

偏见(这是每一代人都难免的)和当年派性余绪的影响。对许多人而言，“文革”经历不但不是一笔精神财富，反而是无法突破的思想樊笼。本文作者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并尽最大努力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至于效果如何，则只能由读者评判了。

作者的采访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郑州、成都、拉萨、济南等地进行，北京的被采访者有不少是当年东北、西南、华东、西北各省的前红卫兵，总数为一百多人。从全面调查的角度看，这样的数量是太小了，骆思典(Stanley Rosen)为写作《红卫兵派性和广州的“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1982)一书所作的采访，就在千人以上。在坦率承认调查数量的劣势和不具有统计意义时，也有必要指出它的另一种优势：以前的调查往往局限于一个城市(广州、北京)，对象基本上只是中学生，而本研究的调查范围几乎涵盖全国，在不同派别、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年龄的人中进行，访谈对象的丰富多样对于结论的适当性显然是大有裨益的。另需指出的一点是，不论怎么注意被调查者的代表性，访谈只是偏重于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间进行，和多数人相比，他们身上的那种随遇而

安、无所谓、随大流的倾向要弱一点。如果说，为了理论研究的目的，本文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那么应该记住，真实的历史要显得平淡灰暗一些。

二 “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

中国的青年学生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狂热而好斗的，“文革”前的革命理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大学解放军运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学校里和社会上的文化气氛，已经在一代人身上孕育了渴望革命，急欲“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激情，而“培养接班人”的种种举措，已使一小批先锋分子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事过30年，现在来检讨“文革”前的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和内容，是有益的。

应该说明，不应对“文革”前的一切全作负面评价，以前的教育毕竟使青年学生养成积极进取、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好学、能吃苦耐劳、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等品质，这些品质具有斯巴达式的特征。“文革”由于方向的错误，使得负面因素凸显并恶性膨胀，本文谈的正是这方面的问题。

1. 革命至上

被采访的前红卫兵中，绝大多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归因于理想主义，而且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既是学校教育培养，也是社会风气熏陶出来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内涵是“革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青年少女可以剃成光头，挥舞皮鞭，开口闭口“他妈的”！所谓“黑五类”可以领人去抄自己的家；为了让自己的组织被公认为“革命组织”，群众之间可以打得头破血流，敢于与公安局、军区对抗。

所谓革命，就是高度政治化，“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与政治上的正确性相比，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学生的任务本来应该主要是学习知识，但在多年的关于“红”与“专”的辩论中，大多数时候“红”占绝对优势，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推迟高考，以便让学生搞运动，此举使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性破坏，但得到许多学生热烈拥护。少数想上大学的人不敢作声，自感理亏心虚，因为怕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个人主义”。在这种气氛下，知识得不到尊重，教师得不到尊重，图书馆、实验室被毁坏而无人心疼。

所谓革命，就意味着必须加入组织。“文革”前共青团员比一般所谓“群众”要高人一等，对于升入

大学也大有好处，“文革”中这种心理惯性依然存在，许多当上了红卫兵的人对“逍遥派”鄙夷不屑。有一个被采访者说，运动开始后他的兴趣一直是看书，尽管看的是马列著作，但禁不起一个积极分子的批评：“不要做民主个人主义者！”于是赶忙去办小报、印传单。不少本来并非积极的人，因为想到运动后期要考察每个人的“革命表现”而参加活动。

革命理想教育在“学雷锋”的活动中注入了新的内涵。对雷锋精神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乐于助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但愈接近“文革”，另一种解释就愈占上风，这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种精神在“文革”中发展成在车上让座要问对方的家庭成分，医院可以把濒死待救的“牛鬼蛇神”推出去。

学雷锋和学解放军运动聚焦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由于林彪把学习雷锋和学习毛著的目的归结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因此革命的标准从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中间经过忠于党，而最后变成忠于最高领袖个人，这一代青年本来被教导为随时要想到：“我应当为革命干什么？”现在变成了只需要知道：“领袖要我干什么？”这导致了“文

革”中红卫兵敢于攻击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因为他们被告知说这两个人反对毛主席。林彪还倡导“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使得红卫兵和其他人一样，把毛著当成世界上惟一的真理大全，以为从中可以找到对一切疑难问题的答案。“文革”中最常见的事就是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红卫兵打语录仗，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只能受到打击和讨伐。一位陕西的被采访者说，他们第一次武斗打死对方五十多人，学生们打扫战场，看到伏尸遍地，吓得胆战心惊。这时一个成年人引证毛主席语录说，这是共产党打国民党，于是大家释然，从此愈斗愈勇、愈狠。

革命化教育的内容是“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接班人的含义主要不在于道德修养，而在于掌权。革命化一旦和个人的前途、权位相联系，于是在学生中形成剧烈的竞争。出身好的学生强调“自来红”的先天优势，以虐待自己的同学和师长证明自己接班的资格和能力，而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中，除了极少数人彻底绝望、自暴自弃外，大多数人卷入一种疯狂的“表现”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文革”中体现为一方面要证明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另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压垮对立派，甚至消灭他们。

2. 反文化和反文明倾向

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与义和团的落后特征有雷同之处:由于蒙昧无知而产生的自大狂、反理智反文化、藐视文明与人性。其实,“文革”前的社会文化气氛,就是这种情绪和倾向的温床。

“文革”前,人们生活在一种政治神话中,而青年学生最为坚信不疑。据说,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基地,北京成了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好像有这么一种历史趋势: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不断东移,马克思、恩格斯期望的工人革命没有在西欧发生,革命重心转移到苏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的叛卖,埋葬帝、修、反的任务已由中国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关键问题是有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被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卷土重来。最危险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变天、复辟的手法是把青年培养成修正主义的接班人。青年学生中很多人既有祖国受围困、傲然屹立的危机感和自豪感,又有社会安危、事业垂成全系于一身的自我中心感,这使得他们过分自信、目中无人、咄咄逼人。

在这种政治神话中,没有法律、秩序、文明的地位。请看一个典型例子,在1963年秋天,一群学生听到美国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时,“我们十几个小伙伴

顿时激动得拥抱成一团。在我们眼里，黑暗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都认为那位刺杀肯尼迪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讲这话的女士二十多年后到了美国，才知道肯尼迪被谋杀这一天对于美国人民意味着什么[4]。另一位被采访者说，当听到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赴美吊唁而内部传达中将此定为"叛徒行径"时，他感到义愤填膺。这样的人后来会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奇怪的。

反文化的倾向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并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学生。从60年代初往后，越来越多的人听说过毛的话："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不但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而且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是复辟的潜在势力。在"文革"初期，毛也表示了一贯的蔑视知识分子，让他们斯文扫地的态度。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附中红卫兵头领时，问及批判北大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一事，毛说："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在这种精神倡导下，中国几千年尊师重道的传统被打得粉碎。以致于"文革"一开始，中国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谭厚兰的带领下到山东曲阜，挖孔墓、砸孔庙、烧古籍、毁石

碑、掘坟曝尸、揪人游斗、开万人"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文革"前批判"人性论",从文艺理论领域扩大到各个方面,人性、母爱、温情等被当成革命斗志的腐蚀剂,人道主义原则是背叛革命的修正主义。许多学生都以立场坚定、斗争性强相标榜。一个人只要被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标签,就可以遭到任何凌辱而不得怜悯。有一个前红卫兵回忆道,他曾和另外的同学给校长剃鬼头,将他打翻在地再用脚践踏,最后把绳索拴在他的脖子上,牵着他命令学狗爬。他"文革"后痛心疾首地表白:"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心也许被狗吃了。"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革"前列为高中语文课文。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被党内外不少人称为"痞子"的农民赞誉为"革命先锋",鼓吹那种动辄就抓人、捆人、戴高帽子、押人游街的行为,欣赏随意冲入富人住宅,到小姐少奶奶牙床上去滚滚的心理。毛称为"矫枉必须过正",称革命运动"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这篇文章对学生影响极大,使他们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革命群众运动从不存在"过分"问题,表明一个人站在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立场的,就是认为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暴烈行为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被采访者中大

部分人——不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不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述说，当时学生们均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暴力行为辩护。

3. 斗争哲学

红卫兵言行的突出特征是偏激好斗，他们把“乱”当成形势大好的标志，不然就叫“死水一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奉为金科玉律，动辄就要把一个地区搞得乱糟糟的，“越乱越好！”他们决不能容忍异己之见，视谈判为软弱，把妥协当成叛卖，决不愿意和其他派别搞联合，把任何事情都当成原则性路线斗争。他们做任何事都决不会适可而止，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他们没有建设性，只善于破坏。

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种哲学把事物和发展动因归结为矛盾斗争，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哲学，“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哲学，中庸之道和调和折衷则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态度。对斗争哲学的宣传在“文革”前因为批判杨献珍而达到高潮，许多学生都卷入了这场学习和批判运动。毛在“文革”中将其斗争哲学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针对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险境，他说：“有些地方前一向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甚至

还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打一下,也是个锻炼。"现在的人肯定很难理解他的"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而红卫兵在当时却将其视为行动的指导原则。

被采访者中许多人现在仍然一往深情地回忆起1963年至1964年"九评"发表时的激动心情。这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回答和评论,是体现斗争哲学的杰作。比如,第5评题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说"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它搞"刽子手式的镇压",而赫鲁晓夫的政策则是"牧师式的欺骗"。第6评是"两种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该文指责赫鲁晓夫"适应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攻击他"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决不会有好下场"。在这一场论战中,中方还把世界形势的特征归结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对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都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

偏激好斗的精神还有其他来源,比如鲁迅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坚持斗争,决不妥协和宽容的典范,这篇文章在"文革"前多年一直脍炙人口,"痛打落水狗"的口号成了天经地义的座右

铭。“文革”中，很少有人会承认犯了错误的人（和“走资派”或对立派）的检讨与悔过是认真的，“假检讨，真反扑”，“决不姑息，斗倒斗臭”是惟一的答复。白鲁恂（Lucian Pye）评论说：“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文化像中国政治文化那样强调仇恨的感情。不论是把仇恨颂扬为积极的德行，还是力求发泄敌对情绪，中共都是把在现今中国政治中业已确定的倾向推到极端。”⑤

好斗性和阶级性加在一起，导致无理性与残忍。1966年8月22日，上海市长曹荻秋劝大学生不要打人，学生立即表示反对，说打不打人的问题要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不要打人是不对的。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燃的鞭炮塞到一个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耳中，鞭炮炸响，他摔倒在地，痛得哇哇乱叫。当有人问她，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一点，她说，那人是阶级敌人，这么对待他还算轻的。

4. 阶级路线

一个学生在“文革”中的行为、态度、派别归属往往与其家庭出身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红卫兵运动的崛起以及向全国各地迅速扩展，与血统论的猖獗密不可分，这种血统论集中表现在首批红卫兵提出的对联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广大

学生的首次遭遇便是这对联，是它把学生区分为施虐者和受虐者，意气风发地参加革命的小将和无权革命，只能接受改造的旁观者，也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序上使一些人和组织成为保守派，使另一些人和组织成为造反派。血统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和"文革"前十多年一直贯彻执行的所谓"阶级路线"有极大关系。"文革" 前这项政策有时执行得十分严峻，有时较为宽松，而"文革"前夕此项政策又有一个貌似温和、理性的版本，即"重在表现"，使得有关家庭出身的社会矛盾在运动刚开始不久就尖锐爆发。

应该首先在理论上加以澄清的是，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所谓阶级路线也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正统的、公认的解释，阶级路线应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基础上指出的分清敌、我、友，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6]。显然，阶级路线和个人成分无关，与家庭成分更无关。但实际上执行的阶级路线，却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状况(不一定是马克思的经典的由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地位，还包括因为历史问题、思想问题而被贴上的政治标签)而把人划成三六九等的歧视性作法。在中国各类人群中，这项政策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大，因为家庭出身在升

学的政治条件中是最重要的因素，此外，他们在学校中还会为入团、当干部、获得校方重视和同学尊重展开激烈竞争。

在50年代初，由于百废待举，急需大批建设人材，阶级路线没有得到大力强调。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由家庭出身产生的区别对待日益明显。但在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项政策又得到最宽松的解释。政治局委员陈毅元帅在1961年代表党中央对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⑦]但是，从1963年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阶级路线的施行就严格了。1964年6月，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共青团九大的报告中说，虽然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本人不是剥削分子，但他们因为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受到家庭影响，因此对他们的工作只是"争取、教育、改造"。紧接着，《人民日报》在8月3日的社论中，把接班人问题和家庭出身紧密联系在一起，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核心领导中，必须注意使成分好、出身好同时又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锻炼的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保证我们的革命队伍和领导核心永不变色的阶级基础。"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学生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成绩好、工作好但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再担任干部和被当作骨干，以前不太受重视但有优越家庭背景的人开始崭露头角。

1965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的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重在表现"政策。同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这种新解释的出台背景很不清楚，各地贯彻执行情况很不一样，它使某些有务实精神的学校领导不惟一根据家庭出身选拔学生骨干有了依据，使大多数学生急于在"政治表现"上来一个竞争。不少学生对"重在表现"政策恨之入骨，因为它使得他们不能仅凭出身就取得优势地位。彭真在"文革"中首先遭难，使得血统论红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复辟纲领，而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则捍卫它，企图以"革命行为"弥补先天不足。他们想用极端的、不顾一切的"革命造反"行为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证明"我们虽然家庭不红，但心却是红的"！

5. 意识形态的限度

如果不提与以上诸因素相反的作用，那么对于“文革”前社会文化条件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也无法说明红卫兵这一代人后来走上了反省和批判“文革”的道路。

尽管“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大张旗鼓、全方位地进行，但意识形态的灌输并非绝对有效。除了人的本性对于过分扭曲人性的东西或多或少有免疫力之外，青年学生还会从家长、师友、邻居那里受到不同于官方政治教育的影响。一位颇有地位的前红卫兵头领在被采访中说，他的父亲从来都坚定地用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子女，对官方的言行持保留和批评态度，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关于国共斗争，关于美国人、俄国人的与官方宣传迥异的故事。总的来说，学生们容易从家长和教师那里受到固守人之常情、拒绝斗争哲学以及尊重知识的影响，而为数不少的人会从“右派”和失势的党员干部（如知识分子党员、以前的地下党员）那里得到党内斗争无原则、无意义、残酷无情的信息。在运动初期，这一类影响无法和宣传机器煽起的革命狂热与领袖崇拜相抗衡，但它们潜伏着，并未消亡。等到后期红卫兵吃了苦头开始反省时，它

们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50年代和60年代的意识形态毕竟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而个别的好学深思，有理论兴趣的学生从接受毛泽东的教导逐步发展到执迷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核和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他们从《共产党宣言》中可以知道，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里不但可以导出对于"文革"的批判，而且可以导出对"文革"前许多极左做法的批判。

众多被采访者一致指出，对他们思想影响最大的非官方因素来自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西方文艺对于中国青年的影响实在是源远流长，在促使中国人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方面，它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化形式。在50年代、60年代，一方面有对于西方经典文学名著的批判，一方面对它们的翻译介绍又在大量、系统地进行。而批判往往苍白无力，而那些优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却是无法抗拒的。在学生中，大部分自视甚高和有影响力的人都是爱读并大量阅读外国小说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革"虽然大破"四旧"，毁掉图书馆，把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定为"毒草"，并将许多"封资修"书籍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但这些书籍

的影响却以惊人的速度广泛流传。原因有很多，第一，毁书运动并不彻底，相反，大量"文革"前禁看或不易得到的书籍从图书馆和"反动学术权威"手中流传到学生手中；第二，"文革"前有一个由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和团组织及积极分子组成的监视系统，监护学生的阅读和思想状况，"文革"中这个系统不存在了，相反，爱看外国小说的人往往成了红卫兵头目，或者有影响的人物；第三，由于停课，学生功课压力消除，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看小说，尤其是在运动后期和上山下乡期间。有一个红卫兵小头目说，他在"文革"中读了罗曼·罗兰、雪莱、拜伦、莎士比亚的书，甚至读了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和穆勒的《论自由》，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通过这种自学，"文革"后他成了很有成就的诗人。他"文革"前受的教育很少，生活在十分荒僻的小县城。在大城市，在家庭条件更优裕的学生中，他们接触和传递西方思想的机会更多。

三　造反的动机和原因

现在研究红卫兵造反的直接动机和原因，易于出现偏差，因为红卫兵千差万别，每人造反的动因各有不同，概括时疏漏难免。另外，每个人陈述自己的

造反经历和动因时，会有意无意地隐瞒或夸大某些东西，研究者仅凭他人之言和自己的观察，不一定能完全把握住真实的情况。当然，大量的访谈、观察、比较，加上结合社会背景情况作周密分析，有可能接近事实真相。



层层覆盖的大字报

在指出时刻记住因人而异的同时，强调以下两种区别是有益的。第一，学生和社会上其他人群的区别。相比而言，学生造反的动机要单纯一些，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要大一些，虽然其他人群也有社会理想的追求和意识形态的狂热，同时学生造反也并非全然与个人利益无关。第二，红卫兵中带头造反的人、骨干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区别。由于开始造反面临着政治高压，带头者的理想和信念一般而言都较为坚定，在运动中后期，他们必须体察和考虑群众的利益要求，他们中许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也学会了政治手腕和越来越注重权衡利弊，但在刚造反时这些因素不那么明显。

1. 普遍性因素：青春期激情

依斯瑞尔（John Israel）在《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一文中说："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参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业的无情竞争中得到好处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谊，共同冒险和集团权力感，以及串连历险的机会。"[③]其实，这段话大体上刻画了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渴望投入社会变革的动因。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多数正处于这样的年

龄:他们急于向人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再需要家长、教师的监护,能够独立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长期生长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环境中,当政治动乱把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们体内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本性自由发泄,而是由坚实的政治堤岸导向既定的方向。在这个阶段,他们充满激情和想象,常常不能区分梦幻和现实,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战胜任何邪恶,也可以创造各种美好事物。他们缺少生活经验,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极端,把世界看成只有黑白两色,对人对事抱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态度。他们需要偶像并崇拜偶像,乐于将自己的理想、热情乃至一切奉献给某个偶像。

与这种青春期的骚动浮躁相对照的,是学校中十分枯燥刻板的生活。中国的文化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乏味和压抑个性的,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来不以启发人的心智为目标,从不面对实际,而是强迫人死记硬背,搞分数挂帅,对学生的要求苛刻、琐细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许多人抱怨说,学校中每一科教师为争取学生在本科目得高分,竞相以补课、留大量作业的方式挤占时间,使他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在"文革"前夕,北京若干中学里就发生过学生自发抗议、罢考事件,可见问题严重。"文革"爆发,受到学

生热烈拥护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可以不读书了。且看当初中学生的心情："学生们听说可以不上课了，都像笼中鸟看到那笼门已经打开一样，乐得自在，当然一齐大叫'不上了'。"[9]"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小孩儿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所谓长知识的阶段全在社会上，学校里的东西相对这些东西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你要考试要开学，就好像迫使你就范。"[10]

学校中还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要求学生热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这种热情和参与感完全得不到满足。正如广州一个红卫兵所说："我们感到压抑，没有投入国家政治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单调、沉闷的……在学校，政治被教导为党在这一或那一问题上的路线是什么。"[11]北京一个中学红卫兵首领在被采访时说："在学校里，党组织只是告诉学生这不准，那不准。"学校中的共青团组织本应是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但实际上团组织只是机械地执行党的各项具体任务的工具，而且相当官方化，完全不能满足学生的政治热情。正如依斯瑞尔所观察到的，团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是与学生有隔离感，群众害怕团员、团干部汇报他们的情况，二是人们往往抱着实用和机会主义的目的入团，表面上是

追求进步，实际上是为自己打算[12]。因此，许多真正怀抱革命理想和热情的青年对共青团并无好感，当"文革"中出现红卫兵这种组织时，人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文革"前，学生得到的党的指示都是板着面孔的、居高临下的教诲和训导。而"文革"爆发时，他们听到的全是鼓励、赞扬甚至歌颂，比如"十六条"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这些话是使人十分受用的，他们本来潜伏着的使命感极大地迸发出来，为了在斗争中一显身手，他们不惜头破血流。西安一个红卫兵骨干在1992年夏接受采访时，还能整段背诵陈伯达于1966年8月16日对外地赴京学生的讲话，这篇讲话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其中说："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他背诵到陈的勉励："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时，我发觉他热泪盈眶，身子微微颤抖。

武汉一位前红卫兵说的话可以当作很好的总结："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青年是极不健康、非常压抑的，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青少年生活，物质上、精

神上十分贫乏。在60年代，大部分人没有收音机。学校的教育刻板、军事化，几乎所有教师都是政治辅导员，管理学习以及学习以外的生活，从而生理、心理、情感方面形成了强力，没有宣泄的渠道。不能唱歌跳舞，不能交友，要听取各种各样的教导。因此，一旦有一个机会表现自己，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都欢欣若狂。以前被老师管，现在可以管老师，甚至打骂他们；以前规规矩矩，现在可以在外面活动多少天不回家；以前足不出户，现在可以坐上火车到处跑，这完全是青春期欲望的表现。人际交往、活动范围都空前扩大了。"

2. 老红卫兵:阶级斗争是主课

这里说的老红卫兵，指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成员当然是"红五类"[13]，核心为干部子女。他们因为后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倒老干部而被视为保守派，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运动初期确实反抗过学校党支部或工作组并因此受到压制，在这种含义上他们是最老的造反派。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为了改变他认为的大权旁落的局面，在文化教育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发起了攻势，攻击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

人，并因而攻击现存的方针政策和体制。事实上，早在“文革”前几年，他就不断地鼓励和号召造反。从1964年开始，毛在各种谈话和批示中，对学校教育作了极为尖刻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反映了他从小藐视当好学生的禀性。他在1964年春节对一些人谈话时说：“现在这个办法摧残人材，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停止。”紧接着，他对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作了一个批示：“现在学校里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解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与学生为敌，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除了严厉批评现行教育政策和方法，毛还提倡要投人社会生活，从事阶级斗争。他主张学生走出学校，去搞四清。在1964年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毛说：“都是上课，理论有什么用？应该到实际中去学。”“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搞四清……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

毛的一系列谈话与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大中学校中广泛流传（毛远新所在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把毛的谈话印发了几万份）。在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中，毛的上述指示更加引起了注意和热烈的议论。这些人政治上敏感，对上层政

治信息和动向十分关注。由于父母的政治斗争经历，由于“接革命班”的号召，他们志不在科学或艺术，而是跃跃欲试，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他们早就不满于学校中按部就班的学习，一再要求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搞阶级斗争。1965年6月，北京4中、6中、8中等就有部分学生串联起来，搞罢课，给中央写信，要求去农村参加四清。1966年3月，上海某校一些高中3年级学生（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公开提出要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在“文革”前夕，北京2中等校学生对学校布置的高密度考试和过量的复习功课安排提出抗议，他们质问说：“既然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主课，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搞阶级斗争？”他们引证毛泽东对教育体制的批评，扬言要罢考。最后，北京市教育局居然作出让步，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其实，教育部门在毛泽东的号召或压力下，早就开始把教改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北京101中学设置了劳动实验班和专收郊区贫下中农子女班）。这一方面使学生更加有恃无恐，感到反抗现行教育制度有法理依据，另一方面，他们对当局按部就班、慢吞吞的教改步伐深表不满。

文化教育战线形势的紧张导致了学生的分裂和对立，尽管这主要发生在中学生之中，并且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出身于非红五类，尤其是中等家庭因而

对“重在表现”政策抱有极大希望的学生，既因为自己学习好、工作能力强而对阶级斗争的弄潮儿不服气，又怀着不甘寂寞的心情，企图以异乎寻常的革命表现博得破格录用，跻身于接班人之列。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竞争日趋激烈，各自的利益与最高层的偏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形势的好坏则取决于学校当局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视和对于“重在表现”政策的理解与执行。

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是这种竞争和矛盾的典型。这是一所高级干部子弟十分集中的学校，尽管该校以教学质量高自傲，但从1964年起，学校工作的重心已向政治转移。校长和班主任常常把学生中的高干子女召去开会，谆谆嘱咐说：“你们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你们的父母是革命家，你们天然地对党有特殊感情，党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争气，以后接班就指望你们了！”干部子弟经常和某些教师、干部的“重在表现”倾向作斗争。红卫兵的主要发起者卜大华回忆说，在1965年，他和几个干部子弟同学得知学校准备培养一个学习好、听话，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入团，他们愤愤不平，去质问道：不第一个发展根正苗红的卜，想干啥？他们结伙和有关人士抗争，终于使学校同意卜成为全年级第一个团员。过了不久，在选举班干部时，他们又挑

起争论，指责校方选拔干部不讲阶级路线，挑学习好、听话的学生是鼓励走白专道路。这次他们又成功了[19]。同校的造反派首领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追忆了性质相同的另一事件。1964年的一天，两个同学发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伤人，被骂的给了他一拳。这本是一桩小事，校长对全校学生作了从无前例的讲话，重提此事，将一方狠狠批评一顿。全校学生觉得不公平，贴出了不少大字报，这招来学校当局的严厉压制。回忆者说，问题的实质原来是，挨了一拳的是高干子弟，尽管他本人已写大字报承认自己首先骂人，侮辱对方人格，表示了道歉。但学校领导仍然要以打击其他学生的方式表示自己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决贯彻了阶级路线。因为就在前不久，另一个学校的领导就因为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贯彻阶级路线不力而在四清运动中垮了台。

毛泽东在和侄女王海蓉的谈话中说："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回去，开会你就是不去。"当王表示不敢破坏学校制度时，毛说："我看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可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带头造反。"王海蓉造反时讲，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才造反的。到了"文革"前夕，毛在

1966年3月18日的谈话中说:"去年9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我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过了4个月,以清华附中学生为首,果然杀出了自称是"孙猴子"的红卫兵,扬言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毛泽东极为赞赏,把他们这个宣言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作为文件印发。

外地首批红卫兵的情况和北京大不一样。在外地,干部子弟集中的程度不如北京,他们父母的级别不是那么高,他们政治消息也就不那么灵通,他们向本校领导挑战的气派也要小一些。他们往往是在首都串联到本地的红卫兵的鼓动之下,在省市委直接操纵或帮助下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但在狂热推行血统论方面则一样,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攻击学校和教育系统领导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力,培养和重用了那些学习成绩好,听话肯干的"修正主义苗子",他们也把"重在表现"政策攻击为是"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如果说,北京某些红卫兵的发起者开始是真正造反,后来转向"保守"的话,那么外地一般而言不存在这样的转变,他们被对立面攻击为"保皇兵"、"御用工具"。当然,在外地也有个别

的出类拔萃之辈，在“文革”前藐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靠温顺乖巧得到重用的手法，在“文革”开始时与学校当局对立，甚至批评或攻击当地党委，骆思典在广州的采访中，本文作者在上海的访谈中，都遇到过这种人。

3. 造反：家庭出身和党的两种声音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造反派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前受到不公正对待，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趁社会动乱之机攻击党的组织，动摇现存体制，向既得利益集团和派别争夺权利。这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是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成员在家庭出身方面的明显区别。

本研究认为上述说法是过分简单的，因而是错误的。首先应该澄清，造反组织中有许多人家庭出身不太好，与人们造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是两回事。正如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九三学社，不能把他们的动机归结为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一样。事实上，出身好的人，以及保守组织瓦解后的成员往往也参加造反组织，原因很简单，因为毛泽东号召人们这样做。其次，如果说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成分的差异反映了社会集团利益的差异，这是对的，而将造反的动机直接归因于家庭出身，则是不确切的。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家庭出身有差异，这在“文革”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首先将其载入学术文本并认真进行分析的是西方学者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和安德佳（Jonthan Unger）。他们将这种差异用具体的百分比数字表示出来并加以对比分析后认为：“这些‘阶级’对立转化成了红卫兵的派别”[15]，“两派的冲突是‘阶级’之战的事例。”[16]这种说法蕴含着造反者造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们强调的是略微不同的一面：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斗争具有社会“阶级”利益冲突的性质。某些研究者据此将造反派的动机与其家庭出身直接联系，比如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人认为：“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17]

采访和调查表明以上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运动一开始流行的口号就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造反和保守基本上只是“红五类”学生内部的事，连街头辩论，也首先要求发言者声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没有发言权，遑论造反。看一看全国著名的造反派头领，如北京的五大领袖、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凤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哪一个不是

要么出身好,要么是党团员骨干,更不用说在不同时期带头造反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如李永贵、李顺达、李素文、尉凤英、徐学惠等了。

其次,造反派队伍内出身不好的人较多,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不是人们根据出身,基于利益追求而作出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运动过程发展变化使然。由于运动初期的血统论,虽然大多数人都习惯性地支持和保卫基层党组织,但其中出身不太好的人急欲表现他们的忠诚而不可得,反而受到"红五类"的排挤打击。到 1966 年 10 月中央带头批判以血统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可以参加或成立组织了,他们可以清算对他们的歧视和迫害了,这时保守组织也名声扫地、摇摇欲坠了,他们当上造反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仔细研究红卫兵中的头领和骨干分子可以发现,"文革"前学生中的活跃人物有两类,一类为"驯服工具型",他们把拥护党的领导和服从自己的顶头上司当成一回事,把革命理想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具体任务当成一回事,他们的特征是听话,习惯是追随,他们不能根据革命导师或最高领袖的教导分析形势和确定任务,他们认为自己的思维不如领导正确,自己的领会和解释不如领导深刻、恰当。而另一种是"自行其是型",不论是出于思维活跃还是个

性倔强，他们凡事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喜欢自己拿主意，不乐意盲从。他们也要当革命者，但不安于仅仅听从上级的教诲和指挥，而想弄懂革命的原始教义，为了坚持自认为掌握的革命原则和精神，他们敢于顶撞和反抗自己的顶头上司。

第一种人总是占多数，并形成革命青年的主流。第二种人较少，但始终存在，尤其是通过“九评”等“反修理论文件”的学习，使这批具有“胸怀全球，心忧天下”的人大大增强了自信。当毛泽东越来越尖锐地批评文教部门党的领导工作时，他们的嗅觉敏锐了，警惕性提高了，胆子也大了。

在“文革”前的17年中，后一种人总是受到排斥、打击，甚至大吃苦头。其实，所谓“胡风集团”分子和右派分子中的多数，就属于这种有独立意识，也有点自以为是的人。在常态下吃香的是第一种人，但运动初期，政治形势变得异常和紊乱了。来自党的声音不是一种，而是变成了两种：一种仍然出自逐级传达的文件和报告，另一种来自某些报纸、杂志、电台，令人隐隐约约觉得是毛泽东本人的，在党内未占多数的主张。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警告反映了这一点：“你听谁的，听党委还是听报纸的？”而《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从对立立场上也反应了这一点：“任何人，不论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

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时,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必须作出选择。-般而言,第一种人继续听上级领导的话,成了保守派,而后-·种人易于起来造反。

这种情况可能并非人类历史上第·-次,被采访的几个红卫兵头领或理论家都作出了以下比较。他们把执政的中共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系统相提并论:两者都有救世主,都有福音书,都是严密的等级控制体系。平时,教徒通过教会和上帝发生关系,教士解释上帝的意志,惩罚异端;革命群众通过党组织拥护中央和领袖,书记们解释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但是,宗教革命爆发了,马丁·路德宣示,教徒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勿需教士作为中介,教会和教士往往是腐化堕落的,违反基督教精神;"文革"爆发时情况也类似,最高领袖突然直接对群众说话,指控党组织和书记们对领袖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他们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4."文革"发动者的策略手段

即使学生中的少数敏感者觉察到来自党的声音

有些变调和紊乱，他们也没有想到人们必须在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作出选择；即使由于历史原因和林彪的造神运动使得毛的威望大大高于刘，人们也难于想象他们两人的差别是-·个应当被无条件拥护，-·个应当被坚决打倒，况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明确知道毛泽东的意图。但是，造反派狂热地拥护毛确实出自内因，他们不满意刘的路线和政策也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总之，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毛和刘代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是相信和依靠群众、支持和保护群众，一是镇压群众。对立的焦点是工作组问题。

住在杭州的毛泽东不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任何负责人商量，批准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全国各地学生仿效，造成学校领导和部分师生的尖锐矛盾。为了应付极为复杂的局面，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专程飞赶杭州，向毛汇报情况，并请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请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两人回京后，主持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入校。按照中共集体领导原则和毛的委托，这个决定完全具有合法性。此外，派工作组也是中共党领导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一贯方法。土改时就派了工作队，四清运动也派工作队。而且，前不久毛泽东

本人还批准派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中央会议，对于派工作组的决定并无反对意见。会后，刘少奇将决定电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少数敢作敢为的学生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精神大造其反，而派往各校的工作组依照党的工作历来常规，要加强领导，要把运动纳入既定轨道，双方不能不发生剧烈冲突。工作组把一些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有的学生被监禁，甚至被迫自杀。事后也许不少人说工作组做得过分、不合理，但哪一次运动工作组不是这么做的?

但这次确实不一样了，毛泽东于7月18日一回到北京，就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他们镇压学生运动。他气愤地责问："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紧接着，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看望和慰问被关押的造反者蒯大富，表示对他的支持。到了8月5日，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把矛头直指刘少奇，说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

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不少前红卫兵说，当他们第一次听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时，简直不敢相信。谁能料到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会受到这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谴责，谁能想到像"炮打司令部"这种口号的话竟出自毛主席。

刘少奇被宣判了政治死刑，他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摔了个大跤。造反派可以指责刘压制了群众，但若在党内争论问题，刘错在哪里呢？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会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听任牛鬼蛇神翻天"。而刘如果处在可以批评毛的地位，他也可以说毛"听任右派向党进攻"、"动摇无产阶级专政"。难怪7月29日在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大会上，刘这样对学生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在这里名为检讨，实际上是表达了他左右为难，动辄得咎的处境。

以后的事态似乎证明在如何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确是存在两种立场、两种态度、两种方法。

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共8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万红卫兵，这是新型的、革命的朝见活动，其效果是明显的。一个中学女

红卫兵回忆说："那天检阅回来，大家激动得不得了。同来的一位高中同学割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在一个白被面上写下十几个通红的大字'紧跟毛主席，永远不变心，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一脚踢开我们的房门，举着血书进来说，谁赞同，来签名。我们二话没说，都割手指签名……第二天我们就杀回老家造省委的反去了，我们省夺权在全国是靠前的。"[19]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摆出一副"尊重群众，与群众心连心"的姿态，他们在群众集会上经常和学生手挽手，下雨时学生给他们打伞，加衣服，他们坚决不要。他们特别在发言中大放阿谀逢迎之词，以示和刘少奇等"做官当老爷"的人迥然不同。比如江青7月25日在北大参加辩论会时发言说："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勤务员。"

对于遭受过歧视、排斥、打击的学生来说，1966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颁发的两份文件使他们终生难忘。一份是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做的关于运动的两个月总结，他集中批判了镇压群众和搞血

统论的做法。另一份是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其中规定，要给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人平反，要销毁强迫他们写的检讨和整他们的黑材料。几乎每个造反派积极分子都清楚记得，当他们得知这两个文件内容时他们是多么激动和喜悦，这不啻于让死刑犯获得解放。他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毛泽东，决心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他们形容自己当时心情不约而同地用了这句话："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方觉得毛主席亲。"

当刘少奇已被彻底打倒，习惯于大轰大嗡、到处冲杀的红卫兵已成为碍事的力量时，毛及时地说：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当运动后期他们受到比工作组厉害十倍的压制时，他们才对"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是否真有原则区别产生怀疑。

5. 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对"文革"的具体进程，对卷入"文革"的群众的政治面貌、家庭出身、他们的遭遇和情绪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广大群众起来造反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中国当时体制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这里所谓的社会矛盾，主要指根据家庭出身把人分成等级，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歧视，不同等级的人政治待遇不

同，付出同样劳动或精力得到的结果不同，在政治风浪中安全程度不同，等等。政治矛盾指上级对下级，干部对群众，党内人士对党外人士的警惕心理和压制态度，不允许人们有不同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一遇意见就说对方别有用心，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官与民，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民主与平等，只有某种依附关系。

不可否认，“文革”中群众起来造反，除了意识形态作用，“文革”发动者的谋略之外，人们的内在热情也是原因之一。人们追求公正，因此不满意根据家庭出身遭歧视；人们追求正义和民主，因此不能忍受一味顺从，一有异议就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有正视第一点，才能解释造反组织中为什么出身不太好的人较多，也只有承认第二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少出身好，甚至是党团员干部的人也要出于主持正义和讲公道话而造反。一位十分著名的红卫兵首领说，她出身很好，在学校一贯受重视，当干部，“文革”时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因反对把同学划成三、四类，提了点反对意见，受到打击，最后被逼得造反，私自跑到北京告状。

对这两种矛盾，不同的人有侧重点不同的或用语不同的阐述。比如林·怀特（Lynn White）在《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中说，“文革”的社会基础有

二,"第一个因素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给人贴政治标签的政策(如'走资派'、'右派'、'坏分子',或者'工人'、'革命烈士后代'等)。这些政治标签可以使一个家庭的全家人在就业、求学、城市户口、物资供应配额等方面受到不同待遇。第二个因素是,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所制定和执行的各种政策使'单位'中的个人越来越依靠当地党的领导人——中国人改善生活的其他出路完全被堵塞了。"[13]

另一篇文章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如下总结:"一头是弄虚作假的'驯服工具',一头是遭受迫害的'阶级敌人',一般群众就生存在这样狭小的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政治窄缝里。尽管在高压和钳制下,表面上一片热烈,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基层的离心倾向和上下的对立情绪则越来越严重了。人际关系紧张到了临界状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篇文章的作者把"文革"中的造反看成矛盾爆发的结果,"'文革'期间,尽管在口号上'左'得出奇,但许多卷入者的行为,正是由怨愤和反抗心理所导引的。在'文革'波及全国,各地揪斗负责干部势如雪崩时,这种怨恨和反抗心理表现得十分明显。许多单位的失控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后开始的,多数群众之所以热烈赞同批判'资反'路线,是因为反对政治迫害。只有在烧毁黑材料时,人们才真正感到痛快,感

到‘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因此，虽然旗号打的是造‘走资派’的反，而实质上不过是对整个整人——控制体系的反抗。这就是推动‘文革’(到了几乎不可收拾地步)的社会层面的潜在致因。”[20]

不少前红卫兵至今仍然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在是否看到和打算改造现存体制弊端方面，确实有不同。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比如，安边戎(Byung－joon Ahn)认为，“文革”第一阶段表现为两种政策过程模式的冲突，一方是以毛为代表的群众动员方式，一种是以刘为代表的体制化方式[21]。他还认为，毛追求群众运动，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习惯于最高领袖直接和群众联系；而刘善于组织，固守纪律，长于在党内操作[22]，以上见解从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实际说，毛和刘对于群众，对于维护现行体制的决心和坚定性，并没有差别。

四 从狂热到反思

从总体上说，红卫兵这一代人经历了从盲目追随、狂热投人到信念动摇、破灭，对“文革”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过程。许多人在不同时间，因为不同事件的触发而导致思想转变。一般而言，越是挨近“文

革"策源地的地方，人们思想变化得越早。最先反省"文革"的，是那些卷入得最深的人——开始是首都老红卫兵，接着是首都"三司"的学生。他们和中央"文革"小组打交道最密切，政治斗争的无原则、肮脏和残忍使他们从革命理想中惊醒。大致说来，大学生的觉醒较早，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影响了中学生，但中学生由于后来更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许多人在反思的路上走得更远。转变的刺激因素不是单一的，因人而异，但许多人思想转变有类似的原因，是一系列事变的综合结果。

由于红卫兵一代人投入"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革命理想，因此，他们的批判和反思就不会仅仅针对"文革"，大部分人对以前的信念产生隔膜和疏离，而其中一部分人与之决裂。

1."联动"的最先发难

最早起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抗争，明确反对"文革"中一些作法，甚至把"文革"运动归为左倾路线的，是首批造反的北京老红卫兵。他们集合在"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面旗帜下，率先表现出抵制"文革"的思想和行动。

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对老红卫兵越来

越疏远和冷淡，转而支持他们的对立派，曾被他们瞧不起和压制的造反派。与此同时，他们发现，运动的对象并不是他们热衷于攻击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而是作为他们父辈，作为他们权力和荣誉来源的老干部。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曾写了这样的对联："想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横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还有人写了这样的诗句："昔日美梦不重返，只因'三司'受宠爱。"在"联动"成员组成的"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的宣言中，他们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证明，"文革"完全违背了反修防修的初衷，"共和国的元帅们、副总理们、部长们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被抄家，被批斗，有的甚至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联动"的出现也是上层有人反击运动中揪斗和打倒老干部倾向的响应。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在军事院校系统赴京串联师生大会上讲话，含蓄地对运动中的一些作法表示了异议和抗议。比如陈毅说："现在搞校长处长不过瘾，要搞部长，搞部长还不过瘾，还要升级，要搞我们几个副总理了！"他暗示当时批判"资反路线"是"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这是错上加错，犯更大

的错误。"叶剑英在讲话中批评造反派"没有阶级感情",指责他们在干部犯病时还要去揪斗。失势而又不甘于失败的老红卫兵把这次讲话当成一种反击信号。11月27日，十多所中学的老兵聚集在北大附中，商议成立新的统一组织，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他们最初是和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对着干，但马上就公开表示出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用几十张纸刷成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的抗争引起了"文革"派当局的无情镇压，其成员被公安部逮捕，1967年1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明确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要对之进行法律制裁。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曾几次冲击公安部，要救出自己的战友。在最高层党政军负责人的抗议之下，"联动"被捕人员全部得到释放。

"联动"的呐喊是全面抗议"文革"的先声，他们的活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首先是因为他们仍然坚持招人憎恨的血统论和不合时宜的等级观念。在1967年的元旦通告中，他们发展成员的组织路线是："(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当然，根本

原因是他们的抗争显得为时过早，“文革”派的劣迹和运动导致的灾难还没有充分暴露，广大人民的觉醒还需要相当时间。

2. 政治斗争阴暗面的刺激

红卫兵这一代学生只是在“文革”才生平第一次接触政治斗争。在以前，由于各种教育，他们印象中党的领导人不论在言论还是行动上都是光明磊落的，他们以为政治斗争毫无疑问是是非分明、有高度原则性的。但“文革”向他们展示了出乎意料的东西：政治斗争是肮脏的、政治生活是阴暗的，这一点使人难于接受。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一次是19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背后有人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痛快。”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许多成员打过一些交道后，卜大华的感觉是：“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③]

在“文革”中，只有极少数红卫兵从某些政客那里学到用冷酷无情、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搞政治。据

"文革"中的揭露说,"文革"派人物王力、林杰等对红卫兵讲话时偶尔道出了政治斗争的真谛,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引诱对方犯错误","自己犯了错误要矢口否认",等等。少数人如获至宝地聆听这些教导,而大多数天真、诚实的人则反感、惶惑,他们对自己斗争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许多人有感于政治斗争不可捉摸和可怕而退出运动。

"文革"派一心打倒他们的政敌,为此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受到损害的不仅是被打击的"走资派",而且是党的威信。当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时,有人怀疑道,难道刘不是毛多年的亲密战友吗?难道不正是刘的倡议,才使"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正式载人党章的吗?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本来有毛以赞许口气引证了刘少奇讲话的文句,"文革"中删去了这些话,这种手法只是显得不诚实和可笑。正如张旭成说的:"'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几乎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29]

江西一位曾经狂热地投人"文革"的红卫兵李九莲在写给战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

化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有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26]

3.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使几乎每一个中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不满首先是大迁徙的强迫性，许多人不愿意下乡（不少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他们的父母会为此进学习班，"文革"中不少人属于"有问题"，如果子女不下乡，就会罪加一等。其次，人们普遍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运动刚开始时他们意气风发，被捧为革命先锋，用过之后就像处理垃圾一样统统打下乡，学生自然会产生"兔死狗烹"的想法。

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与他们以前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来的东西形成尖锐的对照。有人早在大串联时就对触目惊心的贫困感到震惊，一篇文章记述道："他们惊奇地发现'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全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大好形势下，这里竟贫穷得令人心颤。村子缩在荒山秃岭之下，与世隔绝。山民们一个劳动日值6分钱，一个鸡蛋卖8分钱，一个人一天还顶不上一只母鸡一天的价值。由于近亲通婚的原因，山民们长得极其丑陋和怪异，患痴呆症的人不少……当地的山民们还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一年的大部分日月能吃上土豆。’这里的男人几乎一年四季没上衣穿，天热了光着身子，天冷了则披一件油光光的兽皮。山民们家家没床，垫起树叶或野草铺一床竹席便席地而卧。村里的一位退伍军人，有一床破军被和缀满补丁的白床单，便成了全村的‘首富’。”㊽

很多学生都有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经验，为了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农村干部往往要组织他们和农民一道吃一顿忆苦饭，忆苦饭用粗粮、薯藤或野草树叶作成，据说农民在解放前就只能吃这种苦不堪言的饮食，现在故意吃上一次，以比较出目前甜蜜的生活。令学生吃惊的是，农民们欢天喜地，抢着吃这种饭食，因为他们平时吃的东西并不比这好多少，而且难得碰上白吃一顿的机会。

学生们曾受过“三面红旗伟大正确”的教育，

下乡之后，才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农村造成的摧毁性破坏。比如，将茂密的林木砍伐殆尽，去大炼钢铁，使得以后家家户户烧柴做饭成了大难题，又如，大办食堂，强迫农民砸锅拆灶，开始敞开肚子吃，后来每天二三两米，饿得不能下地干活，哪家私自开伙，茅屋冒烟，村干部就带着民兵来抓人。大饥荒造成尸伏遍地，许多农户全家死绝。

各地知青都碰到过这种令人始而费解，继而令人难堪的场面。在召开“忆苦思甜”会时，村干部要再三给那些所谓“苦大仇深”的老农民打招呼：“这次是忆解放前的苦，忆蒋介石的苦，千万不要忆成刘少奇的苦!”但会上忆苦者往往声泪俱下地控拆“1962年的苦难”，他们认为这是刘少奇带来的。(学生们在日后知道，60年代初的灾难极为深重，但责任不在刘少奇。)

本来，国家的贫困，现状的落后不至于使学生们如此震惊，问题是以前的教育把形势描绘得太美好了，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吹得太过头了。学生们当然用以前树立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他们不但知道形势很糟，而且感到以前的宣传和教育是骗人。他们本来只是在政治上感到疑惑和苦闷，现在，他们开始对社会不满了。

4. 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是对红卫兵原有的正统信念最沉重的打击。对于原来属于不同派别，“文革”中有不同经历，年龄各不相同的人而言，这一事件在心理和思想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每一个人事后回忆时都说，他们听到这一消息时惊得目瞪口呆，官方各种文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完全不能使人信服。他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法定的接班人，毛惟一的亲密战友，“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全国人民每天必须祝福其“永远健康”的人，会“企图谋杀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妄图政变”、未遂而“投靠苏修”、“叛党叛国”呢？现在的知识青年，以前的红卫兵不得不思考，既然他们誓死捍卫的副统帅其实是叛徒和卖国贼，那么他们在“文革”中斗争的意义何在呢？

许多被认为是思想单纯或头脑简单的人都会问一个最低限度的问题：这一回，毛主席大概会承认他挑接班人是挑错了。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公布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给江青的一封信，据说林彪早就被看出有问题。这个解释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既然早就知道林彪不是好人，为什么还要如此重用他？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太可怕了。如果是这样，那么

当初对红卫兵的支持和赞扬是不是也仅仅是一种利用呢?

继之而来的批判林彪集团的运动也有很大的副作用。人们知道了这帮人不过是口是心非,“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伪君子,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如林彪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坏蛋。人们得知林家为了替林立果物色妻子,竟在全国搞“选妃”活动。人们要问,这么一大批劣迹昭著的人,怎么会在党内居那么高的地位,那种发生在封建王朝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新中国,而且发生在“破旧立新”高潮的“文革”期间?据说,挖出了林彪反党集团,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不是早已由党章国法所肯定了吗?这些被人民视为神圣并为之战斗的准则,还有什么神圣性严肃性可言?

批判林彪集团最过硬的材料是据说由林立果及其死党制定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许多知识青年惊讶而惴惴不安地发现,这个反面材料中竟有一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比如其中说:“他们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这和红卫兵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的体验有一致之处，至于下面这些话，对他们则更是感同身受：“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许多前红卫兵认为，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彻底破产，有人由此想得更多，更远。

5. 思潮和书籍

当红卫兵一代人从盲信走向思索，从狂热变为理性时，其中许多人如饥似渴地寻找精神食粮，各种“异端”学说对他们的反思和探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异端，绝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的理论和观点，只不过和“文革”时期极端粗陋武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更为理性，因而在当时遭到排斥。许多红卫兵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当他们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曾遭到来自军宣队、工宣队等的压制和打击。有一个红卫兵在列车上看中国古典小说，被列车员和车上执勤军人没收，他们宣称，上级规定，能看的东西只有4种：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著作、鲁迅的书和《红楼

梦》。

首先引起学生注意的是“文革”中年轻一代自己阐发的思想。几乎每个地区都有红卫兵思想家和理论家，但具有全国范围持久影响的思潮公认有三种。第一种是遇罗克在《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阐发的反血统论观点，这批文章问世很早，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问题——家庭出身。作者在为“重在表现”政策作辩护时，捍卫了人的平等与尊严的权利。据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的前台人物牟志京回忆，回应这些文章的来信从全国各处涌来，每天多达几麻袋。其次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它的观点被宣布为“极左思潮”而受到批判，但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有很大影响，因为它把造反者的思想理论化、纲领化、极端化了。它宣称要“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最后是署名为“李一哲”的几个人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此文在批判林彪体系的名目下深刻揭示了“文革”时期法西斯专制的现实，文章主张，应该争取的目标不应是“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要实现写在宪法上面，但人民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文章作者之一李正天被公开批斗 100 场（允许答辩），此文和其他文章一起被当作反面教材广为印

发,因此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红卫兵的理论兴趣经历了学毛选、学列宁著作到学习马克思著作这样几个阶段. 到了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阶段,他们就感到有了批判和反思"文革"以及中国国情的理论武器。比如,马克思的以下这段话在当时是脍炙人口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7]。红卫兵从迷失中觉醒,最根本之处是从人性的失落到人性的复归,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马克思是肯定人性的!某些探索者进一步阅读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铁托传》,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传》、吉拉斯的《新阶级》,有人甚至读了"南共纲领"、"哥穆尔卡讲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等等。

当时广泛流传的还有一类是苏联当代小说,比如《第四十一个》、《雁南飞》、《娘子谷》、《白轮船》等等,这些书对中国青年有极大的魅力,它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但正如王蒙分析的,它们承认人性、人情,充满人道主义,它们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表

达人的诸如怀旧、失恋、温情、忧伤、孤独等等感情，而“文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人们增加对于人道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毒素的免疫力。

人们读《法国大革命史》，开始思索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从纳粹焚书到规定青少年下农村看到“文革”中法西斯主义的影子，从《杜鲁门回忆录》中了解到关于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得知，对于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

五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

文化大革命使当代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革”的大破坏使举国上下一致感到需要一个大建设。“文革”使中国在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政策有重大变化，本文仅从红卫兵这一代人所受“文革”影响这个角度探讨“文革”的后果。

不论怎么说，目前年龄正在40至50出头的这一批人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社会各类人群的联系比其他人密切，他们经历坎坷，能吃苦耐劳，勇于和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一代人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精神上的特点主要来自"文革"的经历和对"文革"的反省。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最活跃分子对"文革"的反思是艰苦认真的,但同时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直至"文革"以后,他们仍然生活在思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中国,还不存在认真探讨和总结"文革"经验的条件。

1. 去向:职业分布、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和思想的一般状况。

红卫兵从1968年秋开始退出"文革"的政治舞台。这一年的7月底,毛泽东派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据清华大学校园。此后,大学生分配工作,大多数人在部队农场生活一年,再走上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或无关的工作岗位,少数人直接参加工作,还有更少的一些人因为"文革"的问题受到审查。中学生从1968年底开始去农村、边疆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经过3年或更长的时间,由城市招工或因伤病、家庭困难等原因返回。

退出"文革"后,红卫兵中大学生和中学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大学生一般从1968年底就纳入国家干部队伍,有相对而言不算菲薄的薪金,有从事专业工作的希望和可能,有建立家庭的欲望,另外,运动后期的清查一般只对大学生而不对中学生,这

一切使他们迅速地彻底摆脱“文革”的政治心态，转入另一种生活。而中学生则留在社会底层，自觉或不自觉地更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条件成家立业，没有专业工作的吸引，没有吃到太多运动后期算账的苦头，因此，沿着“文革”中的思路，继续考虑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和热情比大学生强烈得多。

相比于社会条件正常时期而言，这一代红卫兵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是好一些或差一些，而是出现较大的分化。由于“文革”时期经济和社会秩序紊乱，加上受到卷入政治斗争的惩罚，大学生中一些人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得到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此失去进取心，得过且过地生活。而另一些人工作较为满意，或通过考研究生等途径回到城市和专业岗位，当秩序恢复之后，由于所在行政或技术部门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人获得了迅速升迁的机会，他们中好些人现在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中学生承受的动乱的苦难较多，许多人很晚才回城，或至今尚未回城，失去了学习、成家立业的大好时机，中学生总体而言在工作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低于正常条件下的情况较多。但是，少数人坚持自学或研究社会，当秩序恢复时，直接地或通过上大学或考研究生，填补了在科学技术、

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及高等教育领域的真空，获得了在正常竞争条件下不一定能得到的成就和地位。

由于“文革”前所受政治教育少于大学生，由于生活经历更坎坷，了解社会问题更深，中学生后来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强于大学生。他们之中后来学文科的人更多（自学较容易），当教师的比例相当大（我曾对某大城市某中学作过较完备统计，教师行业人数占到大约10%，即该校1966年时1200学生中有一百多人在大中学校工作），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环境气氛使他们和以前的大学生大不相同，他们的知识结构，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的了解，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态度，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代新人。由于同处一校，他们对后来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红卫兵这代人中，在行政职务上获得高位的不多，得到部级职位的屈指可数，当上局级或处级干部的多一些，这方面和正常条件下情况无多大差别。除了上面提到的在教育和文化部门任职的较多以外，另一特点是经商人数比例较大。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工作、生活状况不稳定，二是许多很有能量的人因“文革”后遗症而不能

在行政和科研岗位上发挥才能，市场经济的出现使这些人获得惟一的奋争机会。

一个前中学红卫兵头领在接受采访时总结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说掌握了权力，但可以说掌握了社会。"

2. 独立意识

各种人都认为，如果要说"文革"有什么积极后果的话，那就是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意识。一位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头领的话很有代表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国10亿人就只有一颗脑袋，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思维，其他的人只有服从。其结果是，毛泽东想对了，则全国的事都对；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革'后，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动脑筋想问题，不能以别人的思维代表自己的思维。"

"文革"的发动者曾经仅凭电台、报纸、杂志的宣传力量在全国掀起一阵阵风潮，驱使人们东闯西杀，如醉如狂，"文革"后宣传的作用大大减少了，人们习惯于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宣传工具发出的声音。

这一代人曾经狂热地投入政治运动，在运动中

伤害了他人，最终也伤害了自己，因此，他们对运动伤透了心，对任何再搞政治运动的作法和企图都持抵制态度。这一代人对于各种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也喜欢进行民间性的、没有政治背景的争论，但一旦有人企图使争论带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人们就会以冷淡和抵制的态度来对待。

如果说，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在"文革"前有服从权威的特性，那么在"文革"中已经经风雨、见世面，增强了自信，对大人物的敬畏感和神秘感消失了，领导，不论级别多高的领导，也无神圣性可言了。一个曾当过市革委常委的红卫兵头头说："以前当学生时，觉得党委办公室里的活动和会议很复杂、很神圣，自己当了官，而且是比较大的官之后，才发现这些事很简单。以前觉得领导凛然不可侵犯，'文革'后才发现他们也会点头哈腰，你有权力时他们也会讨好你。"另一个前红卫兵则说："我在'文革'中和省委书记平起平坐，现在对领导也不买账。"

如果说，"文革"前是整体主义笼罩一切，抹杀个性特征，抹消个人意识，那么"文革"后人们的个人意识普遍地增强了。"无私无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信条被抛弃了。上海著名的红卫兵头领安文江说："《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长期以来，强权专制

缺乏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更使人与人成了‘狼对狼的关系’。个体的人被剥夺了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余后的十年，我骄傲地说，我的确活得很青春，很洒脱。我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上帝！”[29]

3. 道德危机

“文革”不仅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政治信念，而且还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政治观念的改变使人从一元论和独断论中解放出来，从而具有一种良性效果，那么，道德观念的松动则具有相当复杂的含义。人们一方面摆脱了虚伪的、不合情理、不能持久的道德说教，一方面在抛弃旧道德时并未确立新道德，从而形成某种道德真空。目前，对于非道德化潮流，有两种十分对立的意见，分别作出正面和负面评价。具有讽刺性的是，红卫兵一代人内部关于道德和理想主义进行激烈的争论，而更年轻的一代认为他们整个地仍然过分道德化。

道德倾向的改变首先表现在从“驯服工具型”变为“无视规则型”。“文革”前对青年的训戒首先是绝对服从，作工具和螺丝钉，典型的提法是“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生交给党安排”，经历过“造反有理”精神

熏陶的一代在“文革”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就是不能盲从。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倒塌的神圣偶像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也有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他们认为任何规范都是虚伪和有害的，遵守规则成了迂腐和头脑僵化的表现。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如信守诺言、敬业、守纪律等等，都得不到实行。改变还表现在从“文革”前的道德至上主义变为道德虚无主义，以前用“红”压倒“专”，用“革命”压倒“业务”，自利被认为是罪过，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染”，人们必须改造一辈子；现在，雷锋之类的道德偶像被奚落，人们玩世不恭，充满世纪末的情调，不相信任何标准和规则。人们羞于和耻于谈论高尚、价值、意义等等，追求和探索成了可笑的事情。正如石文安（Anne F·Thurston）在总结“文革”后果时所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各种反应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②]

道德问题的一个方面是，“文革”从政治上锻炼了红卫兵，但也使不少人学会了政治斗争的手腕，练就了政客的头脑和意志。“文革”中，红卫兵学会了要取得利益或达到目的，就必须掌握权力。这一代人中某些人的权力欲，对于权利分配的敏感，肯定超

过了其他年龄层的人。他们还学会了：要掌权，就要先造舆论，争取群众；如果有竞争对手，就要设法孤立和打击；如果自己力量不够强大，就要结盟，设法分化瓦解对方的力量，等等。“文革”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政客，他们对权力感兴趣，有眼光，有斗争的意志和技巧，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好事。

人际关系中阶级和斗争的一面减弱了，人情温暖的一面加强了，但负面因素也是明显的。戈尔德(Thomas B . Gold)在题为《同志关系之后："文革"以来中国的人际关系》一文中，首先引证傅高义(E.F.Vogel)的一篇题为《从友情到同志关系：共产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的经典性文章，此文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际关系的标准和行为特征从中国传统的人情式转变成了同志式，戈尔德然后指出，“文革”中极左派领导以极端和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过了人性忍耐的限度，使以前的价值和典范失去信誉。“文革”使人什么也得不到，迫使人们去寻找非正常渠道。以前革命的、阶级的关系变成了重视私人关系，于是有现在的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等，这表明中国的人际关系又回到传统模式的趋势[①]。当然，这并非传统中“君子待人以诚”之类的积极的一面，而是相互利用的肤浅、庸俗的一面，这是与现代化取向背道而驰的。

4. 代际冲突

红卫兵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他们有一种特定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并从而使他们对于上一代和下一代产生强烈的异己感，这样，当代中国的代际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这和其他国度、其他历史时期在社会平稳发展时自然产生的代沟问题有所不同。

这里的分代标准是不精确的，一般把红卫兵这一代称为第三代，他们之上，即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受完教育的知识分子称为第二代，“文革”之后接受中等或初等教育的青年则是第四代。生活在同一制度和文化之中，各代人无疑有大量相同之处，这里谈代际差异显然是极而言之。

和其他每代人一样，第三代人也有自我中心倾向，只不过他们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强烈。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第二代人太保守、太传统，50年代和60年代的教条主义甚至奴化教育使他们既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批判精神。对第四代人，则认为他们太个人化和自由化，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缺少追求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第二、三代的冲突较为隐而不发，三、四代的矛盾则常见诸于言论和文字。

 作为第三代的杨帆说：“第四代人的生活，显然比第

三代人要轻松得多。他们的心理结构已发生变化，几乎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他们肩上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包袱，不去为国事烦恼；甚至对自己的事，他们也不去烦恼。"[31]凌巍则说："这一代的特点是非传统性和开放性倾向，有宽度但少深度，故易于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一触即发（尽管先学到的是表面的一层），适应性强。他们追求个人的价值，但往往物质化过强，理想色彩较淡。"[32]

相应地，第三代人在第二代和第四代人眼中也是印象不佳，第二代人常指责他们头长反骨、野心勃勃，做事不讲规则、不择手段，行为缺乏修养，文化学习上欠缺甚多。第四代人认为他们性格极其复杂，令人捉摸不透，他们说话直切、率直，经常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灵魂掏示于人，但仍能感到他们心中还深藏着一些东西。由于"文革"，他们的单纯心灵变成了政治板块，他们惟一的兴趣和志向就是政治，在投入政治斗争时，他们可以把友谊和亲情击得粉碎。他们留恋"文革"那叱咤风云的年代，希望那个时代留得更长久些。当新时代到来时，他们毫无准备，他们搭不上命运的列车，但又心犹不甘，他们拼命追赶，企图抓住一点什么[33]。

这一代人比其他人有更强的整体感，许多人由于有长期的共同经历（上学、"文革"、下乡）因而有相

同或相似的心态,使他们对同代人极易认同,并产生互相帮助、荣辱与共的心情。由于经历复杂和自感遭遇不公,他们表达自己的欲望十分强烈,由于"文革"的锻炼,他们很善于引起社会的关注,由于其中的佼佼者往往是通过自学成为文学艺术家以及受教育后成为文科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的声音在社会舆论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文革"之后直到今天仍然畅销或走红的小说、回忆录、电影、电视剧,199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展览"魂系黑土地",1991年春在成都举办的"青春无悔"引起轰动,证明了这一代人的社会影响力。

原载李辉编:《残缺的窗栏板》,海天出版社,1998年。

[注释]

① Julia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1967,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② Anita Cha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 - 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roary China, Vol.1, No.1, 1992, PP.73 - 74.

③ 据《中国百科年鉴》(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等,1965年高校在校生为67.4万,各类中学生1431.8万,小学生11620.9万,粗略估计大

中学生中 1/2 的人经常性地投入运动，小学生中有极少部分人在 1966 年和 1967 年升入中学并搭上红卫兵运动末班车。

④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P.79—80。

⑤ Lucian Pye, "Hostility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V11, 3, 1968, P.10.

⑥ 参见《辞海·政治法律手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8 年版，P.5，以及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P.13。

⑦ 载于《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4 期，P.14。

⑧ John Isrel, "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30, 1967, P.5.

⑨ 赵淮海：《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中国之春》1985 年 11 月份，P.81。

⑩ 王朔：《我是王朔》，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年版，P.7。

⑪ Livio Maitan,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NLB, 1976, P.359.

⑫ 同⑧，P.2。

⑬ 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相应地，"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⑭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P.3—5。

⑮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Conflict in Gu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83.1980, P.397.

⑯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 Zhou,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P.147.

⑰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5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P.129。

⑱ 燕帆：《大串连》，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P.72。

⑲ 林·怀特：《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P.3。

⑳ 凌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代人》，《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P.54。

㉑ Byung-joon Ah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P.227.

㉒ 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58, 1974, PP.255—256.

㉓ 梁粱(执笔)：《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P.7。

㉔ Parris Chang, "Mao's Great Pur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V111, 2, 1969, P.10.

㉕ 胡平：《血祭红土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P.10。

㉖ 蓝石：《红色大疯狂》，《作家报》1993年6月26日。

㉗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9。

㉘ 安文江:《我不忏悔》,《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集,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6年版,P.334、333。

㉙ Anne F.Thurston, "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 Pacific Affairs, Vol.57, No.4, 1984, P.605.

㉚ Thomas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4, 1985, PP.657—668.

㉛ 杨帆:《共和国的第三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P.144—145。

㉜ 同㉑,P.52。

㉝ 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P.94—107。

“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

虽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那些在1966年8月“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实行“红色恐怖”的狂热而无知的年轻人，但他们是“文革”政治舞台上最重要、最活跃的力量。红卫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成许多派别和组织。他们的立场、观点、斗争方向的不同，在相互间的派别斗争中清楚地显现出来。红卫兵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虽然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决非无章可循。正相反，他们的派别对立呈现了高度的规律性。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可以把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和派别斗争情况概括如下。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从这时或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

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干预之后，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

以上所言均为历史事实，但中外“文革”研究者却没有全面的把握，有些人把红卫兵当成单一的组织，有些人论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甚为精当，而谈及造反派中两派对立却语焉不详。本文目的是弥补后一方面空缺，在我看来，造反派内部两派的对立不但延续时间长，而且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因而意义重大。

一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我们先来看看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罗森（Stanley 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等人在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对于红卫兵派别斗争的研究，我将这些研究作为本文的出发点。后来的研究，不论中西，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未达

到这四人当年的水平。

李鸿永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文革”中造反派[1]和保守派的基本区别是对谁是运动的主要对象认识不同，造反派攻击党组织，保守派把领导人和党组织区分开，造反派强调打“走资派”，而保守派的兴趣在“牛鬼蛇神”，即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残余分子。两派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虽然双方都拥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对于如何定义阶级看法各异。保守派遵循以经济为基础的经典定义，力图将打击对象局限于旧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等。而造反派强调政治立场和态度，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当成首要打击对象。双方还在血统论问题上形成对立，一派支持，另一派反对“自来红”的说法。就社会特征而言，保守派由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组成，而造反派多为出身不好的人。[2]就政治上的结盟关系而言，保守派和军队站在一边，而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站在一边。从行为上说，保守派对“教育革命”热情投入，而造反派不感兴趣。造反派热衷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平反，这一点恰恰是保守派的痛处，他们避之惟恐不及。与此相关是17年和50天的争论，造反派力图把平反的范围扩大到17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而保守派最

多承认运动初期50天整错了人，他们声称，为“文革”前受整的人平反是“右派翻天”。此外，造反派不像保守派那样积极响应当局号召，实行大联合，因为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关心掌权问题，而保守派对于掌权不特别热衷，因为他们和军队一致，军队会保护他们的利益。[③]

李鸿永在发表于1978年的著作《中国“文革”的政治：一个个案研究》中发展和深化了他的前述观点。他说，此书的主要论点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主要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而保守分子主要来自优裕的社会集团。造反派力图最大限度地改变现存状况，而保守派竭力维护现状。他还说，造反派出自现行体制中受压集团，学生则出自成份不好的家庭和理应上山下乡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直接反对现体制的，保守派之所以保守，是由于“文革”前生活过得好。[④]

对于此书，我想提三点简短批评。第一，作者在第四章中论述了1966年北京造反的“三司”和保守的“一司”、“二司”以及“联动”的对立与斗争，在第七章中论述了1967年北京造反派中天派和地派的矛盾斗争，但他居然未总结出红卫兵的派别划分先后有两种，在结论部分只谈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区别，这是一大疏忽；第二，他认为造反派主要由家庭出身不

好的学生组成，他们反对党组织，他们和保守派的斗争是改变还是捍卫现存制度的斗争，这是错误的；第三，他认为“军队内部有各种矛盾，但大致是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文革’，有两个因素把军队领导团结起来，一是要保持团结，二是要维护法律和秩序”[5]，这是错误的。如果他了解自 1967 年夏天全国范围内造反派之间的战争，他就不会这么说了，在这些内战中，每一派都得到不同部队的支持。

罗森针对李鸿永 1975 年的论文展开论战，我认为，他的贡献有以下四点。(一)他指出，李鸿永研究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区别，但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李鸿永认为广东 1967 年的 1 月夺权把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保守派反对夺权，造反派支持夺权，罗森指出这是不对的。他正确地看到，在 1 月夺权中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因为那时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已经瓦解，谈不上他们参与夺权；(二)他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在广州的中学中，最先起来造反的是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他们憎恨学校的清规戒律，反学校党支部、工作组，后来还反省委；(三)他纠正李关于造反派多为出身不好的学生这种说法，指出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构成造反派的主力，通常情况下，出身不好的学生不敢参与红卫兵活动，别人也不太欢迎他们；(四)他观察到，在中学中家庭出身是派别

组成的关键因素，而在大学中出身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形成派别通常是针对学校领导问题。[6]

遗憾的是，罗森虽然提到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更重要，但并未发现这种分裂的规律性，也未作进一步研究。他认为某些组织在这一问题上保守而在另一问题上造反，在本校保守而在社会上造反，有时造反的学生和保守的非学生组织结成联盟。[7]他这里说的情况固然存在，但却是少数例外。一般而言，派别对立还是阵线分明的。

李鸿永对罗森批评的答复表明他仍然不了解造反派内部的对立。他把造反派之间，例如北京天地派之间的对立和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例如广东东风派和红旗派，广西"联指"和"四·二二"派之间的对立混为一谈。此外，他认为造反派的分歧只是在处境不利时发生的斗争策略分歧。[8]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的冲突》[9]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上。他们把派别对立归因于家庭的"阶级"对立，并把矛盾追溯到"文革"之前。罗森在1982年出版的专著《红卫兵的派别和广州的"文革"》详尽分析了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其中记载了不少造反派内部分歧的情况，但他最后还是把这种分歧淹没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对立的议论之中。

上述学者一直未能重视造反派内部的对立，并非出自偏见，或观察与分析的粗疏。就他们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采访或收集材料之丰富、全面，观察之深入细微，是令人吃惊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广东省，而该省的“文革”运动恰恰具有特殊性！

他们的局限有着某种必然性。在当时，从外部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只能以香港为基地进行观察，他们透过一个狭窄的窗口，只能看到广东的情况。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心腹、宠将，他一直压制造反派，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黄极为不满，但始终未能扳倒他。黄全力支持保守派，因此，在广东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不能发展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种研究范围的局限对于西方学者是难于摆脱的。福斯特(Keith Forster)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至1976》中宣称，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它代表了例外而非规律。[10]他在本书中说，本质上把保守派和造反派区分开的是对干部的评价，这个问题在全国把两派红卫兵分开了。[11]然而，他的结论还不如上面四位学者的研究本质，他也不幸碰到一点特殊情况：浙江造反组织“红

暴”听了周恩来的劝告保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保守派，后来被毛泽东定为“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这在全国是极个别的情况。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二 全国情况和三省典型分析

在全国29个运动单位中，只有广东、广西、江西、新疆、内蒙、西藏6个单位始终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为主，另有天津、宁夏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两种斗争同时交替进行，难分主次，其余大致符合我在开头提出的派别斗争模式，出现少数例外的原因主要是当地军区负责人压制造反派，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未被中央解职（例如广西的韦国清是抗美援越关键人物，胡志明亲自保他，对中共领导人说："你们不要他，让他到越南来。"），或者虽然新任军区司令员奉中央之命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得到军队和党的各级干部大力支持，因而这一地区保守派始终不垮，造反派内部矛盾得不到充分暴露，派别对立只表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

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比如在北京，大学红卫兵中保守的"一司"、"二司"在1966年底即销声匿迹，

造反派中天派和地派的斗争在 1967 年 4 月发展得非常明显。中学生中保守的“联动”在 1967 年 1 月被造反派和公安部的联手攻击彻底打垮，造反派内部在 4 月初形成公开对立的“四·三”和“四·四”两派。

在外省，和与保守派的对立一样，造反派中两派往往都结成了包括红卫兵、工人、干部、农民和其他人的大派，对立和武斗发生在两大派之间。比如山东的“四·二二”派和“四·二八”派，山西的“红总站”和“红联站”，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造总”，河北的“大联指”和“狂人公社”，浙江的“省联总”和“红暴”，湖南的“长沙高司”与“湘江风雷”及“省无联”，安徽的好派和屁派，陕西的“工联”和“工总司”，云南的“八·二三”派和“炮兵团”派，等等。在福建，两种派别斗争在后期混合存在，在福州，造反的“八·二九”派和保守的“革造”派对立，在厦门，“八·二九”派内的两派“促联”和“革联”斗争。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四川、广东、湖北三省情况，四川以首府成都为例，在另一大城市重庆，派别斗争情况与成都一样，是较温和的造反派“八·一五”和较激进的造反派“反到底”对立，他们与成都相应派别结盟。

成都市原有统一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

成都部队""红成",由成都十来所大学中早期造反的少数派组成。1966年11月13日,在批判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上,"红成"的一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八·二六")造了大会的反,理由是批判大会起到了包庇"走资派"的作用。由此,统一的造反派红卫兵一分二,一为"红成",一为"八·二六"。

1967年2月,"八·二六"派因在成都军区静坐示威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红成"置身事外。军区表示,"八·二六"是反动组织,曾经垮台,在"镇反"中复活的保守组织是左派,对"红成"则采取教育,团结方针。北京的"文革"派发起反击"二月逆流"战斗后,成都军区改变态度,在4月份封"红成"为左派。5月初,两派共同战斗,和保守派展开大武斗,将保守派彻底打败。5月7日,中央下达解决四川问题决定,宣布"红成"和"八·二六"均为革命组织,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均从外地调人担任。

事实上,中央"文革"认为"八·二六"是坚定的左派,将"红成"置于被团结的地位。由于驻川部队五十四军坚决支持重庆的"八·一五"派,中央急调五十军入川支左,口头上,"一碗水端平",实际上较为偏向"八·二六"。从1967年夏天开始,两派大武斗。1968年3月15日,中央表态,"红成"派因提出打

倒中央“文革”扶植起来的干部，李井泉打击过的刘结挺、张西挺而犯了“右倾翻案”错误，五十四军因支持“红成”也受到批评。“红成”政治上受到打击，被迫按“八·二六”派条件实现大联合，两派以同等名额进入四川省和成都市革委会。“红成”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八·二六”派一度得势，直到后来对造反派一律整肃。

四川的派别斗争模式有代表性，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一)一派在意识形态上温和，一派激进；(二)一派曾围攻过军区，并因而遭镇压，一派没有；(三)一派更为亲近中央“文革”，一派与当地军队实力派结盟；(四)两派均进入权力机构，虽然地位并不完全相等，当然，最后两派均遭清洗。

广东的特殊性在于，曾在1967年“三月黑风”中镇压过造反派的广州军区虽然受到中央批评，并做过检讨，但并未被改组，负责人也未被更换。他们一方面对中央表面应付，一方面暂时改变对群众组织的态度，但实际上大力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周恩来曾在1967年4月代表中央，在广州讲话，宣布“红旗”派为坚定的革命派，“东风”派是保守派，但“东风”派在军区支持下，一直未垮台。后来，毛泽东把稳定大局放在首位，无力坚持把“路线斗争”搞到底，于是造反的“红旗”派和保守的“东风”派在

1967年7月达成大联合协议。

但是，广东的造反派分裂其实是很严重的。他们很早就有温和与激进的差别（如对待工作组、批"资反路线"），最厉害的分裂是1967年1月夺权时，一派人坚决要夺权，一派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未实现革命大联合而反对。广州军区因围攻、冲击军区而对夺权一派中的有些人实行镇压、逮捕，与四川一样，未受镇压的一派后来对于平反不积极。在1967年8月中旬，造反派中若干激进的组织成立"红联"，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建立搞武斗的"红警司"，此举遭到温和派别的指责。在8月份，"红旗"派中一些人提出了十分激进的"八·五思潮"。实现大联合后，造反派各组织负责人在佛山开会，作出观点十分温和的"佛山会议纪要"，它遭到了激进派的严厉批评。在这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造反派内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论战成了运动的主流。

最后看看湖北省，由于"七·二〇事件"，人人都知道湖北的保守派"百万雄师"，以及对抗中央"文革"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人们由此形成强烈印象，以为湖北地区是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的典型。实际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虽然不那么戏剧性，延续的时间却长得多。在1966年底，造反派红卫兵就打垮了保守的"大专兵"、"三字兵"，并得到省委承认。

在 1967 年 1 月夺权时，造反派发生分裂。掌权的激进派与北京、哈尔滨红卫兵一道，2 月 8 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阐述自己对"文革"运动观点，攻击对立派。引起武汉全市关于"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大辩论，两大派阵线从此分明。接着，武汉军区发表声明，谴责"二·八声明"，并以个人政治历史问题为借口抓了激进派一些头头。"七·二〇事件"之后，保守派彻底瓦解，造反派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主要问题。和其他省份一样，两派在 1967 年夏展开武斗，中央和新武汉军区大力调解双方矛盾，一直无效。直至接近年底，由上面强行分配名额，两派才联合起来，组成"红代会"、"工代会"、"进入革委会"。武汉学生中的"北决扬"（独立研究"文



北京的红卫兵在街头宣传

革"理论的三个小组"北斗星学社""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扬子江评论")发表一系列激进言论，支持和赞同的人都是激进的造反派。

以上分析证明，在通常情况下，红卫兵的派别对立是，首先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保守派失败后，造反派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严重对立，大武斗发生在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长久不能解决。

三　意识形态的对立

造反派内部意识形态对立十分明显，研究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保守派一般来说具有御林军性质，提不出自己的政见。造反派的观点仍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出发点，但包含了许多对于"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独立探索，正是这种独立探索精神使红卫兵一代人从狂热和盲信走上了离弃和否定"文革"的道路。

造反派红卫兵在运动后期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兴趣，各地涌现了许多有独到见解，有影响的理论文章，比如宣扬激进观点的有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广西"四·二二"派红卫兵的《今日的"哥达纲领"》，北京中学"四·三"派红卫

兵的宣言《论新思潮》,上海“中串会”的《一切为了九大》,温和观点的代表作是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下面,两种思潮文章各引一篇,以作例证。

《四·一四思潮必胜》完成于1967年8月9日,论战性很强,它批驳了激进派的下列主张:“文革”要引起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并导致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作者强调,“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国家当权的是无产阶级。“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17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17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17年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32]文章主张,“文革”中对于国家政权的改变只能是局部的,决不能是彻底的。

针对“七·二〇事件”之后全国出现的“揪军

内一小撮”的激进主张，文章明确表示了一种相反的立场，文章认为，建国17年来革命军事路线在军内占统治地位，激进派提出，“军内走资派”可能在全国发动武装暴乱，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冲击军区，主张坚决砸烂军区，彻底夺权是错误的。文章也承认很多军区在“文革”中犯了镇压造反派的错误，但又不无欣慰地指出，军队首先整的是激进派，然后才是温和派，而有些军区还因为温和派的阶级成份较好而支持他们。

激进思潮的代表作是《中国向何处去？》，完成于1968年1月6日。文章认为，要进行“文革”就必须重新评价“文革”前的17年，要对“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击敌人。”[13]文章的分析是，17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由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形成的独特的阶级，这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知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为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合同工、临时工、下乡知青和其他地位

低下的劳动者是“文革”的动力。文章声言，“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施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

关于军队，文章说，“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个现实之外。”“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一致”，因此，文章认为“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的状况。”

文章号召造反派用枪杆子彻底改造社会，从“红色资本家”手中夺权，“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虽然谈到这一问题的背景是1967年夏天的大武斗，但文章的激进立场还是暴露无遗。

此文的观点是如此激进，不但官方和保守派批它，温和的造反派批它，连激进造反派都感到需要表示与它划清界限，虽然它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造反派独立提出的主张和理论，不论它们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都被当局宣判为反动思潮，各篇文章的作者都遭到逮捕。这说明，虽然这些思潮是对立的，其大前提是“文革”的理论，但只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要被视为异端。这对于“文革”中标榜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鼓励“敢想、敢说、敢干”，不啻是一个讽刺。

四 两派的一系列对立

造反派内部两派的对立往往表现为权力之争，或对当地某个负责人的态度(一派要打倒，另一派要解放)，但若对全国的派别斗争作综合性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派之间确实存在一系列原则分歧。当然，这些分歧并不充分，全部表现在每一地区的派别对立中。而且，由于派性斗争异常复杂，这些分歧有时会产生错位，例如某个公认的温和派在某个问题上主张激进的观点。下面是对两派原则性分歧的概括。

第一，在对待组织成员的成份和出身问题上态度有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不像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拥护还是反对血统论的区别那么大，而是微妙地表

现出来。温和派比激进派更注重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即看人的家庭出身，他们队伍中吸收原保守派多一些(很可能是前保守派更乐意参加温和的造反派而不是激进的造反派)，即出身好的人或干部子女多一些。他们的工人、农民、干部组织盟友的成份更“纯”一些，他们在与对立派斗争时，会攻击对方“组织成份复杂”，而激进派更欣赏受“走资派”压制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人。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保守派红卫兵被击垮之后，其成员一般宁愿归依温和派。《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自夸温和派成份好，只有他们才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而《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则认为以前受压的人革命心强。在四川，“红成”派一直攻击对方某些工人组织成份不纯，在湖北，温和派“工造”从“工总”中分裂出来，原因是害怕后者队伍“不纯”，头头有政治历史问题而牵连自己。

第二，斗争“走资派”的坚决程度不同。一般而言，温和派支持“十六条”中对于干部的估计，即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坏的只是一小撮，而激进派强调“‘走资派’还在顽抗对抗、不能对他们抱幻想，持温情主义”。在四川，“红成”与省委、市委合开批判李井泉大会，而“八·二六”认为这是妥协投降，给了“走资派”登台亮相，欺骗

群众的机会，他们造了大会的反。在浙江，“红暴”听信周恩来的话，公开保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对立派和中央“文革”小组攻击为“老保”。过了一年，当他们再次听周恩来说毛泽东不想打倒江华后，马上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在广东，早在1966年10月，造反派就在批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分歧，一派主张穷追猛打，一派主张适可而止。《中国向何处去?》宣称：“我们确实认为百分之九十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与此相应，两派对于保守派的态度也有差别。温和派强调“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而激进派的口号往往是“誓与××血战到底，××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第三，与军队的关系不同。温和派恪守中央关于不得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的决定，在1967年初不参与围攻当地军区的事件，而激进派在各处都有静坐示威、围攻、冲击行动，并因此受到军队镇压。由于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温和派也常常提到“军内走资派”，但他们不像激进派那么热衷于“揪军内一小撮”，也不像激进派那样强调“军内走资派要搞武装政变”的危险迫在眉睫。另外，温和派一般与当地有保守倾向的地方军区关系较好。而激进派

得到的军方支持往往来自受中央直接指挥的野战军。

第四，所谓的左倾和右倾。在全国各地，两派对于对方的批判和攻击是惊人的一致。温和派攻击激进派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极左”，“左倾分裂主义”；激进派攻击温和派“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他们中有人提出“倾左利于民，倾右利于敌”。广州造反派内的激进派别攻击“红旗”派中占主流的“右倾投降”路线时说：“老实说，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至今还不曾有过什么左！还左得不够，我们的口号是向左！向左！向左！”

左倾思潮最明显的表现是鼓吹形势越乱越好，只有乱透了才会最后好起来，并主张造反派队伍应该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湖北，激进派的“二·八声明”宣称“湖北省武汉地区还没有乱透，还没有大乱”，“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在四川，“八·二六”与“红成”分裂时宣传四川还必须大乱，“革命者之所以是革命的，就是他们……迎接这‘乱’的早日到来。”温和派则攻击他们“破坏革命队伍团结”，“干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第五，对待所谓“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态

度。在“文革”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央会规定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发出一些具体的号召，要求群众组织切实遵照执行。比如1966年10月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底要求造反派整风，回校参加军政训练，1967年1月颁布“军委八条”，要求造反派克制自己，以保持军队稳定，1967年8月下旬掀起拥军爱民活动(目的是“粉碎反军乱军逆流”)，批判“五·一六”的“形左实右”，以及执行1967年“九·五”命令，1968年“七·三”“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严禁冲击军队、抢劫军用物资)；等等，温和派对这些部署步步紧跟，而激进派往往只提口号，自行其是。温和派一般认为“中央叫干啥就干啥”是衡量革命左派的标准，而激进派认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将‘文革’进行到底”才是至高无上的任务。

第六，对于判别“革命干部”的标准有差异。激进派强调干部在“文革”初期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的表现，这段时期受工作组打击迫害最厉害的人是最革命的，这段时期参与整人的是反动的。而温和派认为，除了看50天内的表现，“文革”前17年的表现仍然十分重要。“文革”前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不能因为运动初

期执行了"资反路线"而被一棍子打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激进派认为50天的问题集中反映了17年的问题，17年是"刘邓反动路线专政"，而温和派相当肯定17年，认为17年是"正确路线居主导地位"。

大致可以这么说，作为造反派，两派都支持"文革"，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倒刘少奇。但激进派对于中国"变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得比温和派严重，对于改变当时的党、政、军体制的决心，对于消除官民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的幅度比温和派大，总之，他们是更急切的，力图更彻底地改变现状。

原载赵宝煦主编:《中国研究》1996年第2期

[注解]

① 上述四位学者在70年代把造反派称为"激进派"(radicals)，为行文统一和避免与我所称的造反派内激进派（有时又称为极左派）混淆，引证时一律改为"造反派"。

② 李鸿永的原话是:"造反派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居多"，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说法。

③ Lee Hong Yung,《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64, 1975, PP.645—683.

④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p.5& p.340.

⑤ 同上书,第336页。

⑥ S.Rosen,《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70,1977,pp.390—397.

⑦ 同上,第390页。

⑧ 同上,第400页和405页。

⑨ The China Quarterly,no,83,1980,pp.397—446.

⑩ Keith Forster,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1966—1967,M.E.Sharpe,Inc.,Armonk,1990,p.1.

⑪ 同上书,第7页。

⑫ 引自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1967年8月26日,第11版。

⑬ 所引原文载于《民主中华》,香港远东事务评论社出版,1989年,第31—50页,下同。

参考文本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有人说过:"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现在也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在国外。"这话固然令人不快,但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自"文革"爆发至今近三十年,西方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等方面写出了大量专著和论文,虽然其中有的给人隔靴搔痒之感,还有一些议论读后令人忍俊不禁,但其中仍有不少包含着真知灼见。尤其是西方学者看问题角度之广,思维之活跃,搜集求证功夫之深,争辩诘驳态度之严肃和执着,再看国内一些错误百出的叙述(如《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东抄西编的杂凑(如《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真使人感慨叹息。

国内不是没有谈论"文革"的书籍和文章,但问

题在于很少作品算得上是研究。若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称得上研究的东西就更是寥寥无几。国内最有影响的著作大概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史》,但西方学术界对它评论却不太高。切克(Timothy Cheek) 在一篇书评中以不甚欣赏的口气说，这部著作由三篇构成，第一篇谈毛泽东，第二篇谈林彪，第三篇谈江青，作者完全以中国传统的好人——坏人二分法对政治史作解释。书评者还指出，该书对于“文革”提供的材料，并没有超出西方学者掌握的水平，而书中不标注释说明材料出处，不列文献目录和索引，使此书具有通俗性而不是学术性。书评者的客气之辞是，在课堂上讲授中国“文革”时，此书可以起讲述生动，增加例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增补本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后，台湾潮流出版公司发行了英文译本，上述书评者认为这个英文本译得匆忙潦草，西方研究者若不对照中文原书，是不能放心使用的[①]。

一 概况

1966年初夏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当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

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开始讨论“文革”问题。《共产主义问题》从当年第5期，即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主义是什么?”(What is Maoism?)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毛及其学说》(《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另一名专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论文题为《毛及其政治学》(《The Man and His Policies》)，另外还有与会者发表的评论，以及两位作者的答辩。

接着，从第6期起，《共产主义问题》开展了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一直延续到下一年。以下是一些论文的题目，格尔曼(Harry Gelman):《毛和不停息的清洗》(《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陈(Theodore Hsi – en Chen):《痛苦中的民族》(《A Nation in Agony》)，特里尔(Ross Terrill):《围困心理》(《The Siege Mentality》)，迈克尔(Franz Michael):《权力之争》(《The Struggle of Power》)，等等。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成员和顾问在1966年夏季末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的由罗宾逊(Thomas 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可算作他们的第一项研究成果。此书对“文革”的分析只到1968年初，包含5篇

长论文。第一篇多里尔(W.F.Dorill)谈"文革"是权力之争、政策和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第二篇哈定(H.Harding)谈毛泽东的政策和组织理论，第三篇罗宾逊谈周恩来，第四篇戈托夫(M.Gurtov)谈中国的外交，最后一篇是巴姆(R.Baum)谈中国农村[②]。

西方研究者一开始就注重追踪运动的发展，在令人眼花缭乱和目瞪口呆的各种事件中理出头绪，并理解和揭示其含义。应该说，他们的工作颇为出色。也许是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事后看来，他们的看法比起我们当时深深卷入"文革"的人，要正确得多。这种跟踪研究的形式和成果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伯雷汉(Philip Bridgham)在1967—1970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在各省》(《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总结了黑龙江、上海、四川等省市运动的发展[③]，而另一本书《1967年"文革"总结》(《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则从工人、农民、学生、外交、

贸易等各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年的"文革"形势[4]。

这种把握时局发展和作出概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较新的著作有福斯特（Keith Forster）于1992年出版《在中国一个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5]，作者是澳大利亚人，曾在杭州大学当英语教师。他数次来华，在杭州停留较久，阅读了大量报刊、文件，采访了当地不少"文革"参与者。1991年由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编出版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5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Revolution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则是一部全面论述"文革"的巨著[6]。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在一篇书评中把西方对"文革"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的浪潮，并取得丰富成果。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和出版的各种小报，研究的焦点是导致"文

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时研究者的注意力放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和冲突，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1968—1976年。"文革"中不少人从大陆逃至香港，研究者勤奋地采访难民，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之后到现在，西方研究者更深刻地探究"文革"的原因和后果，由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他们可能获得更丰富、更可靠的资料，因而把对于"文革"的研究深化了[7]。

西方学者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研究"文革"时，由于不能身临其境，又得不到第一手材料，不少人的见解显得幼稚和天真。比如，徐(F.L.K.Hsü)全然不顾运动初期红卫兵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认为红卫兵是攻击以血缘关系为内涵的传统遗产的工具。他的推理完全是一厢情愿和先验的，他认为中国的任何执政党的目标都是使国家工业化，而中国人只要还受传统的血缘关系的羁绊，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只有懂得红卫兵运动是以冲破血缘关系为目的，才可理解这一运动[8]。到了80年代，西方学者可以亲自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他们得到许多新信息，同时还受到中国人自己观点的启发，因此形成新的看法和结论。白鲁恂（Lucian

W.Pye)反思说,西方一些自由派人士在"文革"发动时抱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的最大失误是不承认"文革"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对于人们备受迫害的报告充耳不闻。对于西方的研究成绩,他的评价是,对"文革"的直接起因研究较好，对于根本原因，即使"文革"成为可能的深层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这方面的研究则不行[9]。施拉姆已是公认的权威,但他还是十分重视从最新信息中形成新见解。他在80年代中访问中国时,从知情人士处得到一条信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反冒进的文章,其实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的,毛泽东从未忘记这一点,这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施拉姆力图根据这样的消息,重新考虑"文革"中毛、刘、周之间的关系和权力斗争格局[10]。

二 "文革"的起因

显而易见,对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作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了解它的起因。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问题基本上集中于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回答当然是五花八门的，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

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的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说来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学者接受了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的说法。陈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11]。哈定则认为反修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12]。依斯美(Jean 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13]。富勒尔(Victor C. 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14]。胡费尔(Richard M. 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革命的继续，“可以把

‘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15]。

另一批人则从权力斗争角度看待“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 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断言[16]：

>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不仅如此，他还要通过运动在党内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可能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17]。伯雷汉声称：“毛发

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消灭党和政府中的敌人，代之以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 他还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18]。

关于"文革"起因，持第三种解释的人最多，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位杜特（Garg Dutt & V.P.Dutt）在《中国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对于采取什么办法肯定会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发展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19]。杨（C.K.Yang）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本来关乎文化和意识形态，怎么变成了夺权斗争？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修正主义，于是清洗从文化领域扩展到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模式必然如此[20]。约菲（Ellis Joffe）在《"文革"还是权力斗争？》（《China in Mid－196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

出，这场运动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问题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一直担心，除非不断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烧，否则中国就会变修[21]。赫尼克尔(Paul J.Hiniker)提出了他所谓的“不合谐归化”理论来调合权力之争说和意识形态之争说。他的这个概念颇为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失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不坚信它的人认为它不切实际，而坚信它的人则认为有阶级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搞破坏。他承认“文革”有权力斗争，但认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服从于达到意识形态一致的手段。他宣称，他的理论可以对毛泽东要打倒谁作出更好的预言[22]。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属于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也有人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归之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的差异，以及由于革命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风。安边戎(Byung - joon Ahn)认为，毛的领导方式是个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而刘善于组织，在

党内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这两种十分不同的作风最终会发生碰撞，演化为权力冲突[23]。迪特默持类似见解，他说，毛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一丝不苟，谨小慎微；毛的性格适合在广大农村动员群众打游击战，而刘的作风与白区工作需要极端小心有关[24]。

附带指出，迪特默在《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一书和《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路线斗争"，即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见而无法调和导致的斗争。作为西方学者，他对是非功过不作价值判断。他强调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起因于路线、政策分歧，而不是预先有一个"密谋"，蓄意打倒刘，而刘的倒台是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25]。不知为什么，大陆中文译本《刘少奇》一书的出版者和译者却未能正确理解迪特默的观点。中译本"内容简介"说："作品用大量的资料说明：发动'文革'是一个'密谋'，其目的就是为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而设下的陷阱。"这可能是对共和国主席悲惨遭遇的同情而产生的理解误差。我认为出版者和译者对事情本身的理解是对的，但迪特

默的原意却并非如此。

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喜好从文化与传统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对待“文革”，他同样如此。史华慈认为，在老年毛泽东那里，中国古代贤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分量。他不像刘少奇和列宁，事事依靠作为先锋队的党，而认为党之外的普通群众不通过组织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毛和卢梭一样，认为群众不必是他们本身所是的人，而可以是“应当成为”的那种人，这就导致了领导用自己的光辉思想来改变人性[25]。

里夫顿(Robert J.Lifton)的观点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他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而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和死亡后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分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语言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26]。

三 派别划分和社会冲突

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模式称为“社会冲突模式”。陈佩华(Anita Chan)一直鼓吹这个模式，她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把“文革”说成是一场以老干部为一方，以毛和“四人帮”为一方的权力斗争，根本就抹杀了人民，尤其是红卫兵青少年在“文革”中的作用。“社会冲突模式”与通常的看法(即认为群众在“文革”中没有差别)相反，注意到群众在运动中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即保守派和造反派。这种对立，反映“文革”前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矛盾[29]。

韩裔美籍学者李鸿永(Hong Yung Lee)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文革”“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发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激进派和造反派的分化。基本区别是对运动对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另一派攻击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支持“自来红”观点；激进派根据是否拥护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分阵线，反对血统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李鸿永注意到，由家庭出身而产生的歧视在中国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出身不好的人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而同样的事若发生在出身好的人身上，则只是方法问题、枝节问题。他还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工人的派别划分所起的作用较大，一般而言，地位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辅助工、徒工、半工半读中学生、小厂工人等构成了激进派的主力。在激进派中，下乡知识青年是最活跃的力量[②]。

李鸿永在1978年的著作中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团企图动员和操纵群众，但党组织的控制一旦削弱，社会中所有潜伏的张力和矛盾就表面化了，群众运动依靠自身的力量前进。群众组织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当成追求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合则拥护，不合则抛弃。他看到中国社会产生了官僚化这个严重问题，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了，对平等的要求淡漠了。他还总结说，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而保守分子主要来自优裕的社会集团[③]。罗森(Stanley Rosen)对李鸿永1975年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学生中的造反派(李鸿永称为激进派)，主要是由家庭出身一般而不是出身不好的人构成的，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人长期受压，不

敢参加政治运动，而且即使是造反派组织也有些排斥他们。另外，大学生的派别形成不像中学生那样以家庭出身为重要因素，因为他们在升入大学时已经通过了竞争[①]。

陈佩华、罗森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以“社会冲突论”为指导方针，对原广州的红卫兵作了大量采访，发表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论著。他们在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中认为，学生的冲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不宽阔；二、由于入学标准的变化(从重视成绩到重视家庭出身，以及强调政治表现)，学生为升大学展开了剧烈竞争；三、许多学生的竞争手段是争取入团；四、政治上的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②]。在这篇论文之后，三人分别发表专著，详尽发挥以上论点。罗森于1982年发表《广州红卫兵派性和“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在广州红卫兵派别划分和学生家庭出身方面建立联系。安德佳于同年发表《毛统治下的教育：1960—1980年广州学校中的阶级和竞争》(《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阐述"文革"前的家庭出身歧视，学校中"红"与"专"的矛盾，以及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转化为"革"与"保"的对立。陈佩华于1985年发表了《毛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人格发展和政治积极性》(《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ly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从学校教育和家庭出身的角度，论述了红卫兵一代人的主要社会性格是权威人格。知识青年在"文革"中有格外引人注目的表现，他们的态度异常激进，他们是"文革"前选拔制度的失败者，他们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社会尖锐的矛盾。罗森于1981年发表了《下乡知青在中国"文革"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阐述知青与派性斗争的关系以及他们的重要性。

怀特(Gordon White)在其著作《阶级政治和阶级根源》(《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指出，虽然家庭出身在"文革"前决定人的政治地位，且在"文革"中决定人的派性，但阶级或成分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文革"也未能解决这方面问题。另一位怀特(Lynn T. White)在《紊乱政治学：中国"文革"中暴力的组织性原因》(《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

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认为,“文革”中的混乱、暴力是由反映中国社会矛盾的三种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们是:给人戴帽子(工人、干部、地主、反革命等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使人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在每个单位,群众与领导是人身依附关系;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夏(Adrian Hsia)的著作《中国的“文革”》(《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专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这一角度研究“文革”。他考察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如学生与学校、政府的矛盾,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矛盾,工农与政府的矛盾,党内新老干部的矛盾,等等。官僚化和特权阶层的存在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哈定在《组织中国:1949—1976年的官僚问题》(《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一书中,从组织政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官僚化原因。他认为,官僚化问题对于中国是难于解决的问题,因为要想现代化,没有复杂的分工和官僚化机构是不行的,而官僚体制又将损害社会。森卡尔(Oded, Shenkar)持相似看法,他认为“文革”的结果表明,官僚主义是避免不了的,努力的方向不是消灭官僚主义,而是对其作出改善[3]。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文革”持肯定态度,例如巴契尔(C.S.Burchill)认为“文革”是成功的,他还建议,

为了防止官僚化的发展，要保存和发展“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五七干校一类的机构，前者提供了批评政府的渠道，后者有助于官僚主义者转变态度[⑨]。费尔（Ferenc Feher）和赫勒尔（Agnes Heller）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列宁不重视平等问题，斯大林蔑视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文革”期间，第一次实现了平等[⑩]。克劳斯（Richard Kraus）认为，“文革”之后，官僚特权问题比起毛的时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冲突表现在对有限的物质利益的分配方面，尤其表现在执政的官僚与非党知识分子、科学家、城市企业家和在政治上觉醒了的青年之间。阶级矛盾虽然和毛的时代不同了，但将会继续发展[⑪]。

四 影响和后果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著一直持续不断。比如，在70年代中期就有多默斯（Jürgen Domes）的《“文革”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s Between Two Party Congresses》），张亦春（Chang Yichun）的《中国的派别和结盟政治：“文革”及其后果》（《Fractional and Coalition Politic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以及布鲁格尔（Bill Brugger）编的

《中国:"文革"的影响》(《China: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不过,应该说,这几本书并没有对"文革"造成的影响作出深刻总结,主要内容还是叙述"文革"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常常描述得不准确。

早在1969年,张旭成(Parris H.Chang)就看出,"文革"对于中共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文革"中的清洗并未按照党章国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亦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干部是好的还是"三反分子",无数的人莫名奇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张指出[㉗]:

> "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

泰韦斯(Frederick C.Teiwes)在研究中共领袖合法性问题的专著中认为,"文革"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毛泽东的权威是个重大打击。他指出,"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识分子,在农村过着贫苦生活的知识青年,以及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人与人之间无休止

的斗争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种种怀疑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这是对毛的权威的直接打击[38]。

许多西方研究者敏锐地看出，“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对年轻人。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后的中国》（《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第20章《文章的社会后果》中说，千百万人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会、派性武斗、镇压而在肉体和精神上留下严重创伤。孩子们因父母的问题而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揭发批判，数百万人被非法监禁，数百万人在穷乡僻壤虚度光阴。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前程被毁掉了。青年学生的理想被粉碎，因为“文革”的崇高目标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从理想的一代变成了迷惘的一代。辛格（Martin Singer）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39]

> 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

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石文安(Anne F.Thurston)说："潜藏在各种对于'文革'后果反应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她还认为一位被采访者的话很能说明问题[⑩]：

> 现在中国有一种认同危机，类似于杜克海姆(E.Durkheim)在他论述无目的性问题时所描述的危机。准则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基础，但现在准则已分崩离析，但又没有新的准则来代替。因此，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正面临一个无目的时期。人们不清楚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想要改变，但什么样的变化是合适的，他们并不确定。

哥尔德(Thomas B.Gold)从一个颇为别致的角度(人际关系的变化)研究"文革"的后果。他说，傅高义(E.F.Vogel)曾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50、

60年代比较成功地把人际关系的标准和行为的特征从旧的友情式转变为同志式，他认为经过“文革”，人际关系又向传统方式回归。“文革”之后，人情、关系、后门、请客送礼代替了以前一视同仁的同志与工作关系。这是因为“文革”中左派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做过了头，使以前的革命价值和典范失去了信誉[1]。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附带产生的正面影响。白鲁恂认为，“文革”使中共领导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失败的现实，不但看清“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还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优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国的好东西。没有“文革”，他们就不会和苏联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决裂[2]。邹谠认为，“文革”也使某些掌权者受到再教育。他们年轻时满怀理想投身革命，反对压迫和社会不公正，他们在中年时期成了掌权者、整人者。“文革”中的遭遇使他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法西斯主义，他们产生了改革党和国家制度的愿望[3]。

迈斯纳还看到，经过“文革”，人们的政治觉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们在“文革”中享受过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组织，利用大字报等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经历，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将之加以保卫[14]。施拉姆也认为，“文革”虽遭否定，但却给中国留下持久的东西，反官僚、反权威的精神是人们的宝贵经验，青年一代学会了独立思考[15]。

当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麦克法夸尔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和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同一地方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思考。他在6月22日写成的文章中说，尽管和以前相比有若干不同之点，但1989年的抗议者和平息者都在“文革”的阴影中行动。邓小平及其同僚想起红卫兵在城市引起的混乱和破坏就惊慌不安，想到干部受冲击，党组织瘫痪无力，他把学生运动和当年造反派搞天下大乱当成一回事。而过去的红卫兵在1989年正是35—45岁的一代人，他们还记得毛泽东“造反有理”，“敢想、敢说、敢干”的教导，他们具有向权威挑战的经验。但麦克法夸尔未能说明，有多少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活动，或是提出证据，证明他们用当年的造反精神来鼓动青年学生[16]。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还有许多重要方面不能在这篇文章中介绍，尤其是他们对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文革”对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影响，以及中国外交方针在“文革”期间的变化等等，这些研究范围较集中，成果也颇为丰富。我只希

望，在了解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能真正创出一门“文革学”来。

原载《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注解]

① Timothy Cheek：《Book Review：The Ten – 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Iss. 122(1990)，pp.311—313.

② Thomas W. 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③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④ Michael Oksenberg et al.：*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7 in Review(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8).

⑤ Keith Forster：*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Zhejiang*，1966—1976(M.E.Sharpeinc.，1990).

⑥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⑦ Lowell Dittmer："Book Review：Politics of Chaos /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1968—1981"，*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4，No. 3(1990)，pp. 1049—1051.

⑧ Francis L. K. Hsü："Clinese Kinship and Chinese Beharior"，In Ping – Ti Ho and Tang Tsou eds.：*China in Crisis*，vol. 1，Book2，(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 602 – 603.

⑨ Lucian W. Pye："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 Iss. 108(1986), pp. 598 – 604.

⑩ Stuart R. Schram: "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 cit, p. 615.

⑪ Theodore Hsi – en Chen: "A Nation in Agon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 6(1966), pp. 15 – 20.

⑫ 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4—263.

⑬ Jean Esme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chor Press, 1973), p. 330.

⑭ Victor C. Funnell: "Social Stratific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 Iss. 2, pp. 14—20.

⑮ Richard M. Pfeffer: "The Pursuit of Purity: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I, Iss. 6(1969), pp. 13—21.

⑯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 13.

⑰ Harry Gelman: "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 6(1966), pp. 2—12.

⑱ Philip Bridgham: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 and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Iss. 41(1970), p. 1 and Iss. 29 (1967), p. 26.

⑲ Garg Dutt and V. P.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 2.

⑳ C. K. Ya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visionism", *China in Crisis*, Vol. 1, Book 2, p. 505.

㉑ Ellis Joffe: "China in Mid 196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Struggle for Power?", *China Quarterly*, Iss. 27(1966), p. 124.

㉒ Paul J. Hinik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Dissonance Reduction or Power Maximiza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94 (1983), pp. 282—303.

㉓ 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China Quarterly*, Iss. 58(1974), pp. 255—261 and the same author: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pp. 227—229.

㉔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Ch. 5.

㉕ Ibid., Ch. 2 & 3, and the same author: "'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China Quarterly*, Iss. 72(1978), pp. 675—712.

㉖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35(1968), pp. 14—17.

㉗ Robert J.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p. 7—35.

㉘ Anita Che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NO. 1 (1992), pp. 62—63.

㉙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64(1975), pp. 645—683.

㉚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5, 324.

㉛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70(1977), pp. 395—398.

㉜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Iss, 83(September 1980), pp. 397—446.

㉝ Oded Shenkar: "Is Buresucracy Inevitabl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4, Iss. 5(1984), pp. 289—306.

㉞ C. S. Burchill: "Bureaucracy Versus Democracy: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Queen's Quarterly*, Iss. 79, Vol. 2 (1972), pp. 136—144.

㉟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quality Reconsidered", *Thesis Eleven*, Iss. 2(1982), pp. 23—40.

㊱ Richard kraus: "Bureaucratic Privilege as an Issue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Development*, Iss. 11, Vol. 8(1983), pp. 673—682.

㊲ Parris H. Chang: "Mao's Great Purge: 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ⅩⅧ, Iss. 2, pp. 5—10.

㊳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M. E. Sharpe, 1984), Ch. 1.

㊴ Martin Singer: *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1), p. 83.

㊵ Anne F. Thurston: "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 *Pacific Affairs*, Vol. 57, No. 4(1984), p. 605, Vol. 58, No. 1(1985), pp. 24—25.

㊶ Thomas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104(1985), pp. 657—668

㊷ Lucian W.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108(1986), p. 610.

㊸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48, 257, 302.

㊹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Ch. 20.

㊺ Stuart R. Schram: "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 cit, pp. 622—623.

㊻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En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36, Jul. 20, 1989, p. 8.

一代人的外部形象

——西方学者对中国红卫兵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30年过去了，这问题显然还没有确切可信的答案。虽然当年的数千万红卫兵至今正当壮年，许多人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记忆犹新，但他们之中不但没有人能对红卫兵给出一个盖棺性的定论，而且连稍具历史眼光的论述分析也尚付阙如。年长的一代中有人以感人的良知反思那场浩劫(比如巴金)，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只能对“人性何以变为兽性”百思莫解、感叹唏嘘，而不能作出科学、理性的回答。年幼的一代中，有人把红卫兵运动退潮，自己成了生活主角的时光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人一旦知道自己素所敬重的老师曾是红卫兵就大惊失色，好像不敢相信道貌岸

然的先生何曾为盗为匪。这种令当事人痛心疾首的和啼笑皆非的局面难道就要凝结为历史？红卫兵现象果真如此扑朔迷离，将成千古之谜？

要修复历史，我们并不缺乏经验和体验，我们缺的是理性认识。我们深陷在自己的经历之中，迷失在自己的经历之中，不能将其作为对象来反思、批判、认识，这应了一句古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让我们看看西方学者对于红卫兵的研究。显然，由于获得资料的不易，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隔膜，他们的论述中有不少东西使人觉得幼稚可笑，使人感到他们是在隔岸观火、雾中看花，但他们的不懈努力也产生了某些真知灼见，尤其是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能给我们较深的启迪。

理解"是什么"和"为什么"

1966年夏天红卫兵狂飙骤起，举世皆惊，一时间，"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西方学者对于红卫兵的研究紧接着就开始了。粗略地说，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67年到70年代初，他们尽一切可能多方收集材料，致力于解决下列问题："红卫兵是干什么的？""毛

泽东为什么要依靠红卫兵组织这种形式搞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大致从70年代中期延续至8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红卫兵运动兴起和派别斗争形成的社会原因。

1967年初，对“文革”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的伯雷汉(Philip Bridgham)在《中国季刊》上发表题为《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的文章，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紧接着，迈克尔(Fraz Michael)在《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的5、6月号上发表的“权力之争”中表示了类似看法:“毛在中央通过决议困难，要实施决议更困难，因此需要广泛地攻击党组织本身，这工具就是红卫兵。”杨(C.K.Yang)在何炳棣和邹谠所编《危机中的中国》一书中说:“‘文革’使人困惑的方面是似乎不可捉摸的红卫兵，但可以从整个共产主义目标导向这方面来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毛利用他们来强迫党的领导作出改变……整个动乱可以看成是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同目标将影响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命运。”

许多西方学者持以上看法是较为自然的，因为红卫兵——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组织和派别——行动的突出特征就是，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攻

击他们认为变成修正主义的各级党组织。

在1967年2月初，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庐库时说，"文革"起源于他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与斗争，但历次运动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找到一种形式，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内问题。"文革"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红卫兵是站在自己一边发动群众的。外国研究者可能间接地知道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或知道它的精神。

"文革"期间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依斯美(Jean Esmein)在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中对毛泽东的意图和目标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与支持，他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对此不必再有争论，"文革"是毛泽东及其亲密助手领导的，他们坚信，没有人民的行动，党就不能得到更新，而"党内毛派少数激进分子在组织上占下风，所以用揭露阴暗面的办法使群众起来，让那些不受信任的领袖下台"。

在以上见解的基础上，有人力图从更广泛的视角，或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和分析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依斯瑞尔(John Israel)于1967年中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中的连续性和变化》，其中指出，"文革"前，校园成了红与专的冷战战场，家庭出身不同的学生，注重

学习成绩的学生和追求政治积极的学生之间形成矛盾与对立；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中寻找接班人和同盟军时，把这些青年从学校的羁绊和团的官僚那里解放出来，直接激励他们，用尽可能简单的意识形态武装他们，让他们反对'阶级敌人'，这就是对红卫兵的处理办法"，"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有人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有人是为了在升学或就业的竞争中得到好处，有人则追求同志情谊、权力感、串连和冒险的机会"。迈坦（Livio Maitan）在1969年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党、军队与群众：对"文革"及其后果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在其中说："为什么要首先动员青年学生？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在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紧张状态，青年学生首先感觉到它们的作用。由于这一原因，学生可能对某些要求更敏感，更容易动员，特别是如果出发点和他们日常的忧虑或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话（批判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不断增加的阶级歧视，等等）"，他还说，"从另一方面看，动员学生群众对于国家生活，尤其是对于经济，影响是有限的。同时，毛主义的领导可能会正确地想到，主要由青年学生形成的运动较易控制，如果这一运动失去控制，危害也要小一些。"朱莉亚·王（Julia Kwong）在《中国学校中的"文革"》一书中以教育革命为主旨来解释学生

的造反，她认为"文革"是由于学生不满意学校的制度（如死记硬背、尊师重道等）引起的，此外还有学生服从权威的倾向（这里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令人忍俊不禁，比如许（Francis L.k.Hsü）在"中国人的血缘关系和中国人的行为"中说，红卫兵是反传统遗产，即攻击血缘关系的工具，因为血缘关系是国家实现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的障碍。而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和中国的"文革"》一书中用宗教心理学观点看问题，他说，"可以把整个'文革'视为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要求，即召唤对于革命不朽的重新肯定"，在他看来，再生的施行者是红卫兵，"文革"一开始就是青年对老年、新对旧的胜利，红卫兵早期目标是"破四旧"，他们向旧时代进攻，用心理学语言来讲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他们不但年轻，而且在阶级成分上纯洁。

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与"文革"》一书中表述的观点极为冷峻，甚至刻毒，但听了也许不无益处，他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与清廷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产生的。更可理解的是，这种不满本来是可以针对

他自己的。就像义和团一样,红卫兵受到真诚的、有力的革命和爱国主义的激励,但他们缺少政治经验和消息灵通、受过训练的干部。他们天真的、原始的神秘主义被老练的政治家任意利用,而他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摆脱掉这些天真的帮忙者。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是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他们上了当,但这已经为时太晚"。

探究造反原因和派别斗争的社会根源

第二阶段的研究,不论从时间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说,都显得相当紧凑,而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互相展开争论的,也集中于那么几个学者。

首先出场的是李鸿永(Hong Yung Lee),他于197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文革"中红卫兵的政治动员和革命造反派》,于1978年推出专著《中国"文革"政治学》,由于他的研究主要依靠大量阅读红卫兵的出版物,他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后来还有一部论著《关于美国的红卫兵资料研究指

南》。在 1975 年发表于《中国季刊》上的论文《"文革"期间广东的激进派学生》中，他认为仅从上层权力斗争角度看"文革"是不可取的，主张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研究红卫兵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区别。区别首先表现在对于"文革"打击对象问题上理解不同，造反派攻击党组织，保守派攻击个别负责人；造反派攻击高级干部，保守派攻击一般干部，造反派攻击"走资派"，保守派攻击"牛鬼蛇神"，即知识分子和旧社会残余分子。在思想上，两派都信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对阶级敌人的定义有分歧，保守派执着于经典定义，把矛头对准以前的剥削阶级分子；而造反派偏向于毛泽东的新解释，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就队伍成员的差异来说，保守派多为家庭出身好的人，而造反派有鲜明的社会特征，其成员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者，然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其三是对政治敏感的人，他们不一定听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话，而从文播、报刊社论中捕捉信息。另外，一方支持工作组，一方反对工作组；一方不参与，甚至反对夺权，一方积极参加夺权；一方热衷于教育革命，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方对此不感兴趣，而抓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不放；最后，保守派猛批建国 17 年的各种问题，而造反派集中精力搞"文革"发动后 50 天的问题。李鸿永在此文和《中

国"文革"政治学》中都作了这样的概括：保守派是享受特权和既得利益的人，他们竭力维护现存政治体制；而造反派是受压制的人，他们想改变现存体制。

一位较年轻的学者罗森（Stanley Rosen）对李鸿永的论点提出了批评，和李鸿永一样，他也是以研究红卫兵起家，他于197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60至1968年》。在1977年也于《中国季刊》上发表的同名文章中，罗森对李鸿永关于保守派、造反派的划分模式提出了挑战。他说，没有清楚的定义说出谁是保守派，谁是造反派，有些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保守，而在另一个问题上造反，有的组织在本校保守，而在社会上造反。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比如，广东省1967年1月的夺权，并不是如李鸿永说的那样，是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支持，而是造反派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支持。另外，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斗争也很重要，比如他们中最早的分裂发生在南下的部队干部的子女与本地南方局、省委、市委干部的子女之间，这两批人只有在血统论这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还指出，李鸿永认为造反派的成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这是不对的，出身不好的人大多不敢投入政治运动，别人也不欢迎他们参加组织，造反派的成份以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

另外，只有在中学中，家庭出身才是派别组成的关键因素，在大学里，派别的形成与对立主要取决于对校党委的态度。

李鸿永在答复罗森的批评时表示，他坚信自己关于保守派——造反派的划分模式不但在经验上能成立，而且在方法上是正确的。针对罗森强调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他认为造反派不过是在形势不利时，在哪种策略最好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我认为，李鸿永的答复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把问题提升到了理论层面。为了捍卫他的保——造划分模式，他提了两个颇为深刻的问题：一、有没有两派的贯穿"文革"始终的不变成员？二、两派在政治行为上究竟有没有区别？对第一个问题，他举哈尔滨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广州的东风派和红旗派为例给予正面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提出以下3个标准作为划分派别的因素：一、成员的社会特征，二、与上层集团的联系，三、对夺权的态度。他认为，他与罗森的分歧不在实质而在方法上，他的分析层次是以全省为单位，而罗森的分析层次是学校。他提出，红卫兵的组织派别有5个层次或类型：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各校的组织；二、校际间结成的联盟，叫"总部"或"司令部"；三、总部层次之上的大派，如北京的天派、地派；四、以司令部或基层组织为单位，为短期目的而结成的

协调性联盟，如"批陶联络站"；五、"文革"最后阶段削平山头后成立的最高层次组织——红卫兵代表大会。

陈佩华（Anita Chan）、罗森、安德佳（Jonathan Unger）于1980年在《中国季刊》上联名发表了在西方被广泛引证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的冲突》，此文坚持和发挥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即认为学生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阶级背景的对立导致红卫兵各派在人员组成、策略和目标上的区别，并继续深入研究，指出学生的利益冲突在"文革"前几年就已经表现出来。此文在结尾时指出，在"四人帮"垮台后，中等家庭出身的前造反派在上大学等问题上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好处，支持他们以前要打倒的"走资派"，"阶级"冲突以一种讽刺性方式得到解决。

罗森于1982年出版了专著《红卫兵的派性和广州的"文革"》，在阅读大量材料，作了数千人次访谈的基础上，对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作出了全面、详尽的描述和深入分析。1985年，陈佩华出版了她的著作《毛的孩子：红卫兵一代的个性发展和政治积极性》，此书对红卫兵的内心世界、精神发展历程有准确、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看来这几位研究者特别

重视红卫兵行为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

还看到了罗森的著作《中国“文革”中下乡知青的作用》和《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派性：一种社会分析》，以及安德佳的《毛领导下的教育：1960至1980年广东学校中的阶级和竞争》。

当然，这一阶段的研究并不仅仅集中于以上4位学者。比如，辛格（Martin Singer）有《知识青年与“文革”》（1971），怀特（Gordon White）有《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阶级背景：“文革”案例》（1975）和《阶级和阶级根源的政治学：“文革”案例》（1976），刘（Alan P.L.Liu）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集团斗争》（1976），等等。最后一书从青春期心理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两个角度分析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感想和评论

了解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之后，首先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想。近几年，海内外一些文化人大力鼓噪萨依德的东方主义学说，据说西方学者研究东方诸国和社会文化现象，是带着西方优越感，欧美中心主义看问题的，他们有意无意间丑化和贬低我们，以猎奇和观赏落后事物的心态编织关于东方的神话。我在了解西方的研究之前，担心红卫兵会被看成是当年的义和团——神秘、狂热、不可理喻，现在不少

中国人谈起红卫兵，不是将他们形容为青面獠牙，视为洪水猛兽么？但事实上西方的研究者是冷静、理性，善作同情性理解的。因此，我坚信，至少就研究“文革”而言，所谓西方学界的殖民地话语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当然，中外人士看待和评价“文革”及红卫兵，视角和方法还是有较大差异。我感到，我们看问题往往是情绪性、理想性的，而他们是冷静和现实的。我们谈起“文革”或自己的红卫兵经历，常常表现为一声声叹息，一行行热泪，一曲曲挽歌，而西方人则像是征集证据的侦探，用显微镜和手术刀工作的医师。我们一接触到“文革”问题，要么是歌颂，要么是谴责，立场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西方人则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他们习惯于用因果性框架审视各种现象，提出解释和假设，他们的认识论倾向尤为明显。

可能是由于以上气质方面的原因，也许还要加上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对于红卫兵的研究简直是乏善可陈，拿不出可以与本文介绍的理论或成果相媲美的东西。记得1994年陈佩华、安德佳夫妇来华作政治学课题，我在北京光华饭店与他们见面，曾提及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关于“文革”的研讨会。陈佩华说，要开会，筹款倒有办法，问题是没有新东西好讲，枉自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事后细想，这话是有道理

的。就拿对于红卫兵的研究来说，我们有多少东西超过了他们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呢？老实说，许多人现在可以写出点东西，无非是仗着不知道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胆大。中国的历史要外人来写，搞不好后代就只能看他们作出的（不见得妥帖的）结论。这想起来确实令人悲哀，又让人于心不甘。

最后，从三方面谈谈西方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

研究红卫兵运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概括派别斗争的一般规律，李鸿永、罗森等人是这么做了，但他们的视域仅限于广东一省，这是远远不够的。广东情况有特殊性，他们也不清楚。据我的调查和研究，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多数省份是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后有造反派内部两派对立。广东省的特殊性在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心腹，他不像其他军区司令员一样因1967年初压制造反派而垮台或作彻底转向，因此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矛盾一直居主要地位，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但被掩盖了。这种缺陷很难避免，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在1992年出了一本书叫《在中国一个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他在书中指出李鸿永等人的不足

时说,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代表了例外而不是规律。他提出,从本质上说,把红卫兵两派区分开的是对干部的评价。其实,他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恰恰是浙江省"文革"的特殊性:正是所谓的老造反派"红暴会"在对省委书记江华的态度上违背了中央"文革"的旨意而被打成保守派,才构成了浙江省派性斗争的主线。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作者提出"武汉的'文革'比其他许多地方更为典型",因为作者的考察范围就是武汉。实际上,只有研究了全国的情况才能抽象出一般性结论,决不能自己研究某个地区,就说那里是典型。

李鸿永、陈佩华等人认为,正是学生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参加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这既表明了他们的某种洞见,但又不准确和全面。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只有出身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政治活动,全国各地、各校最早造反的学生,几乎无例外是出身好的人,他们的论点无法解释这一点。造反组织中出身不算太好的人居多,是因为运动初期的血统论剥夺了他们投入运动的资格,当他们受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解放",可以参加或自立组织时,形势已经表明是造反吃香的时候了。因此,这些人当了造反派并不全然由家庭出身决定,也是运动发展的具体

情况使然。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还有一个常犯的毛病，就是喜欢把西方学理中的概念和理论套用于社会文化全然不同的情况。陈佩华在《毛的孩子》一书中用“权威人格”来概括红卫兵的性格特征，我认为不甚确切。“权威人格”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它建基于佛洛伊德的性学理论，指儿童在家庭中处于性压抑状态而屈从于父亲的权威，同时又因一种以父亲自居的作用想充当权威。显然，这与红卫兵的性格心理相距甚远。还有一位西方学者罗多克(David M.Rsaddock)写了一部著作《中国少年的政治行为：广州的“文革”》，认为学生造反是家庭冲突的延伸：从攻击父亲到攻击教师，再攻击其他权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评《剑桥中国史》第15卷关于“文革”的描述和观点

卷帙浩繁的多卷本历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在中外学术界有相当的影响，其中的若干卷近年来已在中国大陆相继翻译出版。最后的一卷由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于1991年问世。1992年，中国的三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分别推出各自的中译本，这更加引起了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关注。

此书概括了1966—1982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限于篇幅和囿于个人研究范围，我在本文中只评论该书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在我看来，这也是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了便于读书参照和全面理解，我的引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中译本译文不妥之处将作改译并注明），文末将顺带指出此译本

的若干错误。

对于记载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著作，中国读者出于多种理由怀抱甚高的期望。现在40岁以上的人，对于"文革"记忆犹新，不少人痛定思痛，有不少反省和思索而没有表达、讨论的条件；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两部著作——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其各自的长短得失无形中为下一部著作设定了期待标准。《剑桥中国史》以前各卷（也许第14卷例外）的成就和水准使人们产生了信赖感。以第10和11卷即晚清史为例，其写作框架、审视形势角度的新颖，其中包含的许多在国内未见的重要材料，曾使我在阅读时又喜又惊，慨叹外国人居然能够把中国历史写得令中国人佩服。

有以上心理背景，我不能不指出，《剑桥中国史》第15卷是令人失望之作。此书结构（它反映了编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理论框架）无甚新颖之处，对"文革"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十分熟悉，叙述、分析、立论常有失当。此书对于"文革"中决非秘闻的许多重大事件未作涉及，比如1967年遍及全国的所谓"二月镇反"，同年夏季的"全面内战"，继保守派和造反派对抗之后广泛而长期的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斗争，一些思想先驱对于中国社会的思考、对于"文革"的批判

以及他们的观点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等等。有关各章作者对于一些重要情况——比如红卫兵造反的自发性、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军队和群众组织的联系以及军队之间的派性——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观察肤浅，对这些情况原因的分析因而也是表面的或不得当的。读过此书，人们对于“文革”只能得到一些模糊和凌乱的印象，就像在雾中观花，“文革”中各种事件扑朔迷离，足显得编者和作者把握这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力不从心。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无长处，比如第2章结尾处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哪些人应对“文革”负责任等问题的分析，就比大陆至今见诸文字的见解全面和中肯。书中还分析了“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即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人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以及最高层为应付这些外部事件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这一个思考维度是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者未能问津的。书中的见解颇为有趣，可惜由于资讯缺乏，我们不能对其对错作出判断。

在我看来，《剑桥中国史》第15卷对于“文革”的论述之所以粗浅失当，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有关材料未能开放，这就使得一切研究者，不论中外，只能处于情况不清、线索不明的境地；

第二,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对比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尤其对比他们对于本世纪另一场浩劫——德国第三帝国的兴起和扩张的研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而此书不过是，也只能是西方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概括和总结;第三，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够，使得本书编者和作者不能获得有益的启发和借鉴;第四，主编指导不力，不难看出,全书由几大板块拼凑而成,缺乏内在逻辑性和统一的思路，每位作者在某一领域对中国问题有深浅不等的专门研究，他们像是独立地提供自己的研究报告,而不是共同合作撰述一部史书。

下面具体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事实陈述不确切乃至错误

《剑桥中国史》第15卷中谈及"文革"事件时充满了不确切、不清晰、乃至错误的陈述,作者的叙述常常是含混不清、漫不经心的。这些错误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观点和结论的失误，但对于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而言，仍然是不能允许的。以下按书中顺序举若干例子。

力……在林的指挥下……成功地于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P.123,译文有改动)

林彪虽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像研制核武器和中印边界之战的决策和部署决非由他单独负责,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更大。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作何反应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P.129)

罗瑞卿被整,原因在于林彪认为他不听话,想夺自己的权。他是否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和中共高层其他人有分歧,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即使有,也不是他被整的主要原因。

(在1966年2月以后几个月）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至7月底，解放军就开始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援。(P.129—130)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P.140)

写大字报的人中没有教授，而聂元梓当时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不是助教。

>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P.150)

这里说的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这种活动实际上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在北京红卫兵上街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好得很》，使打、砸、烧活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国。在检阅红卫兵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讲话，对“破四旧”行为大加支持和赞扬。

> (关于安亭事件)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

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P.158)

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P.160)

这几段关于上海"文革"情况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作出"工总司"的人不去北京这个决定的人是周恩来，劝阻的指令由国务院发出。一开始，中央"文革"不支持"工总司"的行动，陈伯达还发出一个很长的电报加以劝阻。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他通过艰苦的谈判和说服工作，基本上把工人劝住了，只是过了一天才突然改变主意，承认"工总司"，使上海市委极为尴尬。事后，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批准了张春桥中途变卦的行为。本书的描述没有反映事件的曲折，给人的印象是中央"文革"对"工总司"北上告状先反对，后同意，张春

桥是带着同意的方案回上海的。聂元梓专程到上海，是受江青直接指派去援助陷于困境的张春桥。聂的批判对象是常溪萍，他不是教育局长，而是市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她不是泛泛地给常扣一顶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而是指控他曾经镇压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原来，常溪萍曾于1964年底抽调去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对当时的过火斗争持不赞成态度。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集会，会上发布的"通令"称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这种通令在"文革"中司空见惯，不能算数，和正式撤销职务是两回事，后者是要中央正式发文，经毛泽东批准才行的。另外，张春桥1月4日就到了上海，1月6日集会就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 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指控，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P.187)

傅崇碧和另外几个军人进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是去向江青汇报有关鲁迅书信手稿的

事。而手稿正是江青下令从鲁迅博物馆取走，藏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江青被此事弄得很尴尬，再加上杨成武和傅崇碧一直不太听她和林彪的话，就诬陷杨指使傅带两车士兵冲击钓鱼台，她的行径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傅崇碧去钓鱼台，杨成武并不知道。在“文革”中，从没有“第二次二月逆流”一说，作者的误解，可能出自据传的康生随口对杨成武的攻击：“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 1965年初……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负责编印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P.225)

刘、邓、彭等负责指导社教运动，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负责地位，不存在毛用此事考验他们的情况，1965年军内社教运动也是没有的事，编《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3年底决定并组织人完成的，至于红卫兵，是北京的一群中学生于1966年5月自行成立的。

> 毫无疑问，吴晗是在“借古讽今”，因为他早年的作品已表明他自己是清楚这种手法的。吴晗笔下的海瑞是清官，他站在百姓一边，要退田与民、为民伸冤。因此，姚文元说吴晗实际上是煽动解散人民公社。他这一理解并不十分牵强附会。（P.624）

吴晗最初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因为毛泽东在1959年提倡海瑞精神，胡乔木找到他，转达了毛的意思，请他写这方面文章。他写《海瑞罢官》的戏本，是应京戏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请求。此剧本写于1959年，姚文元说剧本影射1961年单干、退社风，是不合逻辑的。

二　对中国政治陌生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中共党内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向社会的蔓延，其力度和幅度都达到了最高峰。这种斗争，既继承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路线斗争和斯大林大清洗的传统，又可见到法国大革命中政治煽动家和暴民造反相结合的踪迹；既遵循中国古代道家“借力打力”的思想作为指导，又有《东周列国志》中描述

的宫廷阴谋的色彩，以及《红楼梦》中的那种家政不分的无谓磨损。《剑桥中国史》第15卷的作者对“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散合消长，对毛泽东高深莫测的战略布置不能作出正确理解和判断（其实这对于即使亲身参加过“文革”的中国人亦谈何容易！），对中共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日常运转的方式也知之甚少。

本书第2章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依靠三种力量，即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众（P.121—129），而在“文革”中有活动能力的，可以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的力量有三种，军队、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和干部（P.167—173）。这些力量的特征、它们内部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结盟与竞争以及力量消长关系，还有毛泽东和这几种力量的关系，构成了“文革”进程的动因和经纬线。这种见解大致不错，但由于作者不熟悉情况，对各种力量及关系的分析有诸多缺失，因而对“文革”的说明就不准确、不完整，有各种偏差。

关于军队。作者固然看到，军队在“文革”中表现得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忠实地听从林彪的号令，存在着主力部队（直属中央指挥）和地方部队的区别，以及40年代后期形成的几大野战军系统的矛盾（P.170—171），但作者只是抽象、笼统

地知道这种情况。部队政治立场的区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在同一地区支持不同的派别，比如在浙江，省军区支持“红暴会”，20军和空5军支持“省联总”；在广西，地方军区支持“联指”，55军等支持“四二二”。不同的部队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和干部，从而一个地区武斗不息，派争不止，这是“文革”中最为广泛和重要的情况，但作者似乎完全不知道。在作者看来，军队只是支持保守派（P.181，584），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比如在四川，54军支持重庆的“八一五”和成都的“红成”，50军支持“八二六”，他们是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作者认为，“文革”中军队惟一关心的事情是维持秩序和稳定（P.170），而军队有权筹组各地的革委会（P.166，180），这是完全不正确的。组建省级革委会的权力在中央（由毛、林、周和中央“文革”决定），因此军队不光维持秩序，而是要争取更多的权力，不然的话，“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不会那么长久，那么激烈。

作者把所谓激进的知识分子作为与军队及下层群众并列的毛的权力基础，我认为不妥。他们就是那么几个通了天的御用文人，既不是一个社会阶层，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作者说他们比其他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P.125），在现行政治体制中没有多大既得利益，更愿意反现行体制（P.126），

这也是不对的，他们不过是在思想倾向和个人关系上更接近毛泽东而已。作者还断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的利益(P.161)，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有分歧(P.172)，这也是不对的。中央“文革”小组只代表毛的意图，在它存在的期间，只听说有军队和群众组织犯错误的事，从未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犯错误的事，其成员的利益在于为毛泽东打倒党、政、军中的“走资派”而得到升迁。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群众基础是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学生中，是家庭出身中等或不好的人，他们在升学、获得好工作等方面受到歧视；在工人中，是那些非技术工、学徒工以及亦工亦农工人，他们的收入和福利都低于技术工和正式工(P.126—129)。这种观察有其深刻之处，但并不准确。由于血统论的猖獗，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当时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作者的观点解释不了这一点。至于工人，地位低下的那部分人确实对现实不满，并在运动中力图改变地位，但毛从未鼓励过作者所谓的“群众性大规模抗议”。“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差别是暂时容忍他们的活动，听任他们去冲击党委和政府。作者写道：“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

对紧凑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P.129)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作者说法的不准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间不对。直到1966年5月底,群众的作用尚未显于舞台;第二,误解了“文革”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从未主动到不满现实的人中去寻求支持;第三,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毛的个人魅力;群众,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为毛尽忠效力,甚至牺牲生命。

“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是作者具体分析各种力量的事例,作者的分析和论述表明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对于“二月逆流”,作者只知道大闹怀仁堂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全国的“二月镇反”,军队在各省镇压造反派组织,大批逮捕拘禁(在四川、湖南高达几十万),抓捕或驱逐到各省为中央“文革”小组充当联络、指挥的“首都红三司”的人。镇压的起因多为造反派冲击军区,作者显然不知道中央“文革”和军队在这方面惊心动魄的较量。在讨论武汉事件结束时,作者觉得仅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陈再道抱有善意是不够的,认为林彪同样如此(P.183),作者在这里大错特错了。事实是,林彪竭力把武汉军区的“路线错误”渲染成“兵变”,从而搞掉陈再道的老上级徐向前,这涉及到了军内更大的、更高级别的派

系之争。

尽管作者正确地指出，"文革"期间毛从未完全控制局势，他有时会向干部、军队或群众组织让步，但他的了解仍然是抽象的，在分析具体情况时就会出偏差，这里仅举两例。

1967年2月5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由于叶剑英等人的反对，2月12日毛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使他们于2月23日将"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毛向党内、军内抵制"文革"派的一次退让。但作者却认为，公社应该导至直接民主，由于名不符实，毛才决定改名(P.165，175)。这种对民主的迷恋，并非属于毛泽东，而只为作者自己所有，书中甚至认为，"革委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P.581)。

从1967年底到1968年初，毛泽东和"文革"派要求造反派克服派性，《解放军报》还发表社论，强调"支左不支派"，这也是毛泽东改变原来方针的一次战略退却。在1967年1月，毛下达军队"支持左派"的命令，导致军队在东北等地镇压、取缔保守派组织。同年7月，他公然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这段时间，毛是要彻底摧毁保守派，群众组织进入革委会的只能是造反派。但夏季之后，毛改变了态度，不再坚持"革与保的路线斗争不可调和"，对群

众组织，只要求联合，不再苛求是否为左派。比如广东的“东风派”，曾被定为保守派，但在这一政策变动之下，也和造反派“红旗派”平起平坐，签订协议，进入革委会。大多数造反派不愿转弯，坚持“路线原则”，他们高叫“支左”，意为只有他们才应得到军队支持，进入权力机构。“支左不支派”是针对他们的，是从以前“支左”政策后退，是让地方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取得合法性。但作者将其用意理解反了，以为是要让未得到地方军区支持的一派（即造反派）参加革委会（P.191—192）。

三　对红卫兵运动及派别斗争不清楚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复杂的派别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最为详尽和深入的。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和斯坦利·罗森在7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代表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剑桥中国史》第15卷的作者论述这方面问题时基本上是照搬他们的材料和观点，这本无可厚非，但上述学者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也就随之带入此书。再加上本书的论述不可能像上述四位作者那样充分细致，因此本书关于红卫兵

的种种说法显得零碎和混乱。

简单说来，上述四位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看到保守派和造反派（本书称为“激进派”）的派别斗争，而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派被彻底打垮后，学生的派性斗争主要表现为造反派内部两派的斗争；二是对学生参加什么派别的原因分析太简单，不全面。下面来看看本书论述的几点主要失误。

第一，对派别斗争过程不清楚。作者断言，“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P.150），这是不对的。首批红卫兵无例外地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6年10月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不容他人置喙。之后，在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下，才出现造反派的红卫兵，两派的斗争才愈演愈烈。作者还说，1967年1月以后，一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进入权力机构，群众组织又分裂为保守派和激进派（P.579，582），情况并非如此。1967年1月之后，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局势稳定，军训开始。这时保守派已不存在，有合法地位的造反派分成较激进和较温和的两派（虽然温和派被指责为吸收了不少前保守派人员），比如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而在全国大

多数地方，由于“二月镇反”，在1966年底垮台的保守组织纷纷卷土重来，造反派多被取缔或自行瓦解。只是在4月之后“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才重振旗鼓，依各地情况不同，迅速地摧垮保守派，或艰苦地把保守派压下去。

第二，完全不知道派别的分化和发展。大致说来，各地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联动”、上海的“总部”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已被冲垮，有的地方在二三月份有过复兴，但随后又被压垮。以后的派别之争基本上在造反派内部进行。如北京的天派、地派，四三派、四四派；山西的“红总”和“红旗”；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造总”；同时，河北的“大联指”和“狂人公社”；湖南的“长河高司”与“湘江风雷”和“省无联”；云南的“八二三”和“炮兵团”，成都的“红成”和“八二六”，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到底”等等。只有广东、广西、辽宁、江西、新疆、内蒙、西藏几个地方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贯穿始终，直到双方共进革委会。在大多数地方，进革委会的两派指造反派中的对立两派。因此，作者说各地组成省革委的群众代表是保守派与激进派(P.584)，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说错了。作者在全书中论述派别斗争一直只讲保守派与激进派，从未涉及造反派内部两派，表明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作者把北京天派地

派的斗争当成与广东"东风派"、"红旗派"一样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P.582—583),是完全错了,虽然这错误显而易见来自李鸿永。[1]

第三,对学生派别归属原因的误解。作者认为,参加造反派的人是党的阶级路线的受害者,因此倾向于攻击党的机构,而保守派是既得利益者(P.151—152),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如前面所说,运动开始时只有所谓"红五类"子女才能干革命,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只能这些人当。作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大学中为什么有那么多造反派。因为按作者的说法,上大学的人是阶级路线的受益者。诚然,如作者列举的统计数字说明的(P.151),保守派中出身好的居多,造反派中出身中等或差的居多,但这并不是学生们根据自己利益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运动过程造成的。如前所说,红卫兵的发起者推行血统论,他们排斥和虐待非"红五类",当1966年10月份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解放"受压制的学生时,他们自然而然地站在保守的"老红卫兵"的对立面,追随中央"文革"小组当造反派。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少数首领而言情况是这样的:少数干部子女出于本能要保自己的父母,也出于以往政治运动经验主动积极地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但他们不知道这次运动目标和以前不同,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他们

父母这样的老革命;最早的造反派是这样的人,他们政治嗅觉灵敏,善于揣测毛泽东的意图,能从社论中筛选出与平常情况不同的信息。作者提到,在搞"教育革命"时,保守派强调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造反派倾向于批干部子女享受的特权教育(P.588),这显示了两派组织成份差别引起的对立,情况确实如此,但这是以后的事,它不能说明派别划分的原因。

第四,不知道两派分野的焦点。作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P.150—151)。如刚才所说,这是不确切的。应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应该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运动初期和整个运动中都是所有学生的共识。分歧在于是不是要完全听工作组的话,反工作组算不算反党。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反工作组的学生都被视为造反派,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反对学校党委,也不管以后立场有什么变化。反对工作组意味着和派遣工作组的上级——省委或市委发生冲突,因此和那一段时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相对立,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期待的。

第五,对派别和后台的关系不清楚。作者说:"对于产生的分歧,'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

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站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P.583)这不确切，只是对“文革”小组说对了。军队并非一律站在保守派一边，尤其是当保守派已经不存在时，军队只能在剩下的造反派的不同派别中作选择。说周恩来实际上倾向于保守派可能不错，但他的公开表态从来没有和“文革”小组不一致。比如在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最激烈的两广，周恩来于1967年4月中旬在广州宣布为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于8月下旬支持广西造反派“四二二”。

四 对经济损失认识不足

作者断言：“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P.211)“混乱基本上限于1967、1968和1969年3年，工业和运输业的破坏最厉害，但只是在1967和1968年。”(P.501，译文有改动)“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P.503—504)

作者的说法令人震惊，它与每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的直接观察不合。人们记得，在1966年

后4个月到1967年初，1300万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全国旅行。1967年春季、夏季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状态(不少地方武斗延至1968年年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生产单位处于全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每一个单位对干部、群众的揪斗和批判以及批判“经济主义”对于人们生产积极性造成巨大打击，这一切造成的经济损失怎么可能“惊人地小”？

作者列举了一些工业和农业产量数字以支持自己的判断(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令我怀疑，但现在无法详细讨论数据统计问题)，但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些数据既不全面，也不直接说明问题。以下最能反映“文革”中经济损失的数字不难知道(比如柳随年、吴敢群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出版于1986年)，但作者却未引用：1967年财政收入比前一年减少25%，1968年在此基础上又减少13.9%，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损失达1100亿元；1966年至1976年国民收入共损失5000亿元，这相当于以前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和。

中国领导人断言，“文革”使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经济专家和广大人民的认同。说“文革”，而且是其中破坏最甚的两年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不仅使人费解，而且

要令人气愤!

作者认为"文革"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基本上是短暂的"(P.507),只限于1967至1969年3年,这也不对,10年间经济的起伏挫折发生多次。比如,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经济形势日见好转,但毛和中央"文革"马上来了个"批林批孔",使一大批刚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无法工作,派性斗争复燃,局势动荡不宁。1974年国民经济指标大部分未完成,主要产品产量低于上一年。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在各条战线搞整顿,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但紧接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开始恢复的经济秩序又陷于混乱,使得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77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比上一年下降。

作者的谬误不仅在于断言"文革"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低、时间短,更在于认为这种影响"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P.507),这意味着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奉行独特的发展战略和伴随此战略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P.507)作者看到中国经济长期、一般的问题固然不错,但忽视"文革"这场浩劫的异乎寻常的破坏性就不对了。一千多万人在大半

年占用国家的水陆运力去搞大串连，大部分地方用机枪、大炮、甚至坦克、船舰战斗，大学连续6年停止招生，研究生连续12年不招生，这还不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吗？下面仅用一个例子反驳作者的观点。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是使得计划官员软弱无力，失去主动性，他们明哲保身的办法是：以前怎么做，现在就如法炮制（P.508、509）。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他们被迫执行各种"革命"政策，放弃以前行之有效（至少是相对合理）的方针，比如搞高积累，与国力不相称的外援（以"消灭帝修反"），为备战而把工厂迁到边远的山区，放弃生产指标、成本核算、质量检查、考勤奖惩，等等。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波及中国农村……理查德·鲍姆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详细研究时发现，中国报纸报道了在1966年7月至12月231个地方发生了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上的地方。"（P.211，译文有改动）这段话充分证明西方研究者受消息来源限制而得到的错误印象。如果作者知道四川泸州地区武斗双方参与者均上万人，知道湖南道县参与杀人和被杀者均逾万人，广西宾